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 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 伟	朱 民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大卫	张国宝	张晓强	张 祥
张卓元	陈 元	林兆木	林毅夫	周文重	高尚全	海 闻
钱颖一	郭树清	辜胜阻	聂振邦	楼继伟	樊 纲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傅强恩/John Frisbie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马克·乌赞/Marc Uzan
郑永年	

编委会

主 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晓红	吕 政	谷源洋	朱晓明	李晓西	李向阳
陈永杰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裴长洪	霍建国		

主 编：郑新立
副主编：王晓红

• 本刊专论 •

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共同迎接更加美好的新未来 陈文玲 (005)

• 宏观经济 •

深化改革开放 全面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关于“十三五”时期扩大对外开放的思考 霍建国 (030)

中国中高速增长区间、条件和政策选择 汪红驹 (038)

抓住大宗商品价格中长期低迷机遇重构中国全球能源资源战略

王 军 刘向东 (053)

• 世界经济 •

“一带一路”的动因与挑战 田惠敏 曹红辉 (066)

• 产业经济 •

中国制造 2025 实现变道超车 张茉楠 (078)

• 理论前沿 •

消除西方对中国法律误读的路径探讨

——以西方比较法学研究为视角 顾华详 (091)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博看期刊网收录期刊 中文知识网

CONTENTS

Promoting hand in hand the construction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 for a more beautiful future	<i>Chen Wenling</i> (005)
Deepen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 – up and building comprehensively the new system of the open economy	<i>Huo Jianguo</i> (030)
The range, conditions and policy choices of china’ s mid – to – high speed growth	<i>Wang Hongju</i> (038)
Grasping the opportunity of medium – to – long – term slump of commodity prices and reconstructing China’ s global energy resource strategy	<i>Wang Jun , Liu Xiangdong</i> (053)
The motivations and challenges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	<i>Tian Huimin , Cao Honghui</i> (066)
China Manufacturing 2025 : Realizing Overtaking through Lane Change	<i>Zhang Monan</i> (078)
On the Path to Eliminate the Western misreading on Chinese laws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stern comparative law research	<i>Gu Huaxiang</i> (091)
Investigation on “green congress” project in Israel	<i>Li Xiaoxi , Zhu Zhaoyi , Rong Tingting</i> (104)
Change China with “3 Creation”	<i>Gao Shangquan</i> (113)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18)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3)

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共同迎接更加美好的新未来

陈文玲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合作倡议，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我国首次提出具有全球视野的对外和平发展战略，是维护我国海权和路权的核心战略，对于我国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一带一路”重大合作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与支持，必将成为全球合作发展的新契机。

关键词：“一带一路” 对外开放 互联互通

作者简介：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总经济师、执行局副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合作倡议，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作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几千年文脉连绵的文明古国、快速发展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给了世界一个和平、合作、和谐、共赢的

宣告和昭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相联相通。表现了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正确的义利观、历史观、发展观、安全观和世界观，将架起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座桥梁。2015 年 3 月 2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重大合作倡议得到了沿线国家和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响应与支持，必将成为全球合作发展的新契机。

一、站在历史的新高度，认识建设“一带一路”的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历史意义

20 世纪英国伟大的思想家罗素指出：“不同文明的接触，已经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的人文精神，促进了东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接触、交流、互动与友好往来，推动世界历史不断向前发展。2100 多年前，中国人开启的丝绸之路推动了东西方平等开展文明交流，留下了互利合作的足迹，沿路各国人民受益匪浅。600 多年前，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古老的丝绸之路，曾是经济共赢、文明互鉴的合作范本。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合作倡议，在开放、发展、和平、共赢、安全、交融的世界新格局下，赋予古老丝绸之路崭新的时代内涵。

（一）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携手迈向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寻找更多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开创更加美好的新未来

“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将使中国与沿带沿路国家和地区努力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构建各方融合发展的大格局，共同担当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任，共享发展的权益和利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体现中国一贯遵循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原则，契合沿带沿路国家的共同利益。沿带沿路各国和地区是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也是共享发挥成果的兄弟。这一战略构想如能变成现实，将共同构建起世界跨度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初步预计将涵盖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44 亿人口，生产总值（GDP）规模将达 21 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 63% 和 29%。沿带沿路地区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上升期，无论是从发展经济、改

善民生，还是从应对金融危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角度看，沿线各国的前途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中国不但需要与大国强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且需要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携手进入新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新时代，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关照他国利益，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纷繁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局面，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精神更显重要和珍贵。

（二）与沿线国家和地区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衔接和对接，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主张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推进和实施“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让古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两千年前，张骞出使西域，“走出去”的中国力量为一个古老文明注入了开拓进取的基因。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第一大制造业国家、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中国的企业也进入全球通商时代，“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将给中国海外投资和企业“走出去”带来历史性机遇。近两年，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大大加速。截至2014年9月底，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8万亿元人民币（折合6184亿美元）。我国对外投资区域也不断扩展，从投资的国别地区来看，中国对外投资已经从传统区域逐步拓展，多元化区域投资特征明显。去年，中国对亚洲增长了48.9%，对东盟增长了27.6%，对非洲增长了将近22%，对香港投资增长了50.8%，对俄罗斯增长了35%。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走向深入，随着沿带沿路国家和地区对这一战略构想和倡议的响应，围绕这一地域的贸易和投资将有大幅增加，这将为投资者带来巨大的商机。沿线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很多是低收入国家，还有9个最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低。据亚洲开发银行和有关专家预测，亚洲地区除中、日、韩三国外，未来十年基础设施每年投资需820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总投资金额分别为1600亿美元和2800亿美元，相关国家自身仅能提供约4000亿美元，资金缺口巨大。在过去十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年均增长19%，高出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平均增速四个百分点；仅中国企业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额，就从1.8亿美元扩大到86亿美元，年均增加54%，这充分表明共同投资潜力与合作潜力巨大，中国正在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加快紧密合作与深度融合。

（三）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这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必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上指出：“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我们要把握世界大势，跟上时代潮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新时期外交发展理念、思路和策略原则的一次重大创新和必要调整。1954 年中国和印度、缅甸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奠定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已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思想，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世界局势的全面把握。今天的中国不同于 60 年前全球冷战时期百废待兴的中国，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迫切需要重新打开国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中国。当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成为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革和调整的重要力量。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国面对全球形势的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化与沿线国家合作，体现全球化条件下大国应有的胸襟和气魄。“一带一路”沿用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古丝绸之路“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各国商人排除艰难险阻，跨越万水千山，形成商品贸易走廊，推进了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古丝绸之路历久弥新，已经成为一种文明交流、交往和交互的文化符号，至今仍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其所展现出的互利共赢合作理念以及和平、友好、开放、包容精神，将再一次唤醒沿线各国对经贸文化交流的认同。丝绸之路不仅是全世界共同的文化遗产，而且以这种柔性的、美好的、和平的价值符号，以“润物细无声”的浸润，共同塑造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新秩序的理念，共同塑造有利于全球和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新格局的价值观，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新的重大贡献。

（四）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应对或对冲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风险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顺应国际社会对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新期待

“一带一路”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义，通过强劲的、更有效的、更具亲和力的区域一体化合作格局，籍此打破一些国家以霸权主义为主导的所谓战略再平衡，有利于构建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战略新平衡，对冲国际战争风险、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有利于增加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争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大的战略主动和回旋空间；有利于我在大国崛起进程中延长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经济发展周期。环顾全球，国际关系中的不公正不平等现象仍很突出，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不少国家的民众特

别是妇女儿童依然生活在战火硝烟之中。“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处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轴心地位，国家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恐怖主义威胁严重。创造和平环境是大家的共同愿望。经过建国 60 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和产值最大的制造业基地，我国市场规模已稳居全球第二，具备技术优势和可输出的产业越来越多，交通运输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丰富。未来 5 年，我国将进口超过 10 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直接投资将超过 5000 亿美元，对外投资合作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出入境人数将超过 5 亿人次。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将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经济发展方式将从规模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动力机制将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的“市场红利”、“改革开放红利”、“创新红利”、“人力资本红利”、“制度红利”将替代曾经发挥重大作用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等，实现动力机制、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管理方式的重大转换，将使中国继续成为充满生机活力和最具发展潜力、发展韧性、发展空间的经济体。中国愿意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分享发展的机遇，分享市场、投资、贸易、环境发展中的收益，可以搭顺风车，也可以共同创造快速车，还可以搭便车，满足世界特别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展起来成为新型大国的新期待。

（五）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形成国际国内互动、互通和互补的跨国界大区域和次区域的新布局、产业新动力、合作发展新格局

多年来我国区域布局基本上是在国内规划各区域发展，这种规划思路和方法已经严重滞后于今天中国发展的实际，滞后于世界和区域发展的实际。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是我国长期管总的区域布局，将对不适应这一布局的区域规划作出适度、适当和适时的调整，形成国内布局与对外开放布局互为表里、链接一体、相互支撑的新布局。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由于受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东快西慢、海强陆弱格局。沿海地区已成为支撑国民经济生产力布局的战略核心区，目前中国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 60%，内陆地区进出口贸易和外资利用额在全国占比不到 15%。西部地区远离出海口，与东部地区平均 167 公里出海距离相比，西部地区平均出海距离长达 2052 公里，是东部地区的 12.3 倍。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区域间开放程度的不平衡。“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将使我们在更大范围内来谋划我国产业布局，改变长期以来产业布局仅限于国内现有区域和资源条件的状况，打破长期以来区域、产业和开放领域思维、视野和边界的局促，真正做到以外带内、以内促外、内外联动、内外一体化发展。在此框架下，内陆地区、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地区将成为我

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回旋空间和增长动力源。通过建设“一带一路”，将逐步形成一批纵横交错、互相连接的沿海、沿江、沿边的战略大通道，以外部通道建设加快内部各主要经济区块联系和整合，缓解西部内陆地区区位和空间劣势，破解我国内陆地区因不靠边、不靠海导致的开放条件制约，加快我国西部地区同长三角、珠三角（含港澳）、环渤海和东南亚地区的连通，弥补传统欧亚大陆桥辐射力的缺失，将西部地区、珠三角和东南亚地区横向地连在了一起，以跨境大贸易大合作大通关打造一批重要物流链和关键节点，推动形成具有跨境要素集成能力、市场辐射能力的我国区域和产业发展新布局。有利于解决中国新型城镇化“三个 1 亿人”问题，特别是将加快关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天山北坡城市群发展壮大，由此可以构建中国新一轮区域发展的“中三角”“西三角（乌鲁木齐、哈密、阿勒泰）”，在更高的水平上优化中国新型城镇化布局。改变目前以东部沿海城市为重点的一枝独大的对外贸易格局，提升我国对外开放回旋空间。通过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更高水平的合作，推进我国形成跨区域、跨市场、跨国境的区域布局和产业布局，在更高水平上整合或运用不同国家、区域的生产要素，加快各国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深度融合，形成更多领域的、更深度融合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二、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个人独奏”， 而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集体大合唱”

“一带一路”战略合作是多层次的。沿线涵盖了中亚、西亚、中东、东南亚、南亚、北非、东非等超过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并辐射东亚以及西欧。“一带一路”构想一旦变成现实，将构建起世界跨度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成为世界经济最具活力和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目前，已经有 60 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集体大合唱”的歌声越来越嘹亮。

“一带一路”不是单一国家的计划，更不是把一个国家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利益之上甚至全球利益之上帝国再造计划。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总的思路是：以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相互开放、合作发展、互利共赢为根本宗旨，以“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为核心内容，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关键和抓手，以重点国别、重点园区、重点经济带和重点项目开发开放为先导和重点，将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与欧洲乃至非洲部分区域连接起来，促进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共鉴、合作共赢。共同努力将“一带一路”打造成与沿线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打造成普惠的、充满动力和活力的经济带，携手走

和平合作与共赢发展之路，展现“丝绸之路”曾经的繁荣辉煌与新时代的人文精神，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人类更加美好的世界梦。

（一）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我国百年来首次提出具有全球视野的对外和平发展战略，是维护我国海权和路权的核心战略，对于我国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1. 勇立时代潮头，“一带一路”应运而生，这是我国对外开放进程中标志性事件

当今世界，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全球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中。发达经济体与新型经济体对世界增长的贡献继续分化，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出现分化，金融货币政策已呈分化，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加重分化，政治结盟与经济结伴开始分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大的亮点，中国因素则成为影响世界新格局的重要变量。中国发展与世界新格局交织在一起，与时代发展的潮流携裹在一起，与人类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敢于担当、敢于探索、敢于在百舸争流的大时代勇立潮头，这既是对中国大国崛起的严峻挑战，也是对中国重大机遇。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着历史性变化：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产值第一的制造业国家、外汇储量第一且具有强劲资本输出能力的金融大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和创新驱动能力日强的国度，中国企业进入了全球通商时代。中国经济在年均持续两位数增长32年后进入新常态，即使增速在7%左右，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仍然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2014年境外投资额达到1400亿美元，成为资本净出口国，未来五年投资额将超过5000亿美元，伴随着投资的产业输出能力、技术输出能力、工程承包能力和配套服务能力将进一步释放。未来五年，中国将进口十万亿美元商品，出入境人数将达到五亿人次。中国声音、中国方案、中国工厂、中国市场、中国服务、中国流动人群的消费能力，正汇成不可阻挡的强大力量和文明古国焕发神采的魅力。

当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更加需要世界，世界也更加看好和期待中国。麦肯锡咨询公司估计，今后20年内，全球需要57万亿美元投资于电力、公路、港口

和供水等基础设施。亚洲开发银行统计，到 2020 年，亚洲各国国内基础设施投资需要八万亿美元。目前，世界银行的实收资本为 2200 亿美元，亚开行未偿贷款仅有 530 亿美元，这对全球和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是杯水车薪，中国充裕的外汇储备和投资能力无疑是需求者的渴盼。不仅如此，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创造和平发展、携手发展、可持续发展国际环境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对已形成的区域一体化安排存量进行优化整合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大智慧需要大担当。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应运而生，得到 6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响应；中国提出的亚投行应运而生，得到 57 个国家响应。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开始被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接受，中国梦与沿线国家及其他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一个古老大国的胸襟和风范必将造福中国人民，必将造福更多的国家和人民。

2. 树立崭新理念，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以“五通”为核心内容的对外开放的全新格局

中国与更多国家携手建设“一带一路”，形成内外联动、海陆统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使古老的“丝绸之路”延伸至现代版的国际“大合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建设“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是“五通”，“五通”是共建国际化、社会化、信息化、共享化的更有效率和效益的“大流通”，是通向更加美好未来的“中国梦+”，是通达造福更多国家和人民的正确路径，中国将与沿线国家共同开创开放开发的崭新格局。

一是政策沟通，形成相向而行的共同战略和政策选择，为沿线国家相互开放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取得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共识，构建沿线国家多层次政府间经济发展战略、宏观经济政策、重大规划项目对接的机制，形成趋向一致的战略、决策、政策和规则，结成更为巩固的“命运共同体”，大家朝着一个统一的、共同商定的目标“齐步走”，这无疑将成为世界当代发展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是设施联通，形成“硬联通”与“软联通”共同推进的立体化经济走廊或通道，共享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机遇。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创造性的连接都会使区域经济联系产生巨变，惠及更广阔的地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软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程已经开启，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等，将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信息化先导的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贯穿亚欧非，连接三大洋，把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和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家结成携手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三是贸易畅通，形成更为自由和便利的自由贸易网络体系，挖掘贸易新增长点。在

新形势下，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自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WTO），推进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受阻。推进“一带一路”的重点内容是投资贸易合作，旨在突破各种形式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及其各种壁垒。中国将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建设自由贸易网络体系，拓宽贸易领域；共同优化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服务链，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产业互补、互动与互助；共同探索新的开放开发之路，形成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

四是资金融通，形成顺应世界经济格局的金融新规则，构建支持更大范围开放的金融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都表示与亚投行合作的态度，亚投行正在激活国际金融体系和秩序的变革，改写了国际体系变革的方式。金砖国家银行筹建，上海合作组织金融机构开展磋商，“丝路基金”加快组建。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本币互换和本币结算的步伐加快，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亚洲开发银行、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中国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到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世界舞台上，一场“化蛹为蝶”超越意识形态的金融开放合作正在行进时。

五是民心相通，增强文化认同感，构筑“一带一路”开放建设的社会根基。文化的影响力超越时空、跨越国界，中国更高层次的开放是获得沿线国家和地区、获得世界各国的文化认同，具有中国智慧的“中国议题”“中国方案”和“中国声音”被拥戴。要使“一带一路”建设得到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响应，必须立足于各相关国家多元文明的群体性复兴，通过提升文化的相互开放水平，推动不同文明交流碰撞，形成更具宽容精神的共同文化和永恒价值，汇聚和释放文化促进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实现更有效率、更具包容性的增长。在开放和碰撞中，提炼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核心理念，形成自己的文化精神，弘扬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世界文化新精神。

3. 展开腾飞“双翅”，超越历史赢得未来，更加从容自信地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外开放新的里程碑，是中国面临这样的世界展开的“双翅”，必将飞向更加广阔的长空。

在国内外新形势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关于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构想的伟大实践，是中国把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合作共赢的和平理念体现到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伟大实践，是掷地有声地塑造新时期中国外交理念与格局的伟大实践。近代以来国际体系的重大变革，基本上都摆脱不了“修昔底德陷阱”，都是对原有秩序的毁灭性破坏后的重建。今日之世界面临着日益复杂和更加紧密联系的全球性问题，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和国际规范，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以不合理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已经不能反映变化着的世界，亟需进行改革。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接受者和受益者，又是全球包容性新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的作用和贡献是独特的，也是重大的。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动力、推力和定力，中国大国崛起得益于周边国家的积极参与，得益于与世界上更多的合作伙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也得益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为命运共同体。

中国超越冷战思维下形成的国际关系，在国际上占据了更加灵活主动的地位，目前已经与 67 个国家、5 个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了 72 对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伙伴关系，基本上覆盖了世界上主要国家和重要地区。中国倡导并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以正确的义利观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公共产品，展现中国大国责任，在与国际体系和世界更多国家双向互动时间中“改变自己，影响世界”，在世界的坐标系中，以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姿态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二）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建设经济通道和廊带

古代连接东西方的交通道路，有海陆两途。陆路东端起自中国渭水流域，向西沿河西走廊，进入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北非，在公元前二世纪已经形成。在东西方交往漫长岁月里，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皆经此路运销西方，故 19 世纪 70 年代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 Ferdinand Von）在《中国旅行记》（第 1 卷）称之为“丝绸之路”。海路则因之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提出的现代陆路和海上丝路的走向，如《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所提出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方向是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欧亚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通过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建设“一

带一路”，将逐步贯通和连接亚太和欧洲两大经济圈，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不久的将来，这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带”和“路”，一定能成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带和共同发展之路，同时为各国各方携手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创造有利条件，从行动上改变历史上“国强必霸”的逻辑以及现实区域合作中大国以权力损害小国利益问题。“中国创意”“中国方案”“中国倡议”，充分展示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和谐发展的真诚，充分展示中国将自己的发展与惠及各国发展结合起来的广博胸怀，从而给沿带沿路国家带来巨大的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福祉。

（三）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将共同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创造性的连接都会使区域经济联系产生巨变，惠及更广阔的地域。“一带一路”建设是沿线各国开放合作的宏大经济愿景，各国携手努力，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就将使区域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形成安全高效的陆海空通道网络，互联互通达到新水平。预计未来几年，沿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将在以下地域取得较快进展。

1. 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

新欧亚大陆桥沿桥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已取得重要进展。连云港作为新欧亚大陆桥东桥头堡和新丝绸之路东端起点，是中国中西部地区最便捷、最经济的出海口。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部分东部沿海港口及若干内陆城市为桥头堡，以港口后方铁路为通道，以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二连浩特，以及满洲里为主要出境口岸的多条亚欧国际运输线路。其中，连云港陆续开辟了至横滨、釜山、新加坡、雅加达、曼谷等港口的多条海上直达航线，连云港—霍尔果斯等公路干线竣工、精河—伊宁—霍尔果斯等铁路工程稳步推进，基本形成点线协调、交通顺畅的中亚运输网络。中国天津陆桥和连云港陆桥较为稳定，重庆亚欧大陆桥，即“渝新欧”国际大通道发展势头良好。而作为与日韩隔海相望的青岛，也在积极创建新欧亚大陆桥，并旨在建成“一带一路”东西双向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建设青—韩（青岛—韩国）“门到门”跨境物流高速公路，充分利用胶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成为沟通陆海丝绸之路的综合交通枢纽。从当前和未来发展看，乌鲁木齐、西安、武汉、重庆、南宁、郑州等内陆港，都将是“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的重要战略

节点。广西是中国与东盟海陆相连的省区，海岸线达 1595 公里，与东盟“一湾连七国”，拥有防城港、钦州、北海等北部湾良港。北部湾港开辟了至新加坡、曼谷、海防、胡志明、巴生等港口的多条国际直达航线，并建立以钦州为基地，覆盖东盟国家 47 个港口城市的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

2. 中巴经济走廊

巴基斯坦地理位置堪称“交通要道”，具有重要地缘优势。2013 年上半年，中巴两国高层互访后，双方启动“中巴经济走廊”规划建设事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能源是中巴经济走廊联委会讨论的重点问题，双方都在积极推进喀喇昆仑公路、加达尼和塔尔能源项目、瓜达尔港口运营、卡拉奇—拉合尔高速公路等项目等，加快建设“中巴经济走廊”。这条经济走廊使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经新疆与南亚区域连接起来。

3.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积极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并向西北延伸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进入欧洲，形成第三欧亚大陆桥。逐步形成泛亚铁路网的西线经济走廊，将中国经缅甸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乃至印尼连接起来。这些交通线路的建设将推动并形成这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增加各国的就业，逐渐形成为这些交通网络服务的和相关的产业集群，并由此通过产业集聚和辐射效应带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提升相互依存度。目前，已经形成 BCIM（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及 GMS（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开放两翼。云南北上可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下可连接“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唯一可以同时从陆上沟通东南亚、南亚的省份，具有“东连黔桂通沿海，北经川渝进中原，南下越老达泰柬，西接缅甸连印孟”的独特区位优势。其中云南作为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的枢纽，以及中国、南亚与东盟三大市场的联结点，将是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重要战略节点省份和城市，从而更好地发挥“西南开放桥头堡”的作用。此外，域外的曼德勒、吉大港等也是重要节点。

4. 中蒙俄经济走廊

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必须首先加强公路、铁路等互联互通建设。蒙古是中国的战略性矿产进口国，也是中国商品的重要出口国之一，蒙古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密切。目前蒙古加紧规划建设连接俄罗斯、俄罗斯太平洋港口的铁路运输网，建设与之连接的经济走廊，形成更紧密的中蒙俄合作发展格局，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共同建设哈尔滨—满洲里—俄罗斯—欧洲路径，以满洲里、绥芬河口岸对接俄罗斯和欧洲市场，拉动欧亚经济带沿线共赢发展，使俄方铁路沿线、港口都将盘活，形成辐射我国沿海各港口和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海铁联运和陆路货源地，为日本、韩国经我国海铁

联运过境出口欧洲（俄罗斯）货源提供新通道。除此之外，还需要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进行对接。

（四）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逐步形成以点带线，从线到片，促进形成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将激发和释放合作潜力。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重点、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共建自由贸易区，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使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更加紧密、往来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预计将有几个重点区域可以更快见效。

1. 中国—东盟自贸区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区域合作平台。东盟与中国陆海相连，历史上是中国移民下南洋，筚路蓝缕进行开拓的国度，是华侨华人最集中的地方，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重要支撑点。近期内建设重点是在扩大从东盟进口解决贸易逆差的同时，推进深化战略互信、拓展睦邻友好，聚焦经济发展、扩大互利共赢两点政治共识，以及政治、经贸、互联互通、金融、海上、安全、人文七个重点领域合作（即“2+7”合作进程），全面提升中国—东盟自贸区质量和标准，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在农业、渔业、能源、金融等基础产业领域加强对话和合作，建立和健全地区供应链、产业链与价值链，通过产业互动和互补，提升东盟与中国产业在全球的竞争能力。提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水平，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争取到2015年双方双向贸易额达到5000亿美元，今后八年双向投资1500亿美元，力争2020年双方贸易额达到一万亿美元，让东盟国家更多从区域一体化和中国经济增长中受益。

2. 中国—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是世界上重要的区域合作组织，2004年确立了建立自贸区的目标。2012年该地区总人口约15亿人，区域幅员近500万平方千米，有四亿中产阶级，经济总量超过1.5万亿美元，南盟正日益成为全球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以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为重要切入点，可以辐射南亚地区。近期内重点提升中巴自由贸易安排水平，启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合作机制，建设昆明—曼德勒—达卡—加尔各答的铁路或高速公路。打通中国新疆与巴基斯坦瓜德尔港以及中国云南与缅甸皎漂港的交通线，

可以使中国与中亚、南亚经贸关系更加畅通。

3. 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

海合会是西亚最重要的区域组织，由西亚社会最稳定的国家组成，通过海合会辐射西亚地区是理想选择。该区域能源资源丰富，是我国液化天然气（LNG）进口的主要来源地。该区域人口约 7000 万，面积近 400 万平方公里，2012 年经济总量近 1.5 万亿美元，进出口贸易规模为 1.2 万亿美元，人均消费水平高、市场潜力巨大。重点方向是推动中国—海合会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尽快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推动中国与海湾国家合作由能源领域合作转向产业链合作，加强双方在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与阿联酋合作建设迪拜人民币境外交易中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4. 中国—欧盟

欧盟是世界上最大区域经济组织和经济最发达和规模最大经济体，是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终点。欧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进口来源地和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中国与欧洲的冰岛和瑞士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但都不是欧盟国家。今后，中国欧盟合作的重点方向，是推动中国欧盟投资协定谈判进程，争取尽快启动中国欧盟自贸区谈判，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自贸区战略。中欧合作由贸易向投资和技术研发等重要领域转移，全面深化中欧战略经济伙伴关系。提高中国与欧洲区域合作的水平，争取使 2020 年双方贸易额达到一万亿美元。重点推进机制建设、自贸区谈判、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及毗邻区规划编制，市场开放度和贸易便利化标准化程度大大提高，未来十年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突破 2.5 万亿美元，年均增长 10% 左右。

5. 提高中国与俄罗斯的区域合作水平

力争 2020 年双方贸易额达到 2000 亿美元。中国与俄罗斯签订的一系列战略合作决定，特别是未来 20 年能源合作的 4000 亿美元大单和东西线输油管道实施，将使中俄经贸关系迈上新台阶。与中亚经贸合作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重点，已经开创了良好局面，“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对接与交融，将使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经贸关系更加密切。

（五）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推进和深化金融合作

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得到了除亚洲国家的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卢森堡等 57 个国家和地区的响应，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都表示与亚投行合作的态度。金砖国家银行和上海合作组织金融机构也在筹建之中，中国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上提出设立“丝路基金”，也将发挥独特的作用。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本币互换和本币结算的步伐正在加快，中国—东盟银

行联合体、亚洲开发银行、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正在推进。中国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中国与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合作日益紧密，推动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将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

（六）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形成互补互动的区域产业布局

“一带一路”将重塑区域产业布局，优化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跨国界、跨区域协同发展，共同提升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全面系统地推进沿线国家和地区在 APEC、10+6 等框架下的价值链合作，提升所有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共同营建有利于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核算体系与政策环境。重点建设一批跨境工业开发区、产业园区和农业示范园区。鼓励有条件的中国企业到沿线国家设立研发中心，既充分利用国外的科技资源和人才，也推动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国技术、中国标准“走出去”。设立海外营销和服务网络，开发适应当地市场需求的产品，实现产品价值链从低增值加工制造环节向高增值的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环节延伸，提高服务质量，加强沿线国家产业价值链共享。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未来十年我对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到 4000 亿美元左右，占我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30%。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开展农林牧渔业、农机及农产品生产加工等产业的合作，推进海水养殖、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工程技术、环保产业和海上旅游等产业的合作。促进沿线国家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的深度合作。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积极推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合作，推进能源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扩大服务业相互开放，推动区域服务业加快发展。

（七）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促进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文化的影响力超越时空、跨越国界，文化是“一带一路”的灵魂，唯有增强各方的文化认同感，才能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要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的魅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一带一路”国家不同文化融合发展，促进人类各种文明之花竞相绽放。“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不仅要强调经济交流、安全促进、制度建设，

更要突出文化融合，促进民心相通，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一带一路”建设的着眼点要立足于各相关国家多元文明的群体性复兴，通过提升文化的相互开放水平，推动不同文明交流碰撞，形成更具宽容精神的共同文化和永恒价值，汇聚和释放文化促进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实现更有效率、更具包容性的增长。“一带一路”建设不是某个国家的单赢，而是所有参与国家的多赢与繁荣，加强文化融合要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进而形成推动人类进步的和平观、义利观、历史观、发展观。加强“一带一路”文化融合还要消除文化障碍，突破冷战思维、凉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定式，破解西方文化的排他性，增强东方文化的亲和力和感召力，把“中国梦”同“一带一路”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同“一带一路”发展的广阔前景对接起来。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与“一带一路”各国的文化相适应、与各国社会相协调，共同以各国人民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世界文化新精神弘扬起来。中华文化要提炼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核心理念，形成自己的文化精神，使之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不可缺少的新文化元素。中国每年向“一带一路”国家提供一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资助“一带一路”国家优秀人才 6000 次来我国研修培训，支持国内高校在条件适合的国家开办国际大学或分校；鼓励中资机构、社会组织参与孔子学院建设，发挥孔子学院综合文化平台的作用；吸引“一带一路”国家的优秀大学在华开办分校或分支机构。与“一带一路”国家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周等活动；加强文化产业合作，互设文化中心，积极开展文化贸易；与“一带一路”国家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旅游精品线路和旅游产品，简化往来手续，扩大旅游规模。共同以文化产业融合共同推动相关产业发展。结合“一带一路”辐射区内的文化产业特色，通过发展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与建筑设计、工业设计、影视制作、文化旅游相融合，提升各国文化作品的科技含量，共同打造有国别特色和核心竞争力的文化品牌与产品，推动更多产业融合发展。

三、中国将在“一带一路”战略统领下，形成内外互动、互联互通、互为支撑的区域经济新布局

根据《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将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一带一路”将重塑国内区域经济布局。

（一）在新疆、福建分别建设“一带一路”的核心区

新疆位于欧亚大陆中部，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印度、阿富汗等 8 个国家接壤，陆地边境线长达 5600 公里，占全国陆地边境线的 1/4。把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可以充分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 and 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福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发源地，昔日东方大港—泉州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海丝”起点。将福建作为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将从丰富的历史积淀中汲取营养，可以从加强互联互通、深化多元贸易往来、推进海洋合作、促进人文交流等方面努力，全方位强化与海丝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

（二）塑造国内以“一带一路”为统领的区域布局

1. 从西北、东北地区看

除了新疆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亮点频仍，西安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兰州、西宁开发开放，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内蒙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黑龙江对接俄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黑龙江、吉林、辽宁与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合作，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成为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

2. 从西南地区看

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云南建设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西藏与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将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形成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构建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

3. 从沿海和港澳台地区看

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通过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舟山群岛新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都将成为“一带一路”新增长点。

4. 内陆主要从三方面与“一带一路”对接

一是依托长江经济带，对接“一带一路”战略。以海陆重点口岸为支点，形成与沿海连接的西南、中南、东北、西北等经济支撑带，推动长江经济带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构筑 H 形经济大格局。积极构建流域、陆地、海上、空域等综合交通体系，以黄金水道

贯通长江沿线 11 个地区，实现东中西的联动，减少地理空间差距。将构筑大交通和大流通格局作为具体抓手，有必要建设西安到成都、西安到重庆、西安到武汉、成都到格尔木、重庆到兰州、成都到重庆、重庆到长沙、重庆到武汉、武汉到长沙的快速通道，这主要体现在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货运铁路、特高压电网、信息高速公路、民航机场等综合型的基础设施建设上，由此推动新的“中三角”变“平”，推动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使皖江城市带、成渝经济区、黄河金三角区域、渝新欧国际大通道建设、北部湾经济区、珠江三角洲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能提升互联互通水平，促进协同发展。

二是依托中国五大港口群，全面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目前，我国港口运输行业已初步形成环渤海、长江三角洲、海峡西岸、珠江三角洲和北部湾等西南沿海 5 个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的港口群体。其中，环渤海区域港口群由辽宁、京津冀和山东沿海港口群组成，以大连港、营口港、秦皇岛港、天津港、烟台港、青岛港、日照港为主要港口，以丹东港、锦州港、曹妃甸、黄骅港、威海等港为补充的分层次港口布局。辽宁沿海港口群主要以大连港和营口港为主，成为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津冀沿海港口群以天津港和秦皇岛港为主，连接华北及西北部分省区，成为京、津和华北地区及京包、京秦、神黄铁路沿线地区外贸物资和能源、原材料运输的主要口岸；山东沿海港口群以青岛港、烟台港和日照港为主，形成新经济增长带。战略节点城市与五大港口群可充分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特别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要提升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积极拓展沿海港口集疏运功能，谋划建设向西、向北的国内乃至国际大通道，使沿海港口成为新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出海口。特别应关注阿拉伯世界中的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均是具有世界战略意义的重要海上通道，对于国际贸易尤其是国际石油运输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对于中国而言，这三条海上通道不仅是我国商品出口到西亚、非洲和欧洲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我国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关系我国国家利益在国境之外的重要延伸，其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海上贸易往来特别是能源进口的战略利益。同时，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连接瓜达尔港、关丹港、比雷埃夫斯港、科伦坡港、亚丁港、塞得港、雅加达港、新加坡港，通过一系列交通体系建设，打破现有世界经济地理格局，重构全球性物资运输网络。

5. 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对接“一带一路”战略

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形成世界级大城市群和大首都经济圈，不仅使北京和河北腹地成为沿海地区，而且通过协同发展，成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节点和支点。北京为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四大中心；天津为全国先进制造业研发基地、国际

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示范区和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腹地将成为沿海地区；河北为商贸物流基地、生态环保与涵养、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转型升级基地。京津冀首先进行重点交通、环保和产业对接，将使三地经济发展融为一体。

四、把握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几个关系

（一）正确把握“带”和“路”的关系，在统筹黄色国土发展与蓝色国土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拓展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与融合

《愿景与行动》指出：“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倡议与沿线各国共同搭建的一个开放平台，是一个放眼更大区域合作、携手更多国家合作、创造更高层次合作的整体布局，但又各有侧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是我国向西开放布局连接中亚、西亚、蒙古、俄罗斯直至欧盟陆地，我国中南、西南开放布局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合作之“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是加强我国由海路与东亚、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乃至欧洲、非洲的开放合作之“路”。“一带一路”中“带”和“路”的关系，实质上是在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中，在统筹黄色国土发展与蓝色国土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拓展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交流与融合，创造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机遇与成果、共建合作发展经济走廊和经济带、共赢未来美好愿景的重大“中国创意”和“中国方案”，是向世界发出的“中国声音”。“带”的重点是黄色国土连接的西向开放，“路”的重点是蓝色国土面向的东向开放，形成了新时期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外交“两翼”。这“两翼”就是中国阔步走向世界的两个翅膀，一边西进，一边东拓，这并不是说明我们要和这些国家结成同盟国，而是诠释中国要与更多的国家结伴前行，和这些沿线国家建立更加紧密、更加友好、更加包容、更加持久的经济、外交、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崭新关系。

（二）正确把握“点”和“面”的关系，在加快自身改革和推进自由贸易区试点的基础上，主动对接高标准贸易和投资规则

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就必须加快自身改革，建立与更多国家、更高标准贸易与投资规则顺畅对接的体制机制。中国只有在规则上向高标准看齐，才能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起到更加积极的带动作用。加快改革，抓好试点，是我们在“一带一路”新一轮开放发展布局中的关键一招。为了适应国际上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和投资规则，上海自由贸易区试点先行一步，广东、福建、天津自贸区试点各有侧重。这些试点和以前改革的方法所不同的，以前的试点可以慢慢地试，可以摸着石头过河，过不去再回来。现在我们的试点，有明确目标和时间表、路线图，有倒逼机制，搞这些试点是为了更大范围应用，必须可复制、可推广。上海自贸区、广东、福建、天津自贸区试点，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适应面向沿线国家乃至面向全球对外开放发展的需求。中国正在加快与美国进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启动与欧盟进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外商投资实行“负面清单”管理，这对中国的政府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全球有 77 个国家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其中有不少是沿线国家。目前，上海自贸区试点的“负面清单”已下调到 122 项，这是很大的进步。应该看到，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不仅仅是保护外商在中国的投资，在对方国家也将用同样的管理办法对待中国企业的投资。中国对外投资额已经排到世界上的第三位，随着更多企业“走出去”成为跨国公司和国际化企业，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也亟需得到保护。中国的市场是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度一体化和自由流动，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双向的，这与改革开放初期不一样，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重在“引进来”，主动打开国门，是单向的；现在我们一方面继续吸引外资，利用外资搭载的各种要素，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到了非洲，到了欧洲，到了美国，到了很多沿线国家，这就需要中国在新一轮开放中，不能是跟班者、是应对者、是被动接者，而是要从跟班者到引领者，到新规则的参与者、制订者。要打开面上的局面，就必须试点先行，试点快行，使试点成为推动中国加快变革的示范。中国抓紧进行试点目的、试点的路径和试点的作用都是为了“面”，都是为了使中国更大程度的参与世界经济发展，更大程度地发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三）正确把握“内”和“外”的关系，在中国区域布局不断整合和调整优化的基础上，形成内外互动、内外互补、内外互通的新格局

“内”和“外”的关系，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多微妙变化，中国有 1.8 万公里的海岸线，有 2.2 万公里的边境线，过去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下一轮的对外开放的重点和前沿，除了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形成沿海全岸线的开放带和产业带，更为重要的是，将产生中国最大的开放前沿，这就是以 2.2 万公里边境线为主的“沿边”开放对接“一带一路”，将成为最大亮点。如国内“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地区新疆，边境线长

5680 公里，与哈萨克斯坦等几个斯坦国接壤，这几个斯坦国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关键地位，中亚一直到南亚到欧洲，新疆作为与中国接壤的这些国家的最前沿，就使新疆在全国的地位从过去的腹地变成现在的前沿，新疆的区域定位就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经济走廊或战略通道。过去我们可能注重“内”，忽视“外”，将来在“一带一路”新的布局下，很多看问题的角度和处理问题的方法都需要改变。比如对我们的产能问题就要重新看，应把我们的产能放在“一带一路”甚至更大的范围来看，有些产能可能就是我们的竞争力，就是我们的优势，如果仅仅放在国内用不完就认为过剩了，然后就将其消灭掉了，那可能就是损失。中国制造业产值 2011 年占到世界的 19.8%，跃升为世界第一位，这是来之不易的优势。美国、欧盟和日本向制造业回归，实质上就是要重新取得制造业发展的优势，重振制造业，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再平衡。把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复制和发展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使中国及其更多国家共同获得发展机遇。

（四）正确把握战略节点，战略通道和战略腹地之间的关系，形成国际大通道、沿线中心城市、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互为支撑的集成优势

《愿景与行动》指出：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欧亚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这些战略节点、战略通道和战略腹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非常重要，那些具有综合优势或集成又似的地方尤为重要。比如国内长江经济带黄金水道，像重庆、成都、泸州、宜宾等地，组合起来既是战略腹地，又是战略通道，又是战略节点，又是战略载体，组成了长江的枢纽港。现在的铁路蓉新欧、渝新欧、郑新欧、兰新欧或者义新欧，都通过通过乌鲁木齐到达中亚、南亚到达欧洲，如果形成一个一体化的规划，可以形成更有效率的立体交通枢纽中心，与各条支线联通，就不至于出现国内自身的恶性竞争和无序对接沿线国家的问题。中国沿海港口的发展也是如此，如果形成枢纽港、支线港和喂给港分工合理的港口群，产生的组合力量将会是非常巨大的。

在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发展中，也应特别重视这些具有国际大通道、沿线中心城市、重点经贸产业园区综合优势的地方，使之成为“一带一路”上的重要支撑。习近平主席 2015 年 4 月访问巴基斯坦，确立了以中巴经济走廊为抓手，以瓜达尔港、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为重点，形成“1+4”合作布局的共同发展路径。这就为中国推进与

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塑造集成发展优势，提供了新的示范。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构建新的发展领域、发展空间和发展理念，是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必要历练，是中国力争实现“奋发有为”抱负的外交主旋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崛起的标志性战略，是习近平主席对中国大周边环境的创造性思考和贡献。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将开辟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的新征程。

五、建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效机制， 逐步形成体制化机制化安排

建设“一带一路”，要建立长效机制，促进各方在经贸往来、文化交流、能源共享、安全保障、生态保护和公共物品提供等多领域形成更广泛、持久的合作机制，让“一带一路”涵盖的国家更多，涉及的领域更广，合作的程度更深，发挥的作用更大，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充分利用现有的多边合作机制，同时创新多边合作方式

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进程中，应充分利用、完善、整合和对接现有的多边合作机制和平台，具体包括 APEC、上海合作组织（SCO）、亚信会议（CICA）、中国—东盟“10+1”、亚欧会议（ASEM）、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亚洲合作对话（ACD）、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博鳌亚洲论坛等。

继续发挥沿线各国区域、次区域相关国际论坛、展会以及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欧亚经济论坛、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及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前海合作论坛等平台的建设性作用。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并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区域经济合作谈判，重视与欧亚联盟的对接。并在利用和整合现有多边机制基础上，探索发起建立“一带一路”多边合作机制和平台。

（二）完善双边合作机制，有效地进行重大规划和项目对接

在已有的合作平台和机制基础上，与沿线国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双边联合工作机制，制定“一带一路”的建设实施方案、行动路线图，明确双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职责。充分发挥现有的联委会、混委会、协委会、指导委员会等双边机制作用，与沿线国家相关部门主动联络，共同协调推动合作项目实施。对重点国别、优先领域和关键项目，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对于已有的跨境合作区，应充分发挥双边经贸合作

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关键作用，对合作意愿较强的国家，双方可共同编制“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推动签署合作备忘录和协议，确定双方合作的领域、项目、投资主体等内容，尽早建设一批取得积极成效的合作典型项目。

（三）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通关机制，推进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激发释放合作潜力。与沿线国家宜加强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海关合作，以及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统计信息等方面的双多边合作。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推动口岸操作、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的有机衔接，形成统一的运输规则，达到“一次通关、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便捷通关目标，降低国际运输成本和提高贸易物流便利化水平。推动与沿线国家海关监管和检验检疫标准互认，实现检验检疫证书国际联网核查推进海关监管制度创新，支持跨境电子商务、边境贸易、市场采购贸易等新型贸易形式发展，提高流通速度，降低流通成本。构筑与沿线国家海关的合作网络，促进信息流、资金流、货物流的安全畅通流动，实现沿线国家“多地通关，如同一关”，实现无纸化通关，实现通关信息共享、联通。加强供应链安全与便利化合作，推进跨境监管程序协调，推动检验检疫证书国际互联网核查，开展“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

（四）建立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业互动和互补机制，推动制造业产业链和价值链重构

在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鼓励建立研发、生产和营销体系，提升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鼓励中国有条件的企业到沿线国家设立研发中心，设立海外营销和服务网络，与当地共同开发适应当地市场需求的产品，实现产品价值链从低增值加工制造环节向高增值的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环节延伸，提高服务质量，逐步建立沿线国家产业价值链和产业链、供应链共享体系。鼓励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较高技术水平的高铁、核电、发电及输变电、轨道交通、工程机械、汽车制造、电子信息和通信等行业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兴业。推动新兴产业合作，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促进沿线国家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推动建立创业投资合作机制。支持轻工纺织、食品加工等行业企业，到劳动力资源丰富、靠近目标市场的沿线国家投资办厂，扩大境外生产经营，带动周边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也鼓励更多的国外企业到中国投资兴业。

（五）继续深化和利用好现有合作平台机制，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务实合作

通过与有关机制形成互补关系，加强规则的制定与对接，形成照顾各方舒适度和柔性的联动机制。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要充分利用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机制、中国与东盟“10+1”，全面加强“一带一路”下的双边、区域、多边合作机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加强互动、互助、互信，以开放、包容、精神，对待分歧，以建设性和创新性的态度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以长远和战略的眼光谋划共同发展，确保各国参与和合作有利益交融点。要把“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变为现实，必须脚踏实地地、过细地、有序地做好工作，改变以往运动式、单打一的方法，深入沿线国家和地区深入调研，真正了解“沿带沿路”国家和地区的诉求，调动这些国家和地区参与的积极性，同时有针对性地解决国内存在的问题，形成务实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方案和行动。

（六）强化政府间合作交流机制，形成多方面推进“一带一路”的积极性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的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并持续健康运行，取决于各国参与的内在战略利益和积极性。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利益诉求各异、国家间关系错综复杂。对沿线国家应分类指导，一国一策，突出重点，全面推进，做实做细政府间合作，在中国政府发布愿景与行动方案后，应尽快研究双边或多边可接纳、互动互补、操作性强的“一带一路”规划或项目方案。应与各沿线国家和地区通力合作，稳步实现与沿线国家形成互动的战略谋划和战略布局，形成互利共赢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形成高度共识的基础上，构建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政府间交流机制，注重充分发挥现有的联委会、混委会、协委会、指导委员会等双边机制作用，国内各部门应有组织地与沿线国家相关部门对接，协调推动合作项目实施。调动沿线国家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深化利益融合。注重在已有的合作平台和机制基础上，与沿线国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双边联合工作机制，充分解释我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战略意图，在合作规划的基础上，制定“一带一路”的建设实施方案、行动路线图，明确双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职责。注重发挥我驻外使领馆和国内外智库的作用，有分工地加大国别研究，密切关注各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反应，收集各国的合作意向、项目建议，跟踪反馈项目执行中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七）加强智库合作，抓紧与相关国家合作研究彼此可接纳、可互动互补、可实施的共建“一带一路”实施方案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的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并持续健康运行，取决于各国参与的内

在战略利益和积极性。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利益诉求各异、国家间关系错综复杂。应特别注重智库合作与交流，与沿线国家智库共同谋划分类推进的方案，突出重点，全面推进做实做细政府之间的合作，尽快制定研究双边或多边可接纳、互动互补、操作性强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当前非常关键的是发出明确的信号和各国可接纳的方案，切忌“闭门造车”，以自己的主观臆断和意愿，来设计别国如何参与和与我对接。而应与各沿线国家和地区通力合作，形成更为开放的操作性强的工作方案，取得共识后在公开公布并实施。应继续加大高层互访，加强高层互访的引领作用，稳步实现与沿线国家形成互动的战略谋划和战略布局，形成互利共赢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形成高度共识的基础上，构建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政府间交流机制。国内各地方、各部门应有组织地与沿线国家相关部门对接，协调推动合作项目实施。与沿线国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双边联合工作机制，充分解释我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良好愿景，在合作规划的基础上，制定“一带一路”的建设实施方案、行动路线图，明确双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职责。注重发挥我驻外使领馆和国内外智库的作用，有分工地加大国别研究，密切关注各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反应，及时发布国别风险评估和投资项目评估的指导性信息，收集各国的合作意向、项目建议，跟踪反馈项目执行中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并及时向“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反馈。注重一国一策的战略设计，对合作意愿较强的国家，可共同成立“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编制小组，签署双边合作备忘录或协议，确定双方合作的领域、项目、投资主体等内容，尽早建设一批取得积极成效的合作典型项目，并对其他沿线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责任编辑：沈家文

· 宏观经济 ·

深化改革开放 全面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关于“十三五”时期扩大对外开放的思考

霍建国

摘要：“十二五”时期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快车道，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以及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框架已基本形成。当前，世界经济将步入稳定发展新阶段，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将进一步加强，合作形式将不断创新。“十三五”时期，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环境也将呈现出新特点并面临更多压力和挑战，在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海外投资方面要形成战略重点。我国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方面已实现了有效的突破和起步，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重点包括加快市场开放的制度性建设、把握好对外开放顺序和节奏、积极主动参与多边体制建设和全球经济治理、加强国际风险防范及提高国际事务的应变能力。

关键词：改革开放 “十三五” 开放型经济

作者简介：霍建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十二五”时期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快车道，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以及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框架已基本形成。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引下，中央政府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本特征，科学决策坚持了以对内深化改革释放体制机制活力、以对外扩大开放寻求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在调结构、稳增长、促转型的发展方针

指导下，我国的经济总量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从全球大趋势看，未来五年世界经济仍难以回归常态增长，债务危机、资产泡沫、资源能源波动在所难免，欧美主导世界的格局仍难以发生根本改观。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同发达国家的矛盾将日益凸显，维护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加强全球治理的难度将进一步上升，大国之间的竞争以及地缘政治的冲突和风险仍难以避免。总体判断，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对我国有利，我国仍处于关键的战略机遇期，为此，应科学谋划、统筹安排好“十三五”时期的各项工作。

一、“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

（一）国际经济环境

世界经济虽已表现出温和复苏迹象，但仍面临基础不稳、动力不足、速度不均等问题。“十三五”时期，世界经济将步入稳定发展新阶段，随着我国的崛起，大国利益与国际竞争格局将发生新变化，作为全球贸易投资及国际经济合作的最活跃参与方，新型经济体的作用及影响力将继续处于上升势头，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将进一步加强，合作形式将不断创新，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世界经济将逐步回归稳定增长期。金融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下行趋势将基本结束，发达国家将加快对其经济发展模式的修复与调整，发展中国家也将进行经济结构的重新定位，预计全球经济增长可稳定在3.5%左右，发达国家平均增速将略高于2%，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速约为4%，新兴经济体高速增长格局有所减缓，但仍可维持5%左右增速。

二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当前，全球化陷入低谷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中的利益分配不均以及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收益减少，所以发达国家推动全球化的意愿降低。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逐渐认识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对全球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从而转向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及自贸区建设。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将进一步发挥其在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的积极引导作用，并在推动形成国际多边贸易投资体制方面有所突破，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作用会有所恢复，全球经济治理将面临新的矛盾和挑战。

三是国际分工呈扁平化发展趋势。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及商业模式创新正在迅猛发展。国际产业链条上高劳动生产率的竞争优势与低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之间相互配置机会增多，微笑曲线趋向扁平化，模块生产、电子商务、订制服务、服务外包、特许经营、技术许可等非股权化的国际生产经营模式日益重要，国际分工体系将会进一步呈现多元化特征，产业结构的开放效应进一步显现，新的技术革命及“互联网+”等模式将对我国产业升级形成新的挑战。

四是市场开放和投资便利化加速推进。进一步降低关税和消除阻碍要素跨境流动的障碍、降低交易成本、建立高效的贸易投资便利体系等将成为多双边、区域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将取得重大进展，新的全球贸易规则影响增强，市场准入、国民待遇、产业竞争政策、投资促进等都会向有利于投资便利化方向发展。

（二）国内经济环境

1. 国内经济环境新特点

我国经济在“十二五”时期基本处于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经济结构的调整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强化，加之已形成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优势，“十三五”时期，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环境也将呈现出新特点。

一是高标准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在国内四大自贸区的实践基础上，我国将基本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随着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的不断开放，经济结构调整将初见成效，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法制营商环境的建立将有利于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局面，有利于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在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上将提高对土地、环境、能源、劳动力等要素资源的使用效率。二是新一轮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将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提升产业层次、延长产业链、扩大消费规模、消化过剩产能，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作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点，通过设立自由贸易园（港）区提高自主开放水平。三是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增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市场竞争环境将日趋公平，法制化营商环境将有所加强，有利于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减少对市场主体的束缚，培育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通过跨国公司这一全球化的载体实现对品牌、专利、技术、营销渠道的控制力，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四是产业结构将呈现新变化。经济格局将逐步从工业经济为主向工业经济与服务经济并重转变。国内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调整和转移将有所加快，大型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将成为我国的主导产业，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两化融合以及与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地位将不断提高。

2. 国内经济发展的压力与挑战

“十三五”时期，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将面临更多压力和挑战，尤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标准国际贸易规则影响力将对我国形成挑战。“十三五”时期，美国等发达国家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

(TTIP) 和“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 谈判将陆续取得成效, 这些主导国际贸易投资的新规则制定和普及将对我国构成新的压力, 并影响我国参与制定新规则的话语权, 届时我国将面临市场开放和适应新规则的双重挑战。二是贸易摩擦会进一步升级。随着我国一般贸易出口比例扩大、电子商务等信息化水平提高, 我国在高科技领域和高端制造业同发达国家的产品竞争将进一步加剧。同时, 随着部分新兴经济体出口能力提升, 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我国仍将继续面临来自部分新兴经济体的竞争。三是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加剧。“十三五”时期, 我国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价格上涨现象依然持续, 产业结构调整仍面临艰巨任务, 对外产业竞争力不强、对内结构性失业将形成主要矛盾。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市场化虽有利于促进公平的竞争环境, 但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 金融波动风险将进一步上升, 能源需求、资源短缺状况有所缓解, 但环境保护压力增大。此外, 政府债务风险、银行呆坏账风险等也需要加强防范。

二、“十三五”时期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思路

(一) 发展对外贸易方面

“十二五”时期, 我国巩固了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的地位, 但增长模式主要是依靠外部需求拉动、传统优势要素拉动, 贸易结构和竞争力仍存在较大调整、提升空间, 服务贸易呈现较大逆差。“十三五”时期, 如何建立新的内生增长驱动模式, 将成为我国外贸稳定增长、贸易强国地位能否稳固的重大课题。因此, “十三五”时期我国对外贸易的战略重点应在以下几方面有所加强。

一是转变政府职能, 继续推动市场化进程。“十三五”时期要进一步加强市场开放的法律体系建设, 简化市场准入条件及政府的行政审批, 不断提高政府对企业的服务水平。加强外贸政策的统一性, 促进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衔接及互动, 提高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 逐步形成外贸与内贸, 外贸与援助以及利用外资、“走出去”的联动发展格局。二是自主降低关税, 推动贸易便利化。为适应全球自贸区发展的新格局, 我国除主动履行与相关自贸区国家的关税减让外, 更应实行主动的降税过程以适应新的竞争格局。探索建立与国际高标准贸易规则相适应的贸易便利化促进体系, 加快市场体系建设, 加强诚信体系和电子商务建设, 加快推动单一窗口建设, 简化和协调贸易程序。三是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坚定不移地发展对外贸易仍是“十三五”期间的重要任务, 关键是要在培育竞争新优势方面下功夫。培育以技术、质量、品牌、服务为核心的对外贸易竞争新优势, 推动海外营销网络的建设, 建立促进外贸发展的创新体系, 推动传统产业通过创新升级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积极推广贸易方式和商业模式创新, 加强对大数据背景下的电

子商务、网络贸易、运输工具和新结算方式的应用与普及。四是提高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服务贸易的巨额逆差是“十三五”面临的重要课题，要采取有力措施扭转服务贸易发展的被动局面。通过扩大服务业开放，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构建公平竞争的服务贸易市场环境。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提高服务外包发展水平。建设为出口企业提供设计研发、公共实验室、试验检测、注册认证、信息咨询、展示营销和仓储物流等服务的公共平台。推动营造有利于中小型服务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从税收和融资环境等方面入手，逐步建立适应服务企业发展的长效税收政策体系。

（二）扩大利用外资方面

“十二五”时期，我国利用外资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呈现增长低迷态势。“十三五”时期，我国仍面临着稳定扩大利用外资的艰巨任务，要着力改善利用外资的环境，切实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是确保“十三五”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一环。随着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加大引资政策的优惠力度，我国利用外资面临激烈竞争，必须继续采取有效的鼓励外商、外资策略，实行积极、主动的利用外资政策，将扩大利用外资同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产业竞争力、加强在国际分工中的影响力结合起来，保持利用外资的稳定增长。战略重点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营造公平法制的营商环境。完善法律法规，出台外商投资法，规范市场竞争行为，抑制垄断性行业的发展，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发展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投资审批便利化，在外商落户、办理手续等方面提高服务意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积极探索、统一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二是完善利用外资政策。制定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与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相适应的产业引资政策。完善外资开放领域、鼓励投资领域及新型利用外资方式。开放重点产业和机械制造业外商参与兼并收购的政策，赋予外商投资企业享受国内技术创新和研发的相关支持政策。三是引导外资流向。采取差异化引资战略，促进沿海东部地区提升服务业利用外资水平和规模，适当开放具有投资价值的服务领域，积极稳妥扩大金融保险、增值电信等各类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促进中西部地区加大制造业利用外资力度，放宽中高端制造业外资准入条件，支持鼓励中西部地区建立产业转移承接基地。四是逐步赋予港澳台企业内资待遇。继续创造条件发挥和利用好港澳台资本，在“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和“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合作框架下，探索在部分领域给予港澳台企业内资待遇，并逐渐推广至赋予港澳台企业全面内资待遇。

（三）鼓励海外投资方面

“十二五”时期，我国对外投资预计年均增幅超过 15%，投资领域和国别日益广泛，商贸服务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合计占对外投资总额的 90%，香港、东盟、欧盟、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日本等七个国家和地区占对外投资总额的 75%，对外投资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十三五”时期，在延续“十二五”鼓励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基础上，“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的加入更加丰富了我国海外投资的内容，应重点实施三方面的战略。

一是大产业链促进战略。树立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的思维，鼓励传统产业有序向境外转移，建立我国的海外制造业基地，延长我国的产业链。为企业产业链转移形式的对外投资提供相应便利化支持，为企业资产整合提供法律支撑。推动银行、保险、仓储、运输、批发零售等配套产业和价值链向境外延伸。二是境外经济合作区建设战略。提升我国现有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发展水平，实行更为积极灵活的便利化措施，推动边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成为集边境贸易、加工制造、境外资源合作开发与深度加工、生产服务以及区域性物流集散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园区。在“一带一路”沿线建立境外经济合作示范区，扩大境外经济合作区建设。三是商贸流通企业“走出去”促进战略。积极推动国内商贸流通企业和服务业到国外设点。鼓励产销一体化的企业在国外设立特色批发市场，建立营销网络和配送中心，培育全产业链的商贸流通跨国企业。

此外，要巩固海外主要市场商业存在的影响力。支持贸易促进机构在海外主要市场布点，并提供投资咨询和服务。继续推行海外并购便利化，提供海关、税务、银行、外汇管理等方面的便捷措施，鼓励企业扩大海外投资领域。加强海外经营队伍培训，提高海外经营的能力和水平。

三、加快构建和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从总体目标看，就是要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内外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期达到以开放促改革的目的。

（一）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已取得的成效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从一年多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看，可以说在构建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方面已实现了有效的突破和起步。

一是在放宽投资准入方面，我国通过设立上海自贸区成功的引入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进行了大胆尝试，突破了服务业一些领域的开放，并在金融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方面探索了许多新的管理模式。在总结完善可供全国复制的有效经验基础上，去年底国务院又通过了广州、天津、福建三地设立自贸园区的申请，以及扩大上海浦东服务业开放试点的意见。与此相配套的是，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对上海采用的负面清单进行修订和完善，以实现进一步对目录清单的削减，扩大市场准入的范围。与此同时，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也正在积极推进之中，并有望取得积极成效。这些改革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制度性安排，涉及到我国利用外资法律法规的完善和修改，以及服务业扩大开放问题，更重要的是涉及到开放后、事中事后的监管能力问题。

二是在大规模“走出去”和高水平“引进来”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全国各省市积极行动起来，参与“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形成了中西部扩大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一带一路”愿景也受到了沿线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我国倡议建立的“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获得了亚洲及世界上众多国家的认可和支持，进展十分顺利，扩大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三是在自贸区建设方面，我国已成功结束了中韩和中澳自贸区的实质性谈判，今年将付诸实施。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加快落实同东盟自贸区的升级版安排，这些协议的签署与落实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并将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在投资协定谈判方面，我国已先后宣布同中美、中欧在负面清单的基础上开展谈判，并已取得了积极进展。这些开放安排将进一步促进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并形成开放促改革的新局面。

四是在扩大内陆、延边的开放方面，中央提出的促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正在形成长江中上游扩大开放的新格局。2015 年 4 月，国务院通过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这将有力地促进长江中游武汉、南昌、长沙一带城市群的综合发展优势，并形成长江中上游的新增长点，同时也将有利于促进我国内陆地区的对外开放进程。

（二）我国构建全方位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点工作

从目前的发展进程看，我国构建全方位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包括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创新利用外资管理体制、进一步减少负面清单、扩大服务业开放、落实金融改革和资本项下的可兑换以及加快建设公开、透明、法制的营商环境等，这些都是我国面临的改革开放焦点和难点问题。为此，应重点

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加快市场开放的制度性建设。在投资体制方面，调整投融资政策，继续修改放宽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创造条件加快修订并公布统一的负面清单；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和下放审批权限，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的市场准入，降低中高端制造业的投资准入，允许外资在大部分领域自由登记开办企业。在融资体制方面，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应进一步规范和放宽对民间金融机构资质的审批，形成统一管理、竞争有序的金融体系，分阶段推进资本项下的可兑换和继续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快落实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积极支持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充分发挥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服务升级的支持作用。

二是把握好对外开放的顺序和节奏。我国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加快推进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形成新的对外开放红利，仍是当前面临的主要任务。因此，要把握好对外开放的顺序和节奏，更要注重对内对外开放的结合，选择有利于增添经济增长活力的领域，率先实行开放。例如，要进一步加大制造业开放力度，有选择地开放服务业。对于压力较大的行业可采取分阶段、分步骤的开放措施，将开放的力度与开放后的事中事后监管能力及风险防控能力统筹结合起来。在推进自贸区建设中，要加大工业品关税的降税力度。在服务业开放方面，要全面落实商贸流通、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和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开放安排，创造条件逐步实现金融、保险、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电信等行业的扩大开放。

三是积极主动参与多边体制建设和全球经济治理。更加深入全面地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提出新的治理理念和新的维护世界经济公平公正的制度性安排意见，继续发挥我国在 WTO 中的影响力，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不断提高我国在制定国际贸易规则中的参与力度和影响力。积极大胆拓展自贸区的发展空间，科学地把握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运营模式，并使其发挥积极作用，树立我国良好形象。

四是加强国际风险防范，提高国际事务的应变能力。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增强和国际影响力上升，如何保护我国的海外经济利益，是当前大国竞争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为复杂，大国竞争、金融动荡、商品市场震荡、地缘政治、地区冲突风险日益上升。因此，我们要把握好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和突发事件可能产生的影响，要提高对各类风险的防范意识，加强战略研究的预警分析，处理好海外利益扩张同国际利益安全的平衡，不断提高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安全的能力和水平。

责任编辑：李 蕊

中国中高速增长の区间、 条件和政策选择*

汪红驹

摘要：美欧日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表明，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的增长速度下移是自然现象，经济结构调整是适应经济增速下移的必然要求。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也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自然现象。中国当前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优于中高速增长经济体的对应指标。中国有条件、有潜力保持中高速增长，中国即将进入中高速增长与中上等收入相匹配的新常态，勿需过分担忧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在经济增速换挡期，伴随着经济增速下移产生了一些问题，因而中国需要平衡“调结构”与“稳增长”的关系。中国应坚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调结构”为着力点，释放改革开放的红利，统筹考虑“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发挥好市场机制的作用，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内生动力，防范经济增速过于快速下滑的风险。

关键词：中高速增长 中等收入陷阱 新常态 宏观调控

作者简介：汪红驹，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综合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粗放

*本文受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重大招标项目《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创新和改革研究》、中国社科院财经院创新工程（项目号 2015CJYCX08）的资助，特此感谢。

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本文首先比较美欧日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然后利用世界银行的数据库界定 1960 年以来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区间，并选取中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的国家和地区为样本点，将中高速增长经济体的主要宏观指标与中国进行比较，阐述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有利条件和潜力，最后结合当前中国在经济增速换档期遭遇的一些短期问题，提出中国应当采取“调结构”与“稳增长”相配合政策的建议。

一、美欧日长期经济增长减速的经验事实

（一）美国长期增长率下降，受科技创新推动，在二战后经历了一个大循环式回升回落的过程

美国在 1865 年南北战争后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府，开启了以第二次工业革命为核心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繁荣时期，从此时起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铁路建设、住房建设、移民涌入、农业开发导致的经济快速发展使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Kuznets，1977）。根据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统计资料（Gordon，1986，NBER data），1875 年至 1939 年间有七年美国实际国民经济产出的增长率为两位数，分别为 1879 年的 10.4%、1880 年的 14.19%、1895 年的 11.8%、1901 年的 11.7%、1906 年的 11.6%、1909 年的 12.2%、1918 年的 15.6%、1922 年的 14.8%、1923 年的 10.69% 和 1936 年的 13.7%。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1 年—1943 年），美国经济增长率超过 15%；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经济增长最高增速再也没有超过两位数。从平均值来看，1870 年至 1918 年美国国民经济产出平均增长 4.2%，1919 年至 1947 年平均增长 2.7%；二战后的 1948 年—1973 年平均增长 4.0%；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两次石油危机使美国经济增长放缓，1974 年至 1982 年美国国民经济平均增长 2.0%；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受科技发展的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率又有所回升，1983 年—2000 年平均增长 3.7%；2001 年—2011 年，美国先后发生了网络经济泡沫和房地产泡沫，这些经济泡沫破灭引发了美国金融危机，这 11 年间美国国民经济平均增长率下跌至 1.6%。

（二）欧洲在二战后追赶美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科技竞争中失败

欧美长周期的比较研究说明，大约从 1870 年开始，美国南北统一的政府架构就奠定了日后必然领先于欧洲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础，除了国内自然资源（土地、矿藏等）由于南北统一而得到扩张之外，统一后稳固的政治基础为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科技发明与创新应用及其推广所需的广阔市场创造了条件。相反，欧洲被政治分裂、战争泥

潭所拖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终于被美国甩在后面。1913 年—1950 年，美国不但避免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打击，而且吸引了大量移民，比欧洲提前 30~40 年推广应用以电力和内燃机为代表的新发明，这使美国生产率的优势进一步强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内部通过建立欧共体、欧盟和欧元区等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统一，其内部市场被放大，影响资源要素流动的障碍逐步消除；随着欧洲北海油田开发和欧佩克组织的建立，美国的石油资源优势被削弱；欧洲大量采用新技术和新发明以后，欧洲与美国前沿生产率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但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美国生产率又在“新经济”的推动下有所回升，这一次欧洲没能赶上美国，欧美差距又被拉大。美国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得益于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创新、灵活的城市用地管理条例，以及促进创新、吸引世界高科技人才移民的环境。以法国为例，1951 年—1974 年，法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为 5.3%；1975 年—1982 年，法国年均增长 2.4%；1983 年—2000 年，法国年均增长率为 2.3%；2001 年—2011 年，法国年均增长 1.2%。除了二战后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大约四十年间法国平均增长率高于美国外，此后的法国经济增长低于美国（Gordon, 2004）。

（三）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后，经济增长率下降，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泡沫经济破灭后进入长期的低增长时期

二战结束时，日本不但损失了 42% 的国民财富，战后日本经济先是经历了经济恢复期，1953 年的经济接近战前水平，随后日本进入高速增长期（1955 年—1973 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日本 1973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955 年的 13 倍，扣除物价上涨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为 1955 年的 4.5 倍，1956 年—1973 年年均经济增长为 9.2%。日本的经济总量在 1966 年追超英国，1967 年追超法国，1968 年追超西德，之后日本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美国，被称为“世界经济奇迹”。但是在 1974 年—1983 年受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日本经济十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降至 3.4%，比高速增长期经济增速下降一半以上。尽管如此，靠贸易立国的日本经济被迫加快产业结构的重组和调整，重化工结构转向知识密集型产品结构。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1972 年接近 3000 美元，到 1984 年突破 1 万美元，此时日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 1984 年—1991 年期间，在 1985 年“广场协议”的安排下，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日本中央银行为抵消日元升值对本国经济的不利影响，推行低利率政策，这导致国内资产价值膨胀，实际 GDP 年均增长回升至 4.9%。进入 1992 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受银行债务、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的长期困扰，1992 年—2011 年日本实际 GDP 年均增长率跌至 0.76%，其中 1997 年、1998 年、

2008 年、2009 年、2011 年均为负增长^①。

美欧日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说明，经济增长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国内政治环境、国际环境、人口变化、资源约束、技术创新、资本积累等因素变化而变化。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之后，增长速度下移并不可怕。只要推动改革，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增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采取合理的宏观政策，长期的经济增长是可以维持的。

二、中国经济增速下移的共识

从 1980 年—2011 年的 30 多年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 10%，目前中国社会各界似乎已形成共识，中国经过近 30 年的两位数高增长后，除了局部地区之外，全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不可能一直保持在 10% 以上的水平，也将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过渡。未来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约束因素主要表现在：

（一）人力资本约束

人口结构变化导致劳动力供给增长放缓。中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局部地区出现的“民工荒”“招工难”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2014 年末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至 15.5%，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也已上升至 10.0%。由于生育持续保持较低水平和老龄化速度加快，2012 年中国 15~59 岁人口首次下降 345 万人，2013 年和 2014 年分别减少 227 万人和 518 万人；即便是 15~64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也从 2011 年开始出现下降，2013 年为 74.4%^②。据预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于 2016 年达到峰值，总量为 9.99 亿人，之后逐渐下降，到 2020 年将下降至 9.87 亿人。在今后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城镇化加速推进所释放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劳动力人数下降的部分负面影响，但人口结构变化导致劳动力供给趋缓的大趋势已经形成。出于长远考虑，为防止人口迅速老化，保持人力资本积累的持续性，中国需要研究放宽计划生育、提高教育培训质量、吸引高技术移民等人口政策。

（二）资本积累约束

第一，资本形成的增速将随储蓄率有所下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在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同时，也将导致储蓄率下降。据测算，人口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储蓄率将下

^①参见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②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计算。

降 0.8 个百分点。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抚养比不断上升。2011 年—2020 年，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带动储蓄率下降 2.8 个百分点。随着储蓄率下降，中国资本形成的增速也会下降。第二，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这些在客观上都要求中国转变高投资、高投入、高排放的粗放增长模式，逐步提高消费所占的比重，降低资本积累的速度。

（三）海外市场需求增长放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了全球产业分工调整的重大机遇，尤其是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目前，中国高达 60% 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接近大国经济发展的极限，继续上升的空间有限。加上世界经济不景气、发达国家加紧实施内外经济平衡战略等因素，未来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逐渐递减。

（四）资源环境约束

以中国现有的发展模式和能源生产消费格局，如果中国达到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与美国享受同样的人均能源消耗，传统的世界能源（石油、煤炭等）将无法承受。早在 2010 年 5 月，奥巴马在访问澳大利亚前的白宫讲话中就曾指出：“如果 10 多亿中国人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责任。中国人要富裕起来是可以的，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出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资源环境约束和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中国在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要想继续提高人均收入，原有高投入、高消耗的发展模式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将越来越大。中国政府必须转变发展模式，如果不能成功转型，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将受到极大限制。可喜的是，2015 年 3 月 24 日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为中国破解资源环境约束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五）创新动力约束

中国当前的人均收入还处于中等收入行列，力争 2020 年实现小康社会目标。总体上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前沿差距仍很大，中国还未进入原创性社会，全要素生产率难以得到大幅度提高。这是由以下三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是短时期内技术水平难有大的突破和提高。二是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有所减弱。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城镇化过程中劳动

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再配置所带来的整体生产率上升，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来源，但我国农村可转移劳动力数量已出现下降趋势。三是市场化改革的制度效应减弱。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经济活力，提高了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然而，随着改革难度加大，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

三、1960 年以来中高速经济增长的界定

中国经济增速下移的共识既已形成，当下需要确定中高速的区间。2015 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 7% 左右，官方采用了“中高速”这一概念。这个中高速大致是在什么样的区间范围内？我们用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WDI）数据库来界定中高速增长区间。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DI）的统计数据，将 1960 年至 2013 年 215 个国家和地区的 GDP 年增长率剔除异常值后，其算术平均值为 3.78%，中位数为 3.97%。根据累积经验概率分布（见表 1），把概率分布区间分为（0，0.3]，（0.3，0.6]，（0.6，0.8] 和（0.8，1.0] 四个区间，分别对应低速、中低速、中高速和高速的经济增长率区间为（-21.8，2.0]，（2.0，4.9]，（4.9，7.2]，（7.2，21.8]。如果把位于概率区间 0.6~0.8 作为中高速的划界标准，则由其对应的分位数决定的中高速增长率区间为 4.9%~7.2%（见表 1）。

表 1 1960 年—2013 年 215 个国家和地区 GDP 增长率的经验累积概率分布分位数

	低速				中低速			中高速		高速	
经验累积概率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分位数	-21.8	-1.8	0.7	2.0	3.0	4.0	4.9	5.9	7.2	9.2	21.8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 WDI 数据计算。

四、中国即将进入中高速增长与中上等收入相匹配的新常态

从人均国民收入（GNI）来看，中国位于中高速增长国家样本点的上端。每年 7 月 1 日，世界银行根据上一年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重新对各经济体进行分类。2014 年 7 月公布的划分标准是根据 2013 年的数据计算出来的，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区间是 4125 美元至 12746 美元，总共 55 个国家。中上等收入国家平均的人均国民收入为 7597.8 美元，中国 2013 年人均国民收入为 6560 美元（统计不包括香港和澳门）。2013 年中国经济增长 7.7%，超过了我们前面界定中高速的上限（7.2%）。2013 年同时满足中上等收入和中高速及以上增长的国家只有九个，分别是安哥拉、阿塞拜疆、博茨瓦纳、中国、加蓬、哈萨克斯坦、纳米比亚、巴拿马和秘鲁。2015 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 7% 左右，

这预示着当前中国正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区域进入中高速增长区域。根据 2015 年一季度的数据分析，2015 年中国经济增速继续下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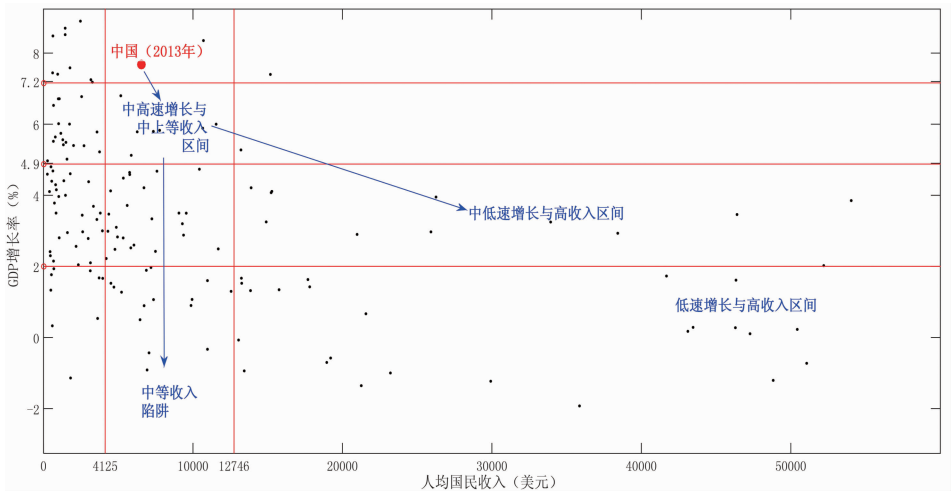


图 1 2013 年世界各国 GDP 增长率与人均国民收入分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以及根据世界银行 WDI 数据计算的估算值。

进入中高速增长区域后，存在两条路径，一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二是进入中高速增长与中上等收入相匹配的新常态，然后进入中低速增长与高收入区间。

第一条路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以色列和“亚洲四小龙”等。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总体上仍在稳步增长，俄罗斯、阿根廷、智利、巴西、马来西亚、土耳其、乌拉圭、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巴拿马、加蓬等国人均国民收入相继突破一万美元（见图 2）。从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看，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受经济危机冲击而出现的暂时性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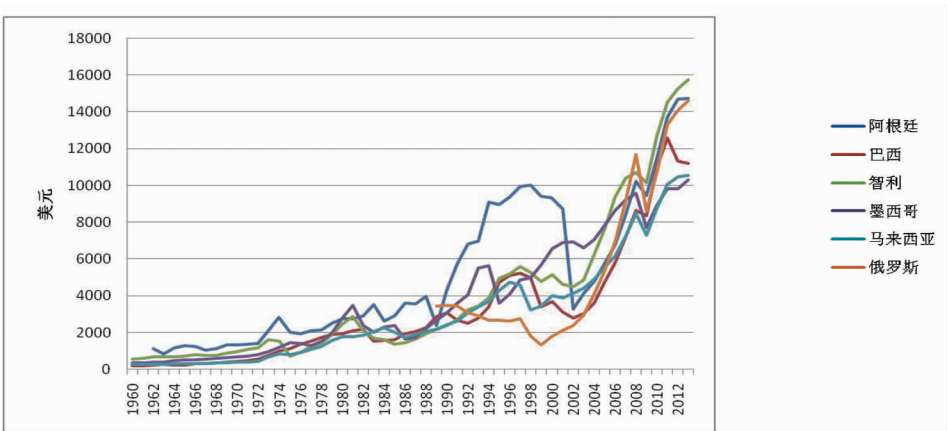


图 2 2008 年金融危机后人均 GDP 突破一万美元的部分国家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端情况，因此，对“中等收入陷阱”不应过分担忧。以拉美地区为例，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和 90 年代中后期两次受美元债务危机影响，2008 年又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拉美地区出现了三次比较大的经济波动，但经济总体上仍保持增长并向高收入区间靠近。俄罗斯、阿根廷和智利在 2011 年以后人均国民收入超过 12615 美元（这还是 2013 年中等收入国家的划分标准），已经属于高收入组。由于中高速增长区间距离低速增长区间还有很大的缓冲带，除非中国出现战争等突发性意外事件影响，中国应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条路径，进入中高速增长与中上等收入相匹配的新常态，然后进入中低速增长与高收入区间。这意味着中国即将进入中高速增长与中上等收入相匹配的新常态。今后十年中国保持中高速增长，保证位于中上等收入区间，这对于中国最终突破中上等收入区间上限，进入高收入俱乐部意义重大。根据中国 2013 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为 6560 美元来计算，初步预计 2014 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 7200 美元左右。假设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稳定，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0.0049，按照中高速增长率为 6.5% 来计算，中国需要 5.66 年实现人均收入突破一万美元的目标；而中国要达到 2013 年高收入组的底线——人均国民收入为 12615 美元，则需要 9.65 年。如果按照中高速增长率为 6% 来计算^①，中国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分别需要 6.15 年和 10.51 年。根据前面界定的中高速增长区间为 4.9%~7.2%，6% 或 6.5% 左右大约是这一区间的中线水平，中国完全能保持这一增速。

五、中国具备中高速增长的有利条件和潜力

我们把中高速增长的数据作为样本点，选择人均 GDP、通货膨胀率、货币供应、上市公司市值、实际利率、劳动人口、老龄人口、城市化比率、储蓄率、服务业比重、贸易、资本形成、外汇储备、经常账户、外债、外商直接投资（FDI）、能源进口、人均耗电、单位能耗产出等变量做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当前中国的大多数宏观指标优于国际上中高速增长样本点的宏观指标（见表 2），中国具备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有利条件和潜力。

从通货膨胀率来看，国际样本点的通货膨胀率中位数高于中国通货膨胀率，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率高于国际样本点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说中国目前已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目标。

从劳动人口占比来看，中国 15~65 岁的劳动人口占比高于国际样本点的劳动人口占比。不过，中国的老年人口占比高于国际样本点，人口老龄化是中国未来的挑战。

中国“储蓄资源”丰厚，储蓄率远远高于国际样本点的储蓄率，这也导致中国的实

^①刘世锦（2014）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将面临新常态，期间的平均增速可能降低至 6.0% 左右。

际利率较低，资本形成比重高于国际样本点，有利于资本积累和经济的长期增长。经历改革开放之后的货币化和土地资本化，中国货币供应已从高速增长阶段逐步回归至正常状态。中国上市公司市值比重上升，有助于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和价值发现功能，促进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

中国商品和服务贸易占 GDP 的比重略低于国际样本点的同一指标，但从经常账户余额占比来看，中国的情况优于国际样本点。因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被看好，中国 FDI 占比也高于国际样本点，中国外债占比不到国际样本点同一指标的 1/4。经过长期的双顺差积累，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庞大，2013 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占 GDP 比重是国际样本点同一指标的四倍左右。中国大规模的外汇储备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也为中国经济稳定和“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强大的资源保证。

中国服务业占比低于国际样本点同一指标，城市化比率已高于国际样本点的同一指标。随着城市化的继续推进，未来中国的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能源效率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中国人均电力消耗指标是国际样本点同一指标的三倍，单位能耗的 GDP 产出只有国际样本点的 62%。但目前中国的能源进口依赖度还低于国际样本点。中国在提高能源效率、发展绿色经济方面还可以大有作为。

表 2 中高速增长经济体与中国主要宏观指标的比较

指标	中高速 国家中 位数	中国历 史中位 数	中国 (2013 年)	指标	中高速 国家中 位数	中国历 史中位 数	中国 (2013 年)
人均 GDP (现价美元)	1345.0	281.0	6807.4	服务业占 GDP 比重 (%)	49.5	30.5	46.1
人均 GNI (现价美元)	1390.0	320.0	6560.0	商品和服务出口 占 GDP 比重 (%)	29.1	26.4	26.4
GDP 增长率 (%)	5.9	9.3	7.7	储蓄率 ^a (%)	20.1	40.3	51.3
通货膨胀率 (CPI, %)	6.3	3.3	2.6	资本形成占 GDP 比重 (%)	23.0	36.4	49.3
通货膨胀率 (GDP 缩减指数, %)	5.9	2.0	1.7	外汇储备占 GDP 比重	10.7	12.7	42.0
广义货币增 长率 (M2, %)	16.0	19.5	13.6	经常账户余额 占 GDP 比重	-4.4	4.9	2.0
上市公司市值占 GDP 比重 ^a (%)	25.3	33.9	44.9	外债占 GDP 比重 (%)	44.6	12.6	9.5

续表 2

指标	中高速 国家中 位数	中国历 史中位 数	中国 (2013 年)	指标	中高速 国家中 位数	中国历 史中位 数	中国 (2013 年)
实际利率 (%)	5.7	2.6	4.2	FDI 占 GDP 比重	2.0	3.4	3.8
劳动人口 (15~ 64 岁) 比重 (%)	57.5	64.3	73.1	能源进口占能源 消耗比重 ^b (%)	24.1	-1.4	10.8
65 岁以上人口 比重 (%)	4.2	5.7	8.9	人均电力消耗 ^b (千瓦时)	1082.6	548.9	3298.0
城市化比率 (%)	45.7	24.3	53.2	GDP/能源消耗 ^b (2011 年不变价美元/ 1 千克油当量能源)	7.9	4.0	4.9

注：a 为 2012 年数据；b 为 2011 年数据。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以及根据世界银行 WDI 数据计算的估算值。

这些有利的宏观指标为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提供了宽泛的操作空间。尽管当前中国财政金融风险增大，但国家资产负债总体安全，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余额均处于安全线内。银行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较高，中国政府有足够多的调节流动性的手段和工具。除了上述有利的宏观指标外，中国经济还有保持中高速增长潜力，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中国经济发展仍有巨大潜力。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中国物质技术基础日益增强，产业体系完整，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逐步提高，具有资金、劳动、科技等生产要素组合的综合优势。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行政管理体制、财政、金融、价格、城镇化等领域的改革步伐加快，不断释放制度红利，激发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二是区域差距使中国经济的回旋余地比较大。中国是一个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距都比较大的发展中大国，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和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使城市和沿海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农村和内地获得新的优势，进而使一些产业、产品的生命周期得以延长。这种跨区域的产业梯度转移和推进效应会产生新的生产力。

三是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提升。中国正在从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转型，伴随着收入和资本存量的增长，中国正在从投资和出口主导型经济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过渡。从历史经验看，这必将明显提升对服务业的需求，尤其是商贸物流、互联网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由过去的过度依赖于资源消耗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

方式转变的态势也比较明显。2014 年，中国经济实现了 7.4% 的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7%，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了 4.8%，国内消费的贡献度上升，服务业发展加快，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不断提高。

四是促进公平正义，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法治的核心价值追求。促进公平正义的新常态，在经济层面，需要在发展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规范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建立公正的市场分配结构和公正的社会保障机制，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来实现收入分配、公民发展权利和发展机会的公平正义。中国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大有作为：（1）缩小收入差距；（2）缩小明显的财产分布差距；（3）消除就业与劳动报酬中的歧视因素；（4）公平分配教育资源，创造公平的教育机会；（4）公平分配公共卫生资源；（5）完善社会保障制度；（7）促进财政体制改革，完善财政再分配功能，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公共物品的差异性。

六、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换档期的主要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随着经济增长减速，出现了企业利润增速下滑、亏损增加、财政收入增速下滑、房地产市场滞销、房地产价格总体下降、土地出让金减少、银行不良资产率有所上升、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连续三年负增长产生消费物价下行风险等等一系列问题。应该看到，中国因产能过剩严重，去过剩产能、去房地产泡沫任务艰巨，所有上述问题基本上都是去产能、去泡沫过程的自然结果。从世界范围看，经济调整有快慢之别。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通过资产市场的快速调整，修复民间资产负债表，目前其经济复苏的基础已经较为稳固。欧元区和日本进入慢调整的过程，至今仍需要大力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与世界上多数国家通过市场出清方式来去泡沫不同，中国选择了逐步去产能、逐步清理资产泡沫和地方政府债务的软着陆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意味着资源的再配置和社会福利的重新分配，需要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当前中国经济调整面临着工资刚性、债务刚性兑付、财政支出刚性三重约束，缺少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这三重约束决定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由此产生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一是地方政府债务周期进入债务处置阶段，未来任务仍很艰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

的主要风险是债务规模过大，随着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中国应对意外冲击的缓冲带越来越窄。本轮中国经济增速下行，除了中长期的结构调整因素之外，短期的周期性因素主要是债务周期。审计署在报告中指出“2012 年底全国政府性债务的总负债率为 39.43%，低于国际通常使用的 60% 的负债率控制标准参考值”，但这不足以说明中国的动态债务风险。在经济下行、生产者物价指数（PPI）连续负增长、企业利润被压缩、实际利率攀升的背景下，大规模债务的风险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因为期限错配，借短贷长的模式无法延续，债务违约不可避免。二是资产价格下跌导致抵押物价值缩水后，可能形成债务紧缩螺旋。因此，通过债务置换来防范系统性债务风险爆发，应该是当前设定“经济增长下限”的题中应有之义。2015 年中国财政部安排了一万亿地方债置换规模，标志着债务处置进入实施阶段，解决期限错配、降低利息负担、消除债务违约隐患的工作正式开始。中国财政部向地方政府下达 1 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额度来置换存量债务，置换范围是截止到 2013 年 6 月 30 日中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确定的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存量债务中 2015 年到期需要偿还的部分。据审计，截止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中国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存量债务中，2015 年到期需偿还 18578 亿元。一万亿元的总债券额度占 2015 年到期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 53.8%。但中国审计署的统计表明，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和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合计数，2013 年 6 月底是 17.9 万亿元，未来还有大量债务需要处置。

二是地方债务“刚性兑付”问题未破解，去产能过程延续，实体经济受高利率挑战。真实利率高企，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对高风险债务的隐性担保导致“刚性兑付”，抬高了无风险利率，金融资本“避实就虚”，产能过剩行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缺乏利率弹性部门的资金需求拉高了资金成本，货币市场短期利率水平降低不能有效传导到资本市场，导致名义利率居高不下。二是生产部门物价长期负增长，实体经济的真实利率上升。2012 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去产能过程已经使 PPI 连续三年处于负增长，2015 年 2 月份 PPI 负增长 4.8%。2015 年 3 月 9 日降息后，中国一年期贷款利率从 2007 年的 6.39% 下降到了 2015 年的 5.35%。如果用 PPI 来计算，中国实体经济信贷的真实利率将升至 10% 左右。再加上风险升水之后，中国现实的一年期融资真实利率应该在 10% 以上。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严重影响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和中小企业的生产活动。

三是金融条件略显偏紧。虽然自去年四季度开始，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了定向宽松、降低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但受经济下行、财政存款增加、刚性兑付、股票市场上打新股的收益率上升等因素影响，2015 年 1 月—2 月中国金融条件仍略显偏紧。主

要表现是三个方面：一是货币信贷增速放缓。虽然 2015 年 2 月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4.3%，比去年同期高 0.1%；但 M2 同比增 12.5%，比去年同期低 0.8%；累计新增社会融资总量 3.4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低 3.9%。二是利率不降反升。2015 年 2 月份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 3.64%，分别比上月和去年同期高 0.46% 和 0.63%。三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不断攀升。随着美元大幅升值，人民币被动升值，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不断攀升，抑制中国出口。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计算，2015 年 1 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较去年同期升值 6%。

七、中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政策选择

结合上述分析，中国有条件、有潜力保持中高速增长，在经济换档期，中国将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更加扎实地推进经济发展，更加坚定地深化改革开放，更加充分地激发创造活力，更加有效地维护公平正义，更加有力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中国需要正视经济减速的客观规律，将“稳增长、控风险、稳物价、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政策结合起来，统一实施，在经济减速过程中实现结构调整。

（一）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为持续增长创造宽松环境

首先，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是经济发展的首要基础，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助于控制社会阶层矛盾积累和冲突恶化的风险，从而巩固和加强团结稳定的政治环境。其次，中国在经历 30 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条件逐步成熟，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来形成中高端产品的消费市场，将为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广阔的消费需求。最后，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有助于激发广大群众的创造力，为向创新型社会的转型创造条件。

（二）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结构性发展战略，稳定经济增长预期

中国可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1. 加快推进城镇化，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有序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改变中国经济二元结构的根本路径，应根据大中小城市的不同特点来推进城镇化建设，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加快改革和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加大城乡公共基础设施投资。2.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更多精力用在研究增强创新能力上，着力破除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完善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创造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动的体制环境。3. 推动“一带一路”、

“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自贸区建设等区域发展战略，加快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建设。在实施上述经济发展战略方面，财政政策要发挥其调整结构的优势。

（三）加快落实国企改革和金融改革，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释放改革红利

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更好发挥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优势。存款保险制度、利率市场化等金融改革措施将有助于降低中国市场风险溢价。期权市场建设、注册制改革、市值管理规范、资产证券化等举措将从各个层次完善资本市场。通过盘活存量资产，国有企业将面临战略性发展机会，民企也会获得新的增长动力。资本市场的完善，将进一步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推动企业创新和价值发现，释放改革红利。

（四）积极推进公共服务、资源性产品等领域的价格改革

利用当前消费物价下行风险加大的时机，加快价格改革，一方面可以理顺定价机制，另一方面有助于阻断物价下行的传导扩散。对原本亏损、享受财政补贴的公共服务，应尽快核定其真实成本和财政补贴情况，在减少或取消财政补贴的基础上调整服务价格，医疗、教育、公交、地铁、铁路运输部门等都应研究并提出价格改革方案。资源类产品应改变定价机制，通过征收环境税、推进资源税改革、取消能源价格补贴等措施，将需要内部化的成本计入资源性产品的价格。

（五）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随着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中国地产行业爆发式增长一去不复返，未来若干年中国地产投资增速可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而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去杠杆还需经历一段时间，未来几年中国可能通过中央政府和居民两个部门加杠杆的方式来化解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从各国经验来看，中国还需要通过货币宽松、降低利率来配合中央政府加杠杆。中国国内经济下滑压力增大，物价下行压力加大，社会融资成本偏高，中国政府应结合存款保险制度、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等制度改革，综合运用利率、存贷比、存款准备金率、汇率等工具，创新流动性管理工具，适度增加货币供给，降低融资成本。如果财政收入增速继续大幅下滑，有必要通过量化宽松的类似央行购债途径来增加市场流动性，最大限度地降低财政发债的挤出效应。

（六）加大投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创造吸引人才（尤其是高科技人才）、留住人才的环境，探索技术移民的政策

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之一是人力资本，发达国家在人力资本上的投入普遍高于发展

中国，美国的技术移民政策更是吸引了全球的高科技人才。中国同样需要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重点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城市职业技术教育，加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力培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坚持创新驱动，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加注重基础研究投入，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研发投入上的差距。推动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快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体系建设。完善对创新主体的激励政策，推动自主创新产品的市场化和产业化。

（七）在一线城市扩大房产税试点，支持住房刚性消费需求

一线城市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 70%，这些城市已经跨越大规模城市化阶段，依靠卖地收入来支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做法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今后这些城市的基础设施维护投入只能依靠房产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收收入来支持。尽快扩大一线城市房产税试点，这可以增加财政收入，缓解当前土地财政困局造成的资金短缺和投资下滑。扩大房产税试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房地产投机，房产税还可以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可以利用差别税率、起征点等多种手段，在房产税设计上充分考虑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也可以从交易税费、差别化信贷等政策上支持住房刚性消费需求。

参考文献：

1. 刘世锦：《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在改革中形成增长新常态》，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
2. 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3. Kuznets, Simon., Two Centuries of Economic Growth: Reflections on U. S. Experienc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7, No. 1, (Feb.), 1977, pp. 1 – 14.
4. Gordon, Robert J. , Two Centuries of Economic Growth: Europe Chasing the American Frontier. NBER Working Paper No. 10662, 2004.
5. Gordon, Robert J. , The American Business Cycle: Continuity and Change, Edited by Robert J. Gordon. NBER Studies in Business Cycles Volume 25, Univeri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6. NBER data, Tables from “The American Business Cycle”, <http://www.nber.org/data/abc/>.

责任编辑：黄启云

抓住大宗商品价格中长期低迷机遇 重构中国全球能源资源战略

王 军 刘向东

摘要：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进入中长期低迷的盘整时期，至少在 3~5 年内会维持在低位震荡，这对中国经济总体利大于弊。今后一个时期，应抓住有利时机，对我全球能源资源战略进行调整，努力扩大海外资源储备能力，加快矿山并购与投资；逐步形成需求导向的定价中心；理顺国内资源性产品价格，压缩新能源以外的各种能源补贴；深化油气等资源领域体制改革，构建多元化供应渠道。

关键词：大宗商品 全球能源资源战略 价格

作者简介：王 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副研究员；
刘向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博士。

2011 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呈现趋势性震荡下跌走势，尤其是从 2014 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快速下跌趋势，且表现出与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近似的下跌走势特征。然而，在机理及影响上，这一次下跌与 2008 年开启的下跌存在较大不同。因为这次下跌并不能完全由需求萎缩来解释，也不大可能快速反弹起来。未来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如何？将对正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产生何种影响？我国该如何积极应对？分外引人关注。

一、多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正步入中长期低迷的“冰河时代”

与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大宗商品价格暴跌暴涨不同，2014 年以来的商品价格下跌则进入了相对低迷的熊市周期。中长期来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会维持低位弱势震荡；但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出现分化，短期内不确定性较多，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料将呈现震荡分化趋势，价格波动将会有所加剧，投资机遇和风险都会增加，不同商品也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触底回升。但总体而言，未来国际大宗商品将步入中长期低迷的“冰河时代”。

（一）多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 3~5 年内将维持低位震荡

从供需形势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与全球需求疲软息息相关，但也与供给出现大量过剩密切关联。美国经济复苏还远不足以弥补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集体疲软带来的需求走软，而为确保市场份额，主要商品输出国尚未做出产能调整。原油、天然气、煤炭、铜、铁矿石、农产品等供需形势皆不相同，有的品种受供应大幅增加程度影响较大，如原油、天然气、铜和农产品，而有的品种则因需求放缓而导致价格暴跌，如煤炭、铁矿石等。除了供求变化的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普遍下跌还有其他影响因素，且不同品种价格下跌主导因素也有差异。其中，影响大宗商品价格集体走低的一个共同因素是美元走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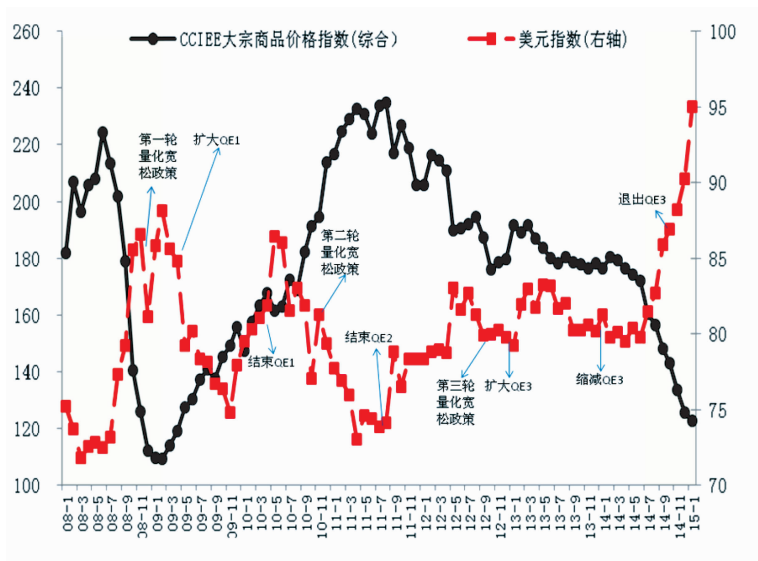


图 1 CCIEE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①与美元指数走势

^①CCIEE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是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开发编制的侧重于反映中国需求和中国因素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情况指数。

随着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美元进入了加速升值通道。美元升值的背后是美联储的加息预期，而美国真实利率（经通胀调整后的）的上升通常会伴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反之亦然。因为美联储加息预期将对商品投资收益产生冲击，促使投资者加速增产和去库存，即将商品存货及时变现，引发机构投资者纷纷退出大宗商品资产配置。短期内，美国经济好转不可能促使美元出现大幅贬值，至少奥巴马任期内再次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性不大，而且美国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和欧日及新兴经济体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会进一步夯实强势美元的地位，这意味着未来 3~5 年内将使多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承压，预计会长期维持在低位震荡。

（二）廉价石油将使化石能源重获低成本优势

受全球需求放缓影响，全球原油供给大幅过剩，再加上美元走强、地缘政治等因素，导致以美元计价的油价从每桶 100 美元以上跌至每桶 50 美元附近，预计未来 2~3 年世界石油市场供需宽松态势难以根本改变，以美元计价的油价会在低位回稳，大致维持在每桶 50~70 美元区间进行震荡波动。究其原因，2015 年以前，需求不足为油价下跌的主导因素，之后供给因素影响可能更大。供给端的变化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美国页岩气的供应，二是欧佩克维持计划产量不变。

受需求增长放缓、供应大量增加和国际油价下跌等因素影响，国际天然气市场供过于求局面趋于长期化，导致气价大幅走跌，其中，亚洲液化天然气（LNG）现货价格从每百万英热单位（mmbtu）17.25 美元跌破每百万英热单位 7 美元。随着气价随之走低，很多国家计划用较清洁的天然气取代煤炭。中国、印度等国家正寻求将更多天然气用于发电，以代替对环境不利的煤炭发电，同时也希望在交通运输中用天然气代替柴油。

受天然气价格持续低迷和二氧化碳减排的全球强约束影响，国际煤炭价格继续寻底过程。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即便全球能源需求转好，煤炭仍可能是唯一表现疲软的大宗商品。2015 年，预计澳大利亚煤炭价格可能将再跌近 9%，欧洲煤炭价格跌幅可能将达 25%。导致煤炭行业深陷困境主要有两个原因：中国需求下降和美元走强。在多重抑制政策的作用下，预计未来 2~3 年内，国际煤炭市场供大于求的态势还难以根本性改变，在能效改善和环境政策日趋严格的支持下，中国的煤炭需求增长会显著放缓，煤炭价格将稳定在较低位运行，长期出现报复性反弹的可能性不大。

（三）基本金属价格中长期呈现分化震荡走势

2014 年以来，基本金属价格呈现不同程度的下跌，而且品种出现分化情形。尤其是铜、铝价格长期下跌态势较为明显，铅、锡、镍价长期下行中略有反弹，而锌价在下跌

后出现较大幅度的回升。考虑到未来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并不乐观，尤其是中国和欧洲需求难转旺盛，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将全球基本金属行业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

具体来看，全球经济增长前景黯淡和市场供需失衡是近期铜价重挫的重要原因。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需求疲软，而精炼铜供应增速快于趋势水平，致使铜市场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在全球需求存在不确定性和输入成本下降的情况下，铜价将需要寻找一个新的供需均衡点。作为全球最大的铜消费国，中国需求将成为影响铜价的重要变量。本轮铜价出现回落主要是因为中国楼市需求减弱所致。进入 2015 年以来，中国正在启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但不会改变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这意味着铜价的快速反弹缺少坚实的支撑。尽管不少经营铜材的企业正在有步骤地削减铜产能，但受制于需求疲软、美元走强等多重因素压制，铜价大幅反弹的可能性不大。我们预计，未来铜市场的需求乏力情况将更为严重，铜价走低趋势将延续。

2014 年以来，国际国内铝价反弹主要是因为供应缺口的扩大。据世界金属统计局 (WBMS) 数据显示，2014 年全球铝市供应短缺 84.9 万吨，而在 2013 年则为供应过剩 56.9 万吨。然而随着 2015 年供应增加和需求放缓，铝市场供需将渐趋平衡。今后铝价反弹的空间也不大，预计仍会维持震荡调整态势。

由于全球电池制造业需求萎靡不振，尤其是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铅消费国，其中电动自行车行业的铅需求占中国铅需求总量的 36%。短期内，来自中国和欧洲的制造业活动放缓，这使得铅价仍会面临下行压力。

此外，锌成为基本金属领涨的品种，原因在于锌供应出现收缩，短期内供给不足超过预期，海外部分锌精矿因矿山服务年限将近而逐步减产，甚至部分大矿即将关停，同时全球 1/4 的锌矿产能面临产量下滑局面。未来锌的基本面相对较好，因为市场存在海外矿山关停预期带来的产能收缩和来自远离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镀锌板的稳定需求。

（四）中国钢铁过剩产能将长期压制铁矿石价格回升

铁矿石定价权长期被国际矿石厂商垄断，但随着近年来中国需求放缓，再加上市场供应增加，铁矿石将转为买方市场。铁矿石价格不再如以往那么坚挺，而是出现大幅下跌。进入 2015 年，铁矿石价格进一步下滑到近五年半的低位，价格约在 61 美元/吨。这是因为中国粗钢产量占到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2014 年中国铁矿石进口量达到 9.33 亿吨，对外依存度再度升高到 78.5%。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降温抑制了钢铁需求，而且出于调整产业结构、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和消化过剩产能的需要，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压减部分钢铁产能，到 2017 年底全国要压减 8000 万吨钢铁产能，其中，河北省就要压减 6000 万

吨，这使得过去货币宽松时期刺激的铁矿石价格泡沫失去了膨胀下去的推动力，从而出现严重的产出与需求错配，从而使铁矿石价格泡沫走向破裂，将更多地回归到商品属性上来。尽管中国政府将会通过一定规模的基建投资计划来重振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增加，但是中国钢铁消费已经进入平台期，铁矿石价格不会重回以往廉价资本驱动的泡沫化上涨。随着中国废钢量的增加，中国所需铁矿石增长空间非常有限。未来 2~3 年内，国际矿企生产成本较低，有继续扩产积极性。在生产继续扩张的条件下，受钢铁产能过剩、钢材需求增长放缓等因素的影响，铁矿石价格将还有继续下探的可能，预计 3~5 年内不会重返每吨 90 美元以上水平，2015 年的价格将在每吨 50 美元左右波动。

（五）国际农产品价格中长期更多体现其商品属性

与工业品不同，国际农产品供应受地域自然灾害和气候季节性影响较大，因而其低价形势可能不会持续那么久。农产品生产成本还受到种子、化肥和能源价格的影响，而农产品消费通常会表现平稳，只是有时作为加工业原料受到油压榨、饲料加工等活动的调节。从近期走势看，尽管价格涨跌互现，但上涨品种的表现总体难抵价格下跌品种的拖累，食品类大宗商品价格自 2011 年以来下跌 20%。考虑到目前 2014 至 2015 年当季粮食、食油和肉类及饮料（以咖啡为首）作物丰收前景良好，预计 2015 年将进一步下跌 4% 左右，但受供需平稳影响，进一步下跌的幅度不会太大。考虑到未来南美主产区气候良好，2015 年大豆和玉米丰产的可能性较大，将会继续使大豆和玉米价格承压。中长期看，如果未来天气不能够造成南美大豆大幅减产，随着后期南美大豆的丰产上市，全球大豆供需进一步转向宽松，大豆期价也将承受更多的下行压力。

**二、大宗商品价格中长期低迷将对中国乃至
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我们判断，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进入中长期低迷期，这将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至少在未来 3~5 年内，有可能逐步改变商品净进口国和净出口国之间的现有利益格局，还有可能导致世界贸易、投资、金融和货币政策的新变化，引发不可预期的地缘政治冲突和利益纠葛。

（一）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再分配效应

直观来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会给全球带来低成本红利，利好全球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但会在商品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出现重要的分配效应。据野村证券近期研究

报告称，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将通过五种渠道影响新兴市场经济，包括商品贸易、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企业利润率、政府财政状况和经济增长（GDP 增速）。对大宗商品净进口国来说，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可以降低能源及其它商品的生产成本，改善贸易条件，扩大贸易盈余和经常账户顺差，减轻提供食品及燃料价格补贴政府的财政压力，继而降低中间投入成本，增加企业利润率，促进国民收入增长和就业增加。大宗商品净出口国的情况则刚好相反，不仅会减少这些国家的出口收入，使其财政和国际收支平衡面临压力，甚至遭遇债务违约、本币贬值和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

鉴于政治周期、政策反应、汇率变动及经济基础条件的差异，不同国家受到的影响可能不尽相同。不管如何，全球经济体中总会出现明显的赢家，包括印度、菲律宾、泰国及埃及，即它们会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中受益良多；同时也会出现显著的输家，即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将动摇其经济依赖的根基，尤其会对俄罗斯、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大宗商品供应国产生不利的冲击。野村证券认为，中国也出现在输家之列，其原因在于低迷的大宗商品价格和疲弱的经济增长将引发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缩减、通货紧缩风险加剧、人民币贬值、资本外逃及被做空的压力，而因其他新兴经济体及大宗商品出口国疲弱经济表现，中国的服务贸易平衡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即便对部分商品输入国也并非完全利好。商品消费国可能从贸易条件改善中受益，但价格波动极易诱发贸易融资风险和通缩风险。明显的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可能形成物价下行预期，将会对那些致力于反通缩的经济体带来更为复杂的挑战。诸如日本和欧元区正在实施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以实现温和的通胀目标。如果大宗原料价格下跌促使产成品价格下跌幅度更深，那么不仅会影响企业的补库存行为，甚至进一步拖累总需求的复苏。比如，油价下跌会导致物价下行，并可能产生一定的通缩压力，对此影响需客观全面分析。一是油价下跌主要影响供给面，并不意味着最终需求下降。相反的逻辑是，原材料成本下降有助于企业降本增效，进而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二是油价下跌有助于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在此期间中国曾连续提高成品油消费税，同时也为减少财政补贴提供了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油价下跌对物价的直接影响。

（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总体利大于弊

作为全球重要的大宗商品生产国、消费国和贸易国，中国可能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之中受益，也可能会承受输入性通缩风险。逻辑上讲，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中国的影响表现在宏观经济层面有四个影响渠道（见图 2）：一是通过进口成本下降改善初级产

品贸易赤字状况；二是通过价格传导使整体物价水平降低；三是降低原料进口生产厂商采购成本，进而影响厂商利润状况和未来投资行为；四是通过物价水平下降和企业利润增加，提高中国居民的福利水平，从而促进居民提升消费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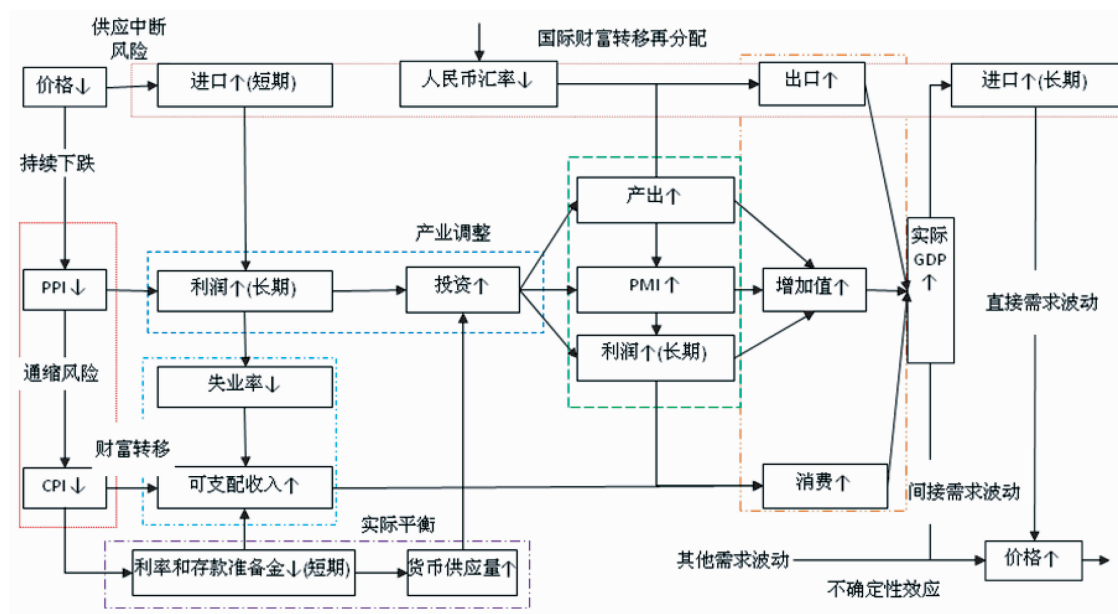


图 2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1. 有利于改善商品贸易条件。如图 2 显示, 国际大宗商品走低有助于降低中国进口成本、改善贸易条件 (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扩大贸易顺差, 能有效减少国家财政赤字, 给财税改革提供更大空间。以原油、铁矿石、大豆和铜材为例, 2014 年中国进口原油超过 3 亿吨, 进口均价较 2013 年下降了 4.92%; 进口铁矿石达到 9.33 亿吨, 进口均价较 2013 年下降了 20.75%; 进口大豆 0.71 亿吨, 进口均价较 2013 年下降了 5.84%; 进口未锻造的铜及铜材、废铜和铜矿砂及精矿分别为 482.54 万吨、387.49 万吨和 1186.18 万吨, 而进口平均价格较 2013 年分别下降了 4.98%、9.34% 和 5.48%, 按照这个数量和 2013 年均价计算, 2014 年四种商品进口金额合计节约 433.88 亿美元。倘若 2015 年全年进口均价参照 2015 年初商品现价 (参见表 1), 那么四种商品进口金额比 2014 年同等数量能少花超过 1568.09 亿美元, 按照 1 美元兑 6.2 元人民币, 节省的开支将高达 9722 亿元, 约占到我国 2014 年进口总额的 8%, 约占到 GDP 总量的 1.5%。这样算来, 贸易条件改善带来的社会福利远远大于 GDP 增长率下降引起的损失, 而且经济增长放缓也有利于改善环境和减少劳累。

表 1 2013 年—2015 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时中国贸易条件改善情况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进口量 (亿吨)	进口额 (亿美元)	平均单价 (美元/吨)	进口量 (亿吨)	进口额 (亿美元)	平均单价 (美元/吨)	节省支出 ^① (亿美元)	预期均价 ^② (美元/吨)	节省支出 ^③ (亿美元)
原油	2. 82	2195. 49	778. 13	3. 08	2281. 29	739. 82	118. 12	366. 5 (50 美元/桶)	1151. 16
铁矿石	8. 20	1048. 90	127. 87	9. 33	945. 51	101. 33	247. 64	70	292. 33
未锻造的铜及铜材	0. 045	354. 89	7812. 09	0. 048	358. 20	7423. 23	18. 76	5800	78. 33
废铜	0. 044	137. 91	3153. 95	0. 039	110. 80	2859. 33	12. 20	2730	4. 33
铜矿砂及精矿	0. 101	195. 09	1937. 34	0. 118	216. 45	1831. 21	12. 16	1720	13. 49
大豆	0. 63	380. 34	599. 86	0. 71	403. 30	564. 85	25. 00	525	28. 45
合计		433. 88		1568. 09					

注：①2014 年节省支出指以 2013 年价格购买同等数量的商品支出额扣减 2014 年实际支出额的净值；

②2015 年的预期均价是以 2015 年 1 月份平均现货价格为基准设定；

③节省支出是以 2014 年实际支出额扣减以预期均价购买同等数量商品的支出额的净值。

2. 有利于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当前，中国经济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资源进口依赖程度较高。原油、铁矿石、铜材、大豆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将带动制成品价格下行，如原油价格下跌直接节约家庭燃料开支，相当于给予消费者直接补贴而增加实际收入，进而扩大终端消费潜力；铁矿石和铜材价格下跌有利于钢铁企业和铜制品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盈利，大豆等都是用于榨油，豆粕大量用于饲料生产，其价格下跌对养殖业降低成本是有利的，这些都会增加经济产出，有助于减缓经济下行压力。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较多的社会福利，足以抵消 GDP 增速放缓引起的损失。据初步估算，因国际商品价格深度下跌带来贸易顺差扩大，进而提高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此获得的经济收益约占到 GDP 的 2~3 个百分点。商品价格下跌还能使普通消费者直接受益，如国际油价持续下跌引发国内成品油价“十三连跌”，汽车消费者加满一箱油将节约支出 100 元人民币左右，这意味着消费者实际收入增加了，可以用于其他消费活动。因而，商品价格下跌将利好中国经济成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模拟分析的结果，因油价下跌将使中国 2015 年 GDP 比基准情形大致增长 0.4%~0.7%，2016 年提升 0.5%~0.9%。另据美国美林银行估计，国际油价每下降 10%，将提升中国 GDP 增长 0.15 个百分点，且经常账户平衡增长 GDP 的 0.2%，将为中国经济的“稳增长”提供有效支撑和缓冲。

3. 有利于“两头在外”相关产业加速转型。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外需求放缓，中国

传统的生产制造业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部分行业同时遭受高成本进口和低价格出口的双向夹击，而上游初级产品价格迅速降低，短期内能提高这些行业的资本回报率，降低相关行业债务负担，缓解制造企业面临的盈利压力。此轮大宗商品下跌还有利于改变预期及投资行为，有利于加速资源品价格改革进程，推进传统制造业转移过剩产能、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因为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给国际上的资源出口商带来业绩压力，从而使从低价中受益中国企业寻找到海外资产重组的机会，使其积累更多资本提前实施国际化战略，加快发展和海外投资，比如以较低的并购成本获得优质的份额资源，保障长期转型发展的核心利益，增强在价格反转过程中的主动性，从而加快消化过剩产能和推进结构调整。

4. 对中国不同行业减税效应存在差异。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的减税效应显然不能惠及所有行业，原料开采或转化业可能从中受损，比如石油采掘业和煤化工产业受负面影响较大。在煤炭、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原材料持续下跌中，整体受益的行业仅集中在电力、化纤、黑色金属冶炼（特种钢材）等。行业受益的前提条件是，原料成本下跌的幅度超过产成品价格的跌幅。从行业表现看，那些行业集中度越高、具有刚性需求、在产业链下游的行业受益更为确定。比如，油价下跌首先导致油气勘探开采业盈利下降，也会导致以天然气、煤炭、生物质等为原料生产同质化产品，而产品价格由石油路线确定的子行业，如煤制油、煤制气、煤制甲醇、煤制乙二醇、煤制烯烃、燃料酒精、生物柴油等化工产品经济性受到严重挑战。油价下跌对化工领域各子行业的影响方向和强度表现不均，因为油价暴跌会直接拉低汽油、柴油、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等产品价格，但石油化工产业链上价格传导变化会有所差异，如对无机化学品、橡胶等造成下行压力，而对纺织化学品、精细化工品等市场形成利好。因为处于产业链上游的乙烯、丙烯、甲苯、苯乙烯、纯苯、二甲苯、苯酚、丙酮、苯胺、丁二烯等制成品价格通常会同步下跌，从而使该环节产业利润受损，而处于产业链下游的精细化工原料、日化品、涂料、油墨、改性塑料等终端化工产品价格下降幅度较小，这些行业可能会从中有所受益；由于成品油价格的同步下跌，而以成品油为原料的航空运输、干散货集运、公路交通等行业的盈利会得到显著改善。煤炭价格持续下滑，对煤炭勘探开采造成较大负面冲击，但有利于电力、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同时以煤炭为燃料的非金属矿物制造、金属冶炼加工等行业利润率与煤炭价格将呈同向变化。铁矿石价格下降短期可以使钢铁行业被动获益，但受钢铁市场需求不振和产能持续扩张影响，原料成本下行能够有效传递到下游价格，低成本竞争加剧会导致钢材价格出现大幅下降态势，长期反而会使钢铁企业重新陷入困境，而只有附加值较高的板材、特种钢企业才会依靠产品品质和高价从原料成本长期下降中显著受益。

5. 容易引发国内物价下行风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引发了国内外对全球通缩风险的担忧。据统计，原油、煤炭、钢材和铜材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通常会在 3~6 个月后传导到生产者物价上来。受此影响，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现已连续 37 个月呈现负增长，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历次下跌周期中最长的一次，且降幅有持续扩大迹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使中国 PPI 下行压力增加。与此同时，更直接反映上游初级产品价格变化的工业品购进价格指数（PPIRM）也呈现同样的连续下降，2012 年 4 月—2015 年 3 月连续 36 个月同比下降，也未显示出止跌回升迹象。可以说，生产资料价格下跌是 PPI 持续下跌的主导因素。在中国，PPI 对 CPI 的传导机制尽管并不顺畅，但上游初级产品价格下跌正传递到交通类的燃料价格、居住类的水电燃气价格的下行调整，从而拖累 CPI 逐步走低，表现在中国 CPI 同比已经连续八个月维持在 2% 以下，而达到 2% 的通胀目标恰恰却是日本和欧元区实施货币刺激的初衷。据测算，国际油价下跌 10% 将可能分别拉低 CPI 和 PPI 约 0.1 和 0.5 个百分点，并进一步导致两者分化。

6. 延阻资源节约和可再生能源战略实施。大宗商品价格回落虽然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但由于能源资源比价关系发生改变，无论是消费者还是投资者，人们对可再生资源开发利用、新能源汽车激励、燃油经济性标准等各种措施的兴趣可能会大幅减弱。比如，倘若国际油价长期处于低位，反而会提高化石能源的经济性和竞争力，这将会给页岩油气和新能源汽车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性，至少当前页岩气和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开发成本尚不足与低廉的原油开采成本相竞争。例如，发展生物能源需要国家油价维持在每桶 80 美元以上。较低的能源价格将会延阻清洁能源取代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进程。例如，液化石油气可能挤占天然气的市场空间，还会降低对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投资吸引力，可能使“弃风”“弃光”等问题更加突出，并给政府对鼓励资源节约和可再生能源开发的补贴政策带来更大的挑战。

三、抓住大宗商品价格中长期低迷期有利时机， 对我全球能源资源战略进行战略性调整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逐步进入“新常态”，同时国际商品市场进入中长期低迷期。中国应积极抓住此次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调整的机遇，主动改变决策方式，对中国全球能源资源战略进行整体设计，推进战略性调整，为中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争取新的重大优势。

（一）扩大海外资源储备能力，加快矿山并购与投资

抓住油价处于低位的机遇，全面实施低价原油战略储备计划，新建或扩建原油储备

库，争取尽早使中国原油储备由 15 天提升至 90 天的水平；进一步完善原油的商业储备制度，鼓励更多企业进入原油储备领域开展原油储运。利用天然气价格较低的时机，加快天然气储备库建设，推进 LNG 接受码头建设，完善天然气输运管网设施，使储气库兼具调峰功能。加快筹建或扩建稀有金属战略储备库，调整修订国内建筑和管道用钢标准，使之尽快与国际标准接轨，鼓励城镇更多地建设钢架结构建筑，提高中国各类建筑设施中的钢材含量，把钢材储备转化为有形建筑物储备，全面整顿国内矿山开采秩序，健全铜、铝、铁矿石等金属矿山的商业储备制度，鼓励企业“走出去”获取权益矿山，建立“虚拟矿山”“虚拟油田”等海外能源资源储备体系，鼓励企业积极在期货市场订立远期合约，提前锁定矿产资源涨价风险。对国内丰富的稀土资源，全面整顿矿山开采秩序，实施矿山开采许可证制度，推进稀土矿产有序开采，同时建立健全稀土资源的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制度，鼓励更多企业参与稀土资源储备库建设。

（二）努力形成体现中国利益、以需求为导向的大宗商品定价中心

作为稳定商品价格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应依靠需求端的影响力，与同处亚洲的日本、韩国、印度等紧密合作，让国际大宗商品的需求中心发挥稳定预期和价格发现的积极作用，有效缓解长期困扰亚洲进口国家或地区的商品溢价问题。建议在中国现有的三大期货交易所发展的基础上，加快构建以大数据分析系统为基础的现代化交易平台，形成全球性的交易产品和交易市场以及必要的交割库，积极构建现代化的商品储备体系和连续发布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发挥库存调节与指数引领对交易价格的影响力。积极推进中国大宗商品的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通过现货交易平台增加贸易量，把现货、期货品种上市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让大宗商品价格由商品现货、期货市场来形成，并加快丰富期货交易市场的大宗商品品种，建立与国际期货市场完全对应的期货品种，适时推出国债等利率期货和离岸外汇衍生品交易等品种，完善区域内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品市场功能，使其提供大宗商品风险管理平台和服务，满足亚太地区客户对冲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风险的需求。鼓励国内银行和券商等金融机构大胆向海外扩张，加大对大宗商品业务的投入，重点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投资银行，对国际大宗商品交易所实施并购重组，鼓励与产业资本结合灵活运用“需求”因素，开展各种大宗商品金融创新。抓住大宗商品供过于求有利时机，引导国际资源市场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加强人民币在部分双边贸易中作为计价结算货币的努力，增强人民币在大宗商品定价中发挥的作用，重塑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基准价格体系，在二十国集团（G20）框架下构建公平透明的大宗商品价格全球治理机制。

（三）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压缩新能源外的各种能源补贴

深入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完善石油、天然气、电力等领域由市场决定的价格机制，采取一揽子价税调整机制，使上中下游价格顺畅联动，重点推动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和理顺电价形成机制，加快放开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推动输配电价和发售电价分开，进一步降低电力成本，提高制成品的市场竞争力。在清费减税的基础上，逐步理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财税优惠政策，各级政府逐步压缩除新能源外的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加快取消财政对能源公司和中低收入消费者的燃料补贴，以减轻政府日益紧缩的财政收支压力。深化成品油价格与消费税改革，在强化论证的基础上，争取一步到位上调燃油税；加快深化天然气价格与资源税改革，如推动天然气价格按热值计量定价，分类分期提高煤炭、原油、天然气、铜、铝等各类矿产资源开采利用的资源税税率，加快取消稀有金属指令性生产计划，率先推进钨、钼等稀有金属矿产资源税改革，加快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进度，把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合并，并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最大程度上使资源价格切实反映资源使用的全社会成本。

（四）深化油气等资源领域体制改革，构建多元化供应渠道

抓住油价处于低位的有利时机，尽快放开油气等资源进口、管输、储备、配送等流通环节，废除那些维护行业垄断所设置的门槛和进入管制，尤其是推进原油、稀土等资源进出口许可证制度，鼓励更多民营企业进口国外油气等矿产等资源，加大油气矿产等资源的商业储备和国外份额矿产；同时放开国内油气矿产等资源市场准入，通过招标等市场化手段，鼓励民企、外企等参与油气等矿产矿业权出让转让，拓展与俄罗斯、中亚与东南亚国家及加拿大等石油出口国的谈判与合作，逐步降低对中东国家油源过度依赖，加快启动扩建中哈管道二线，抓紧建设中俄管道东线并力争谈成西线，加快推进中土天然气 D 线建设，保障中缅油气管线安全正常运行，构建国际国内相互融通的多元化油气资源供应渠道，保持经济发展所需廉价能源资源供给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五）鼓励跨国收购页岩油气、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先进技术

当国际油价跌破每桶 50~60 美元时，美欧日等国页岩油气技术、太阳能技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可能遭遇发展困境，中国企业可利用购买廉价原油节省的资金，适时逢低兼并收购掌握这些技术的企业，或者通过参股、合资等方式开展国际技术合作，加快培育具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煤炭清洁高效技术，以推进在页岩油气以及煤层气等领域的勘探开采，探索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开发利用，并积极在新能源汽车研发领域掌握技术制高点；通过技术引进、联合攻关和并购学习等多种手段，尽快摆脱对外

国技术和工业产品的依赖，在石油勘探和开采设备制造等领域，加快发展新技术，生产有竞争力的产品，尤其是加快培育具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煤炭清洁高效技术和新兴产业，在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同时，依靠技术进步实现能源行业转型。

（六）推进国内重资产行业转型重组、去产能化、去杠杆化

受制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迅速下降，国内能源资源类企业面临较大经营压力。对这类企业，可通过压力倒逼机制推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重点吸引民营资本进入或与国际资本联手，完善在商品现货市场上的价格对冲机制。与之相反，如钢铁、机械、化工等重资产类企业则从原材料价格下跌受益。对这类企业，既要利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以及“一带一路”三大战略布局，激活有效需求，如开工建设一批重大基础设施消化部分过剩产能，并积极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基金等各种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把国内消化不完的产能释放到国外市场上，使其转化为对外的竞争力。与此同时，加快推进国内行业资产去产能化和债务去杠杆化，实施全产业链互联网改造和智能化升级，重点培育发展如集成电路、新型平板显示器等高新技术产业，支持发展如研发设计、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鼓励企业整合行业优质资产并进行必要的技术储备和新产能投资，使其逐步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布局，有效提升其市场灵活性和国际竞争力。

（七）适时调整煤化工项目，转向开发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

当前油价处于低位，国内一些煤制油、煤制气等煤化工项目将可能面临不具备经济性的尴尬，为此，应适时调整煤化工项目，加快调整优化煤炭使用的方向和结构，重点转向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技术研发和分级分质利用，充分利用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技术，如煤分级热转化和定向热转化技术、煤热解燃烧分级转化和能量梯级利用、煤热解过程提高焦油产率的技术、热解煤半焦水蒸气/氧气条件下的气化技术等，重点促进低阶煤提质增效，促进发展伴生气发电、煤矸石综合利用项目，提高煤炭资源利用率；同时适度控制煤炭产能扩张，加快淘汰分散燃煤小锅炉；采用安全高效的开采利用方法，推动煤炭洗选配洁净化、规模化生产和清洁化利用；因地制宜稳步推进“煤改电”和“煤改气”替代改造；实施煤电节能减排升级改造行动计划，强制推广新型燃煤技术和脱硫脱硝除尘技术，加快推动燃煤电厂烟气污染物协同脱除及资源化利用，尽可能减少煤炭转化过程中资源再消耗和次生污染。

责任编辑：刘英奎

• 世界 经济 •

“一带一路”的动因与挑战

田惠敏 曹红辉

摘要：“一带一路”是我国新时期统筹国内外大局的新倡议、新战略，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彼此之间的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区域合作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本文分析了“一带一路”的动因与挑战，并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 动因 问题与挑战 实施建议

作者简介：田惠敏，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应用经济学博士；

曹红辉，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即“一带一路”战略，反映了我国新时期积极作为的国际战略思想，已获得近六十多个国家的支持与认同，是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该构想的提出，契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共同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

的积极探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我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我国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经过了2014年的酝酿与谋划，2015年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实质启动的关键一年。认清“一带一路”的动因与挑战，实施有效的应对措施，是我国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

一、我国建设“一带一路”的动因分析

建设“一带一路”是党中央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以全新理念推动的新一轮开放。它有利于我国实现国内与国际的互动合作、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的相互促进，从而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展发展空间，释放发展潜力。我国的发展离不开和平稳定合作的周边环境，我国的发展也为周边国家带来重要的发展机遇。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华文明回归世界文明主流和体现周边国家事务为我国首要外交事务的国际战略，是我国第一次提出参与世界治理的新模式。建设“一带一路”，能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合作发展，有效输出我国国内优势产能，助推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一）加强“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沿线区域的合作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承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我国建设“一带一路”，对内能够形成区域合作的新格局，对外则能够构建区域合作的新模式，能够增强沿线国家对区域合作的信心。

1. 对内形成区域合作的新格局。“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我国在区域合作新格局中寻找未来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首先，我国能够在当前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的格局。其次，该战略能够促进我国的全方位开放，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改善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促进我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最后，该战略能够引领国内不同区域逐步走向均衡发展的道路，并通过陆上及海上互联互通，促进中国西部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更好地优化东部地区的资源配置。

2. 对外构建区域合作的新模式。“一带一路”沿线的六十多个国家，多数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44亿人，经济总量为21万亿美元，分别占到全球的63%和29%。2014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4，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超过一万亿美元。目前中国与周边21个邻国中的绝大部分

国家签订了双边或多边的协议。“一带一路”建设能解决自由贸易区（FTA）碎片化问题，并将其转化为 FTA 整合的推动力。整合“一带一路”沿路沿线现存的各种 FTA，要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已有的双边与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与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等既有的合作机制产生重叠或竞争，还会为这些机制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有助于我国打造新型的国际贸易投资合作规则和体制，构建区域合作的新模式。

3. 增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区域合作的信心。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有很好的政治地缘优势、比邻的地理位置优势，以及经济互补的优势。建设“一带一路”可以为沿线区域合作发展创造良好的合作条件，有利于促进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区域贸易合作水平；拓宽区域产业投资合作，深化区域能源资源合作；拓展区域金融合作领域，密切区域人文交流合作，加强区域生态环境合作，推进区域海上合作；能在政治上促进彼此包容，经济上促进彼此互补，文明上促进彼此互鉴，增强沿线各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合作信心。

（二）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有效输出国内优势产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与我国在产业结构上有非常强的互补性。根据有关统计，我国各地有关“一带一路”战略的拟建、在建基础设施规模已达 1.04 万亿元，跨国投资规模约 524 亿美元；2015 年由“一带一路”拉动的投资规模或在 4000 亿元左右。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2010 年至 2020 年亚洲各国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合计约需 8 万亿美元，另需 3000 亿美元用于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考虑到基建乘数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减指数的影响，预计将拉动 GDP 增速 0.2~0.3 个百分点。

作为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和制造业大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我国具有资本优势和产业比较优势。“一带一路”建设主要是与基础设施投资紧密相关的产业，这些产业有的在我国国内相对于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优势产能，有些正好契合了这些国家现代化、工业化过程中的实际需要。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尚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不少国家的经济高度依赖能源、矿产等资源型行业，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而我国长于基础设施建设，有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和能力，特别是在工程承包方面，在全球具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我国有能力向这些国家提供各种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等，处于产业链的相对高点，比如，我国与哈萨克斯坦签订的 236 亿美元产能合作项目。现在我国国内优势产能通过“一带一路”合作框架，到国外投资设厂，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快速增长。我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还可以有效输出国内优势产能。

从我国国内产业发展来看，以高铁、核电为主的重大装备都在国际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一带一路”建设将为高铁、核电等我国装备业“走出去”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据了解，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目前拟建成或在建的高铁项目达九个，拟建或在建跨境铁路、普通铁路和地铁项目 22 个。因此，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能促进我国向沿线国家输出重大装备和优势产能，消化我国优势产能，带动附属产业发展，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推动我国对外资产的多元化，拓展我国的海外存在空间。

（三）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从其他货币国际化进程的经验来看，通过战略和外交政策推动对外投资，对提升本国货币国际化有较大裨益。作为新时期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一带一路”建设将有助于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国际分工环境以及市场条件。

1. 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良好的投融资环境。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多种措施协调推进，不能仅仅依靠跨境结算等方式。相对而言，对外直接投资本身比较稳定，受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小，更容易带动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使用人民币，增加投资目的地对人民币需求的黏性。“一带一路”建设能够通过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推动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和人民币跨境贸易、跨境信贷及投资的支付清算，提高人民币自身的金融服务和国际化经营水平，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当然，人民币国际化还需要其他相应配套改革跟上来，尤其是资本账户开放方面的改革。

2. 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良好的国际分工环境。金融危机打破了“西方消费、东方制造”的模式。国际经济结构性的变化对“东方制造”产生了很大的挑战。“一带一路”建设能促进全球范围内国际分工重组和新增长动力的形成，促进中国部分优势产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和新的发展模式，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良好的国际分工环境。

3. 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比如，近期中国发起、组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是专为亚洲量身打造的基础设施开发性机构，它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融资支持。我国作为亚投行的主要出资国和最大股东，可利用其影响力推动亚投行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载体，优先鼓励使用人民币，推广人民币的国际化运用，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逐步提升人民币在国际化道路上的使用规模和话语

权，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

二、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问题与挑战

“一带一路”建设契合了我国经济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的需要，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大国地位和社会开放程度，巩固社会改革成果。然而，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我国仍将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与挑战。

（一）面临“不联不通”、“联而不通”和“通而不畅”的现状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社会制度和经济模式各异，国家间的合作不同程度地存在“不联不通，联而不通，通而不畅”的问题。

在硬件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存在交通、通信、电网、油气管线等基础设施“不联不通”。基础设施缺乏与老化是制约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化合作的薄弱环节。“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亚、东南亚地区的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薄弱，这已成为这些国家后续经济发展的短板和资源开发的瓶颈，欧洲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基础设施老化问题，制约着这些国家的发展，亟需“升级换代”。如今，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亚欧国家之间的相互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亚欧人民在贸易、旅行、通信等方面享受前所未有的便利，但亚欧国家之间仍存在交通、运输、通信等网络“联而不通、通而不畅”的问题，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遭遇瓶颈。比如，“要想富、先修路”，但修得过早，“大通道”也会变成“大空道”，投资长期难以收回。相反，对方可能更需要建设电站，而且贷款的还款有保证。

在软件方面，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法规、政策不兼容的问题。二是民心不通的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历史上创造了形态不同、风格各异的文明。从历史上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民心不通的问题由来已久。三是缺乏政治互信的问题。“一带一路”沿线的个别国家出于地缘政治原因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存在戒心。在西方媒介的霸权语境下以及部分国家民族主义情结反弹的影响下，有些国家的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和评论出现了个别负面倾向。目前“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问题是沿线国家的民心不通，政治互信不足，彼此差异化大于共同点、差异化大于包容性，彼此矛盾冲突大于合作。如何培育和凝聚这种共识，化解分歧和矛盾，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互联互通”的关键。

（二）面临复杂的地缘环境和互信不足的问题

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复杂敏感，大国利益交汇，各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面临陆

上和海上安全风险、国家猜忌，以及宗教、三股势力等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分布在中亚、东南亚、南亚、中东欧和西亚、北非等地区，这些国家在法律体系、政治体制、民族宗教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地缘环境和社会形势复杂，互信不足。这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巨大挑战。

1. “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对外深陷大国博弈的战场。“一带一路”涉及全球多个高风险地带，是大国角力的焦点区域。地区局势紧张、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力及跨境犯罪等问题是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较为集中的问题，“一带一路”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价值也成为俄罗斯“欧亚联盟”、欧盟“东部伙伴计划”、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大国国家战略的重点。以“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例，其沿线所涉及的国家，既有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等战乱频仍的国家，也有伊朗、巴基斯坦这样次高风险的国家，该区域内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盛行。

2. 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内面临领导人交接、民主政治转型、民族冲突等多重矛盾。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仍处于政治、经济转轨阶段，各种社会矛盾突出。这些国家的内部政局不稳，容易出现政策变化的政治违约风险、宗教与民族问题导致的战争和内乱风险、国有化征收风险、第三国干预风险、政府违约风险、歧视性的市场准入限制与隐性投资贸易壁垒风险、企业合同违约与延迟支付风险、贸易往来中的商业欺诈风险、恐怖主义与有组织犯罪所导致的中国企业雇员与设施的安全风险。这些风险将直接影响到“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

（三）我国管理体制和思想观念难以适应形势变化和国际竞争的需要

虽然我国对外投资已遍布世界各地，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但仍存在对外投资配套环节不健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法律法规、管理服务、信用评价、风险管理等支撑体系缺失，对海外投资和海外资本的保护体系不完善，特别是管理体制、思想观念难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和国际竞争的需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行政审批体制过于复杂，缺乏效率和透明度，在投资审批、外汇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制约；融资体系不发达，市场化程度低，对外服务功能不完善，国际协调不畅通，企业在外受到的阻力大。此外，目前我国对外投资企业中，国有企业占较高比重，当前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包括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不适应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要求，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企业内部管理效率低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对“一带一路”建设造成不利影响。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管理体制、思想观念难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和国际竞争的需要，这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重大战略项目无人承担责任，无人拍板决策；各部门

难以协调，各机构竞争大于合作，内部没有形成“互联互通”；缺乏实力雄厚、决策科学、管理规范、熟悉国际竞争的投资主体；银行监管政策缺乏针对性、境外资产难以抵押、境外分支机构网点数量不足等问题造成融资困难；缺乏在境外投资、经营基础设施的思想观念，管理能力薄弱；应对环保、劳工政策风险的能力薄弱；国内审批境外投资的程序冗长，不利于投标、收购兼并等活动；政策支持力度严重不足，对外援助手段单一；缺乏对当地情况的深入了解和分析，与当地民众沟通不足，情感疏远；援建的医院设施齐全，却无医生、护士；公共外交机构及其所需人才严重不足，语言、法律、宗教等方面的交流活动能力太弱；与当地民众直接沟通不够，对当地语言、宗教、民族习俗等不熟；外事管理僵化，脱离实际，严重制约各类涉外交往。以上这些情况，都会影响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步伐。

（四）面临外方对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困惑

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会让一些国家感到困惑，甚至误解，主要表现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一些国家对我国存在不信任感，认为我国的战略意图很强，企图变革欧亚大陆。比如美国认为，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将可能削弱美国及其他地区大国在相应地区的影响力；我国追求陆权和海权的齐头并进及再平衡，是在美国主导力缺乏、区域合作机制化程度较低的中亚、南亚、中东及相关地区推行一体化战略，以经济合作为先来扩大自身影响力，逐步带动和整合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协作。此外，俄罗斯构建“欧亚联盟”，不希望中国扩大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俄罗斯认为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及亚投行的成立是我国强大的标志。俄罗斯不想看到我国成为世界性的领导大国，不愿接受俄罗斯被领导的地位。

第二，一些国家认为，我国将与美国“迎头相撞”，担心自身必须在中美之间取舍，处于两难境地。俄罗斯也质疑我国的深层次战略意图，认为我国影响力的提升将削弱俄在中亚的影响力，挑战俄主导的“欧亚联盟”倡议；中俄在中亚的利益可能发生碰撞和猜忌，中亚国家不得不面临在合作领域、地缘影响力方面在中俄双方间选边站队。我国“一带一路”还面临众多阻碍，其挑战主要包括新疆问题、南海领土争端、阿富汗问题、中亚国家内部政治动荡等。

第三，一些国家认为，我国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这会引发“新冷战”的错误联想，给我国“一带一路”建设招来不必要的阻力与敌意。以菲律宾为代表的东盟国家心存疑虑，认为南海争端加剧相关国家对我国的不信任。一些国家认为我国建设“一带一路”旨在平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我国提出的“南海海上

合作和共同开发”的实质性进展不大，担心我国力量进入印度洋会对印度洋海上事务产生影响。

三、我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建议

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近期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为下一步具体实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指明了方向。针对本文所述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建议如下：

（一）增信释疑，积极开展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公共外交

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必须实现“五通”，其中“人心相通”正是我国“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主要使命。通过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增信释疑，实现沿线各国的民心沟通。

1. 做好三大方面的公共外交工作。其一，针对丝绸之路本身的公共外交，对“一带一路”本身要多谈建设，要多讲文明及包容性发展，“一带一路”旨在开创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共同体。其二，针对域内国家的公共外交，要多谈“一带一路”建设是和平、贸易、文化交流之“路”，要将我国的和平发展理念向外界传播。“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包括沿线国家及利益攸关方，必须以同甘共苦的精神，具有塑造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在实现各自国内良治、善治的基础上，共同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确保“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和平稳定。其三，针对域外国家的公共外交，要回答我国“一带一路”建设是在已有合作架构及国际体系下实现共融、共通，实现域外国家与域内国家的共享、共赢，是在开放、包容的原则下，打造域内、域外利益共同体，化解域外国家的猜忌和疑惑。

2. 围绕党和政府的重大会议，以及国家领导人出访和出席重要国际会议等重大活动开展公共外交。深入阐释我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等政策主张，精心策划“一带一路”建设有关的公共外交活动，深化友好，增信释疑，展现国家良好形象。通过国家领导人、外交官以及驻外新闻人士在外交对象国的主流媒体上撰文或接受采访，积极为我国“发声”、“正名”，并通过设立新闻中心向外国媒体宣介。

3. 加强国内智库、高校和媒体的公共外交工作。一是加强我国国内主流智库的公共外交，通过与国外智库的交流互动，阐明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立场，即构建“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加强我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联合研究、交流与研讨。二是通过国内各大高校，尤其是涉外高校，利用自身学术资源优势和多语种优势开展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公共外交活动。三是加强媒体公共外交，媒体要做好我国“一带

一路”建设的传播工作，要积极争取国际话语权，扩大我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这就需要我国权威部门或者权威人士能及时或者客观地发出信息，媒体根据基本事实去描述新闻事件，对所报道的内容进行通俗化处理，用平实、简洁的语言去表述，让受众看得懂、愿意看。

（二）深化机制建设，推动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

推动我国“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深化我国各种机制建设。通过建立有效的协调合作机制，树立优先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机制，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通关体制，健全区域合作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机制，共同推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1. 建立有效的协调合作机制。当前国际性的区域合作组织普遍具有排他性，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则对各类国家开放，不设置准入门槛，凡有意愿合作的国家和地区都可以成为“一带一路”的成员，这种区域性合作机制与现有的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上海合作组织、孟中印缅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等区域性合作组织相衔接，并与成员国本国战略对接。因此，应深化双边、多边与区域的合作平台机制。发挥现有联委会、混委会、协委会、指导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等双边机制的作用，协调推动合作项目的实施。

2. 树立优先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机制。依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对沿线贸易和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促进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优先建立铁路、公路、航空、油气管道、光纤、通信等综合在一起的立体、多维的通道，构建沿线的海运与水运网、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航空网、通信光缆网，以及边境口岸设施和中心城市市政基础建设、跨境铁路扩能改造、口岸高速公路等互联互通项目的建设。

3. 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通关体制。与沿线国家共同推进双边或多边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推动口岸操作、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的有机衔接，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通关机制。为此，需要简化通关、检验检疫等方面的手续，降低关税，消除贸易壁垒，推进资金流、物流、人员流动的便利化，逐步消除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障碍。

4. 健全区域合作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机制。建设经济贸易合作园区，吸引各国企业入园投资，形成产业示范区和特色产业园，促进现代制造业、服务业、现代农业等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把建设境外经济合作区和边境合作区结合起来，建设跨国产业链，形成沿边境线的跨国产业带，进一步建立健全区域合作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

（三）务实合作，形成“一带一路”建设的早期收获

积极推动我国“一带一路”建设，需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沟通磋商，推

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务实合作，加快实施一系列措施，形成早期收获，争取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解和支持。

1.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循序渐进、由易到难、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的大合作。优先领域和早期收获项目可以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可以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和产业合作，也少不了人文和人员交流。产业合作既可以有农渔业、科技、制造业和服务业，也包括传统和高端制造业合作。对于那些各方有共识、有共同利益需求的公路、铁路、航空和海运项目、能源资源开发、管道、电力、电信项目，以及自由贸易谈判、方便人员往来的政策措施，都应该加快协商和推进，争取成熟一项实现一项，形成重点项目的早突破和早收获。

2. 中国要找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契合点，加快彼此之间发展规划的对接。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上，深化产业、旅游、资源能源和金融合作，加强海洋与生态等领域合作以取得早期收获；积极推进我国与东盟、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欧盟、欧亚经济联盟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和升级，尽早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提高贸易、投资、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通过实施一批带动性强并具有示范效应的重大合作项目，以点带面，从线到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打造新丝绸之路上的联通网络，形成畅通无阻的贸易流、欣欣向荣的产业带、人文荟萃的新景观。要建立多边金融合作机制，我国金融机构要加强与周边多个区域、次区域金融机构以及合作国中央银行、开发性金融机构、主要商业银行等开展密切合作，为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筑牢金融基础。

3. 应加强战略统筹，分布实施，动态调整。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应分阶段实施。近期目标的重点是道路、能源管线、电信、港口等基础设施“共建”和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程度。中期目标可在条件成熟国家和地区朝自由贸易区迈进，打造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与中亚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将非洲东海岸和拉美地区环太平洋国家纳入合作机制。远期目标是建成覆盖中亚、南亚、西亚、欧洲、非洲、拉美国家的自由贸易区群，覆盖全球 100 多个国家。

（四）加强研究，构建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风险评估体系

为保证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不断加强研究，建立有效的风险评估体系。

1. 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环境风险评估研究。有效进行国别风险识别、评估与判断。加强国别政策、投资与宗教风险研究，降低人身风险，控制

经营风险, 预判政治风险等, 充分发挥各方风险防范的主动性, 统筹规划, 形成“一国一策”、“一个项目, 一个模式”的合作模式。国内有关部门应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投资风险、经济贸易风险和总体风险五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和评估, 并定期发布信息, 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提供决策依据。

2. 了解投资国的相关产业指导政策, 以及相关法律中引导性和禁止性的规定。要尊重知识产权, 并注意研究投资国对环境保护及劳工问题的相关规定。相对于产业政策而言, 各国金融秩序的全球化关联度要高一些, 所以我国企业要合理使用资本超越国界的特性, 对冲政治环境风险。

3. 建立有效的“一带一路”建设的风险监控和预警机制。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要提高风险意识, 加强对外风险投资的风险监控和风险预警机制。管理机构应设立相应的产品, 以协助企业规避投资风险。我国金融机构应早期介入, 主导风险分担的结构设计。我国跨国企业需要在内部设立专业的风险控制、安全调查部门, 建立企业级别的风险监测、评估与预警体系。我国要重视利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 对国际投资的风险缓释作用, 分散政治风险, 维护自身海外投资的合法权益。我国要注重利用好多边国际组织的保障作用, 丰富政治风险的管控方式, 通过 MIGA 保险, 使我国企业的“出海”项目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得到有效防范和解决。

(五) 协同推进, 发挥我国国内各方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发挥我国政府、协会与企业三方的作用, 协同推进。

1. 对政府来说, 需要制定系统、完整的“一带一路”建设保障体系。完善国内法律保障体系。进一步推动我国对外投资基本法立法, 建立、健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并简化对外投资审批程序, 完善法律支持与保障体系。推动出台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项目的倾斜政策, 建立政府、企业、金融保险机构横向协调机制; 制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 形成对外投资产业目录, 引导企业对外投资的产业方向和重点区域。加紧制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经济贸易合作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引导企业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 建立一批产业园区。

2. 充分发挥我国国内行业协会、商会等行业组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桥梁”和平台作用。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 统筹促进国内企业间的沟通与合作, 形成“整舰出海”的局面。组织企业到海外发展, 在重大问题上行业协会作为行业内企业联合的代表, 与国外政府、行业组织和企业进行协商谈判。帮助企业解决在海外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为我国企业在海外发展中塑造良好形象出谋划策。

3. 要培育我国企业的国际化视野和全球化战略思维,使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主动参与全球产业的国际分工协作。我国企业要充分了解国际市场规则、跨国语言、文化、法律制度差异的情况,完善自身治理结构,引进国际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商业模式、关键技术和优秀人才,增强对全球贸易规则的适应能力;在履行所在国的社会责任时要重视当地的公共外交活动,减少文化理念上的冲突,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总之,“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战略构想,更是沿途国家共同繁荣之有益路径,是中国梦与世界梦的有机结合。充分认清“一带一路”建设的动因与挑战,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优势互补转化为务实合作,才能真正构建起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参考文献:

1. 吴益生:《挖掘人民币资本输出潜力》,《经济日报》2014年11月25日。
2. 金玲:《“一带一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
3. 保建云:《论“一带一路”建设给人民币国际化创造的投融资机遇、市场条件及风险分布》,《天府新论》2015年第1期。
4. 张茉楠:《四大机制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证券时报》2014年11月6日。
5. 王义桅:《绸缪一带一路风险》,《中国投资》2015年第2期。
6. 陈四清:《开启人民币国际化新格局》,《中国金融》2014年第24期。
7. 鲍志成:《“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的深刻时代背景》,人民论坛网,2015年2月6日。
8. 霍建国:《“一带一路”下的对外贸易》,《中国国情国力》2015年第3期。
9. 高虎城:《“一带一路”对中国对外贸易意义重大》,《人民日报》2014年7月3日。
10. 龚婷:《“一带一路”:国际舆情反应及公共外交重点》,察哈尔学会公共外交年会2014,2014年12月29日。
11. 罗雨泽:《“一带一路”:是区域的,也是全球的》,《中国经济时报》2015年3月23日。
12. 陈杰:《公共外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30日。
13. 郑刚:《一带一路战略下的风险管控应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赢拓咨询,2015年3月30日,<http://www.chinawuliu.com.cn/xsyj/201503/31/299971.shtml>。
14. 何亚非:《中国需在“一带一路”建设上作五方面努力》,中新网海南频道,2015年2月6日。
15. 王义桅:《丝绸之路公共外交的使命》,《公共外交季刊》2014年第7期。

责任编辑:黄启云

· 产业经济 ·

中国制造 2025 实现变道超车

张茉楠

摘要：当前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制造强国战略。没有强大的制造业，中国就难以从大国走向强国。特别是在全球经济结构正经历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从而与中国形成较为激烈的竞争。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前堵后追”的双重挤压。本文在分析全球制造业发展战略新动向与新趋势的基础上，对比“德国工业 4.0”“美国工业互联网”以及“中国制造 2025”战略的异同，提出中国应以“中国制造 2025”为战略重点，全面实施“制造强国”的举国战略。

关键词：工业 4.0 工业互联网 中国制造 2025 全球价值链 强国战略

作者简介：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

在新一轮工业革命的竞技中，已经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必须加快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发展目标。制造业由大到强，不仅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更是现实的迫切需要。加快制造强国建设，不仅是时代赋予中国制造业的历史使命，更是适应中国国情的战略抉择。刚刚颁布的《中国制造 2025》为中国实现“变道超车”、重构竞争优势、加快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和全球价值链升级、迈向“制造强国”指明了新的

方向。

一、“中国制造”仍处于“大而不强”的发展阶段

从产业规模和结构看，制造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贡献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40% 以上。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制造业增长高于国家整体经济增长水平；在规模发展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在快速升级，主要表现在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所占的比例持续下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例不断上升。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5 年—2013 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20% 左右，2012 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为 2.08 万亿美元，在全球制造业占比约 20%，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

如今中国工业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更多地体现在拥有完整的供应链条。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39 个工业大类，191 个中类，525 个小类）的国家，形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样是来自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目前中国工业竞争力指数在 136 个国家中排名第七位，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 22 个大类中，中国在七个大类中名列第一，钢铁、水泥、汽车等 220 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2013 年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产值规模突破 20 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超过 1/3。2013 年中国发电设备产量达 1.2 亿千瓦，约占全球总量的 60%；造船完工量达 4534 万载重吨，占全球比重的 41%；汽车产量达 2211.7 万辆，占全球比重的 25%；机床产量达 95.9 万台，占全球比重的 38%。中国制造业占世界的 1/3 以上。

然而，中国制造业仍处于“大而不强”的阶段，普遍存在自主创新能力差、核心部件对外依存度高、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突出等问题，与美、日、德等发达工业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进入 21 世纪以来，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兴起，在这一关键历史期，中国如何实现“变道超车”成为重要命题。

二、“中国制造”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与全新挑战

中国 30 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令世人瞩目，“中国制造”也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不过，正如其他工业化国家发展历程所经历的一样，“中国制造”目前也面临着比较优势减弱、生产过剩和转型升级乏力等困境，以及全球新工业革命浪潮的全新挑战。

（一）“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逐步衰减

由于中国“人口红利”的高峰期即将成为过去，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将进一步逆转，并带来工资的进一步上涨。尽管劳动力成本在这些行业中占据的比例相对较低，但中美两国之间快速收窄的工资差距使其成为中美成本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我们的测算，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工资预计将每年增长 15%~20%，超过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考虑到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情况，中国沿海地区与美国部分低成本的州之间曾经存在的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差距，预计到 2015 年将缩减至目前水平的 40% 以下。

当然，劳动力成本绝对不是构成制造业成本方程的唯一因素。2010 年以来，中国电力成本已飙升了 15%。进口动力煤的价格上涨和对高耗能企业优惠税率的终止，也推高了这些占中国电力消耗 74% 的行业的发展成本。此外，中国工业用地已不再便宜，事实上，中国工业用地的成本已经大大超过美国。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显示，在沿海城市宁波工业用地的成本为每平方英尺 11.15 美元，在南京为每平方英尺 14.49 美元，在上海为每平方英尺 17.29 美元，在深圳为每平方英尺 21 美元，全国平均为每平方英尺 10.22 美元。相比之下，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成本只有 1.86 美元~7.43 美元；在美国田纳西州和北卡罗莱纳州，价格从每平方英尺 1.30 美元至 4.65 美元不等。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机构的统计，2000 年—2013 年，中国工资平均每年增长 11.4%。本世纪初，中国工人工资只有墨西哥工人的 30.2%，而在 2013 年，中国工人的月工资已经比墨西哥工人高出 50.5%，比越南工人高出 168%。

如果说，成本差距因素还只是中长期影响的话，那么决定中美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则是更直接的因素。本世纪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要素和产业价值链纵向分工模式的形成和高度细分化，使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并存，由此推动了产业在国家间新一轮转移。同时，产业链出现纵向的高度分工化，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占据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等高端环节，而把加工、组装、制造等相对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环节转移到像中国这样的低成本发展中国家。比如，作为“北美后花园”的墨西哥正在通过北美自贸区 and 自身的后发优势成为美国新的产业专业基地。

毋庸置疑，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上升到 19.8%，但制造业研发投入占世界制造业研发投入的比重不到 3%。从整体上看，中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 and 创新能力还较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较弱，工业劳动率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还较大，工业企业的平均规模还较小，可持续发展能力还较差，许多传统产业还存在着“贫困化”增长的现象。2008 年—2010 年，中国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为 9.9%，经济增长总量中 2/3 以上为资本积累的贡献。中国如此大规模的投

资带来的却是资本效率的下降。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资本产出率为 3.79，到了 2000 年—2007 年已增加到 4.25，再到 2008 年—2009 年则上升到 4.89，这表明资本的扩大对生产率增长产生了“挤出”效应。

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差距。据笔者测算，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的增加值率较低，只相当于美国的 4.38%、日本的 4.37%和德国的 5.56%。从中间投入的贡献系数来看，发达国家一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一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只能得到 0.56 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中外价值创造能力相差巨大。反观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企业通过缩短工时压缩用工投入，从而削减劳工成本，劳动生产率得以持续提高。数据显示，2014 年第三季度，美国非农业部门劳动力产出按年率计算环比增加 4.2%，劳动生产率按年率计算环比上升 2.9%，大大超出预期。

（二）“中国制造”面临新一轮全球技术和产业革命冲击

迄今为止，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趋势与典型工业化国家的一般规律基本吻合，同时也表现出追赶国家的一些特点。从已经出现的行业峰值时点来看，中国与国际经验的吻合度较高。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带来的国际贸易利益分配失衡等问题，对中国制造业升级提出了诸多挑战，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既是一场数字化革命，更是价值链革命。互联网、物联网、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3D 打印、新型材料等多点突破和互动融合将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兴起，一个后大规模（post-mass）生产的世界正在来临，这场革命不仅将影响到“如何制造产品”，还将影响到“在哪里制造产品”，将重新塑造全球产业竞争的格局。美欧等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促进制造业回流，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工业 4.0、工业互联网等对中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冲击。中国制造业面临着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和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前堵后追”的双重挤压。

（三）制造业后发优势与创新投入严重不足

笔者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库的数据计算，2014 年，美国研发支出预计将达 460 亿美元，中国在研发领域的支出自 1998 年起增长了三倍，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重从 2006 年的 1.32%，提高至 2012 年的 1.98%，超过欧盟。2013 年中国制造业的研发强度远低于发达国家在 2008 年—2009 年的研发强度。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中国 2013 年的制造业研发强度只有 0.88%，而 2009 年日本已经达到 4%，2008 年美国达到 3.3%，而德国为 2.4%。

不同产业的研发强度在各国也不相同。第一，高技术（high tech）产业。主要发达

国家的高技术制造业研发强度最高，2007 年美国达到 16.9%，2008 年日本为 10.5%，而 2013 年中国为 1.75%。第二，中等技术（medium tech）产业。美国研发强度最高，达到 7.5%，英国为 5.1%，日本为 5.9%。第三，低技术（low tech）产业。这几个国家的中低或低技术制造业的研发强度都很低，基本都是低于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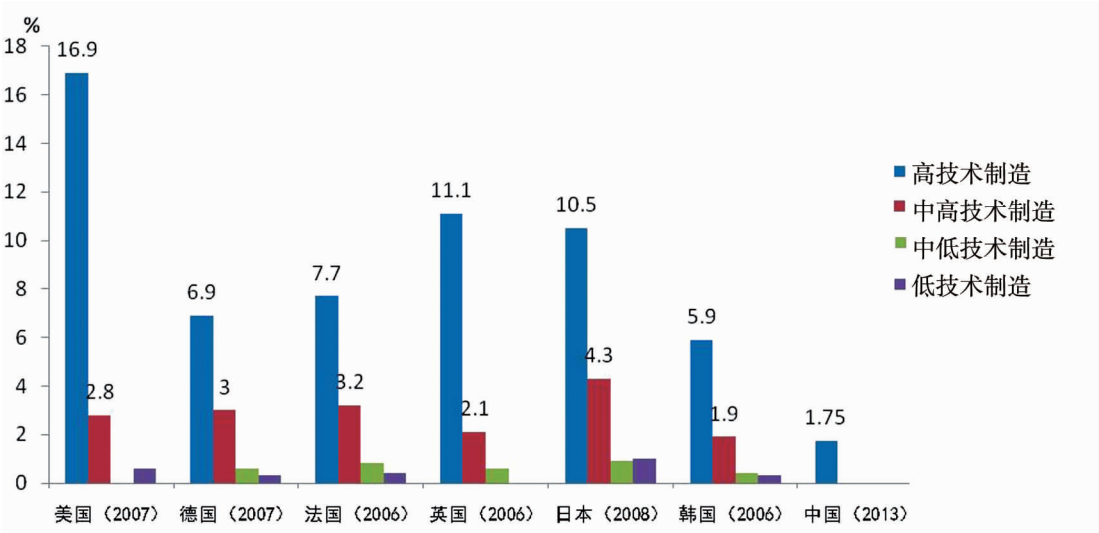


图 1 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研发强度对比

数据来源：OECD 数据库。

相比之下，中国高技术企业的研发强度仍显滞后。《2013 年全国科技经费统计公报》显示，2013 年中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研发（R&D）经费支出 2034.3 亿元，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为 25.6%；R&D 经费投入强度为 1.75%，比规模以上制造业平均水平高 0.87 个百分点。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的研发强度最高为 6.12%。具体到细分行业，研发强度的差距就更为显著。

（1）汽车制造行业。根据 OECD 数据库的数据，法国、日本、德国的汽车制造业研发强度都在 4% 以上，而中国只有 1.12%；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较大，日本和德国的研发强度是中国的 4 倍。（2）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虽然中国交通运输设备的研发强度在全国各行业中是最高的，但是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差距也较大。美国 2007 年为 9.2%，英国 2006 年为 8.9%，大约是中国 4 倍。由于近几年中国政府加大对高铁和航天航空的研发投入，这些行业的研发强度增长较快，2013 年达到 2.18%，要高于日韩的研发强度。（3）机械设备制造业。2007 年美国的研发强度达到 8.8%，大约是中国 7 倍；2008 年日本达到 6.8%，也是中国 5 倍多。2013 年中国通用设备的研发强度是 1.24%；专用设备是 1.48%，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处于最低水平，差距依然较大。（4）电子计算机、通信及其它电子设备产业。中国在电子计算机、通讯及其他电子设备产业的研发强

度明显低于主要发达国家，2008 年美国电子计算机、通讯及其他电子设备产业的研发强度为 14%~19%，法国在 7%~12%之间，其他几个发达国家也在 5%~8%之间，而中国在 2013 年只有 1.51%，中外差距仍是很大。



图 2 中国制造业整体 R&D 强度偏低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2013 年全国科技经费统计公报》，

http://www.most.gov.cn/tztg/201410/t20141030_116370.htm。

三、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战略的新动向

（一）金融危机后全球各国推出制造强国战略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为了寻找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出路，开始重新重视制造业，美国、欧盟、德国、英国等纷纷推出制造业国家战略。美、德、日等发达国家将重点锁定在以新一代互联网、生物技术、新能源、高端制备为代表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展开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竞赛，试图抢占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制高点。

此后，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都推出了各项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本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如美国政府就出台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以及《出口倍增计划》等诸多法案，提出优先支持高技术清洁能源产业，大力发展生物产业、新一代互联网产业，振兴汽车工业。德国政府正积极推进以“智能工厂”为核心的工业 4.0 战略，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日本于 2009 年 4 月推出新增长战略，提出要重点发展环保型汽车、电力汽车和太阳能发电等产业。韩国则在《新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中提出，重点发展能源与环境、新兴信息技术、生物产业等六大产业，以及太阳能电池、海洋生物燃料、绿色汽车等 22 个重点方向。

早在 2010 年，欧盟提出“欧洲 2020 战略”，其三大发展重点中的“智能增长”就涵盖了“再工业化”的主要内容，而在 2012 年 10 月发布的《指向增长与经济复苏的更强大的欧洲工业》中，就更明确地设定了“再工业化”战略的目标，即到 2020 年将工业占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当时的 15.6% 提高到 20%。在成员国层面，包括法国、英国以及西班牙在内的许多国家纷纷制定了相应的“再工业化”战略，如英国 2011 年发表的《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之路》报告中提出了六大优先发展行业，法国于 2012 年新成立了生产振兴部来重振法国工业，西班牙于 2011 年以“再工业化援助计划”的方式，由政府出资约 4.6 亿欧元来资助国内的再工业化项目。

从传统制造业大国日本来看，2009 年 12 月—2012 年 10 月的三年间，日本政府提出了五轮经济振兴对策，强化日本工业的竞争力是这些振兴对策的重要内容。安倍政府上台后，在大肆扩张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关注制造业的复兴。2013 年 6 月日本提出的“日本再兴战略”中，将产业再兴战略作为今后三大重点战略之一，并提出了紧急结构性改革、雇佣制度改革、推进科技创新、实现世界最高水平的 IT 社会、强化地区竞争力和支持中小企业的六项具体措施。

（二）“制造业服务化”是全球制造业发展的新趋势

所谓“制造业服务化”是指在经济全球化、客户需求个性化和现代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条件下，出现的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和生产组织方式，是制造与服务相融合的新产业形式。根据麦肯锡发布的调查报告，当前全球 500 强企业所涉及的 51 个行业中，有 28 个属于服务业；500 强企业有 56% 在从事服务业；而且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两个“70%”的现象，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 70%，制造服务业占整个服务业比重的 70%。国际制造业跨国巨头都在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它们已经向世界宣告了“制造业服务化”时代的到来。

“制造业服务化”也已经成为引领制造业产业升级和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制造业走向高级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制造业的生产将从提供传统产品制造向提供产品与服务整体解决方案转变，生产、制造与研发、设计、售后的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根据麦肯锡的研究报告，美国制造业的从业人员中，有 34% 是在从事服务类的工作，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占整个制造业产出的 20%~25%。德勤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联合发布《方圆有度 创新无疆——2014 中国装备制造业服务创新调查》报告，对中国 198 家装备制造企业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中国 78% 的企业服务收入占总营业收入比重不足 10%，只有 6% 的企业服务收入占总营收比超过 20%；就净利润而言，81% 的企业服务净利润贡献率不

足 10%，其余企业的服务净利润贡献率基本在 10%~20%之间徘徊。

（三）规则标准与主导是未来全球竞争的核心

规则与标准之争是全球未来竞争的核心。全球制造业竞争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技术专利和标准控制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竞争工具。发达国家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标准，尤其是关于安全、健康和环保等方面的标准，代表着掌控科技、掌控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来自德国和美国的八家汽车厂商（奥迪、宝马、克莱斯勒、戴姆勒、福特、通用、保时捷和大众）宣布未来将采用统一的充电接口标准，这一新标准将在欧洲和美国范围内使用。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也已规定，从 2017 年开始，所有在欧洲销售的新电动汽车都将采用这个新接口标准。德美八大汽车企业联盟制定充电标准的目的是，不仅仅是将眼睛盯在自己本土市场范围之内，更主要是希望以联合的力量，将标准推向全球市场，从而在全球电动汽车产业中占据领先优势，获得未来电动汽车市场的主导地位和控制力。

四、“工业 4.0”“工业互联网”“中国制造 2025”殊途同归

美国政府于 2012 年推出《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同年 12 月通用电气（GE）提出《工业互联网》战略。2013 年 8 月中国工信部发布《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2013—2018 年）》。由此，美国的“工业互联网”、中国的“两化深度融合”、德国的“工业 4.0”等殊途同归的工业发展战略为世人瞩目。

（一）“德国工业 4.0”

2013 年底，德国电气电子和信息技术协会发布了德国首个“工业 4.0”标准化路线图，以加强德国作为技术经济强国的核心竞争力。“工业 4.0”是德国政府 2010 年正式推出的《高技术战略 2020》十大未来项目之一。所谓“工业 4.0”，是相对于 18 世纪引入机械制造设备的“工业 1.0”、20 世纪初电气化的“工业 2.0”、20 世纪 70 年代信息化的“工业 3.0”而言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 4.0”是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或革命性的生产方法，通过充分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和网络物理系统等手段，实现由集中式控制向分散式增强型控制的基本模式转变，目标是建立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模式，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

从本质上讲，“工业 4.0”是将虚拟网络－物理系统技术一体化应用于制造业和物流行业，以及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物联网和服务技术。这将对价值创造、商业模式、下游服务和工作组织产生影响。如果说“工业 1.0”是机械制造时代，“工业 2.0”是电气化

时代，“工业 3.0”是自动化时代，那么“工业 4.0”是智能制造与服务的时代，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于制造业而言，“工业 4.0”意味着通过将建立全球网络，把它们的机器、存储系统和生产设施融入到虚拟网络—实体物理系统（CPS）中。物联网和服务使得有可能创建网络来整合整个制造过程，将多个工厂转变为一个智能环境。“工业 4.0”将使生产资源（生产设备、机器人、传送装置、仓储系统和生产设施）形成一个循环网络，包含相关的计划与管理系统；作为“工业 4.0”的一个核心组成，智能工厂将渗透到公司间的价值网络中，并最终促使数字世界和现实的结合。

（二）“美国工业互联网”

在工业革命和互联网革命之后，通用电气公司（GE）提出了工业互联网革命（Industrial Internet Revolution），GE 董事长杰夫·伊梅尔特称，一个开放、全球化的网络，将人、数据和机器连接起来。工业互联网推崇的是利用物联网和软件定义的设备，来充分开启工业领域的巨大效益。工业互联网将整合以下两大革命性转变的优势：其一是工业革命，伴随着工业革命，出现了无数台机器、设备、机组和工作站；其二则是更为强大的网络革命，在其影响之下，计算、信息与通讯系统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伴随着这些发展，三种元素逐渐融合，充分体现出工业互联网的精髓。根据 GE 预测，在美国，工业互联网能够使生产率每年提高 1%~1.5%，未来 20 年它将使美国人的平均收入比当前水平提高 25%~40%；工业互联网在此期间会为全球 GDP 增加 10 万亿~15 万亿美元，相当于再造一个美国经济。截至目前，GE 已推出 24 种工业互联网产品，涵盖石油天然气平台监测管理、铁路机车效率分析等。

（三）“中国制造 2025”

与美国工业互联网和“德国工业 4.0”相比，“中国制造 2025”更加强调以自动化、智能化的制造业改造升级为切入点，同时顺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最终完成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

中国计划用 30 年时间，通过“三步走”战略，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其中“中国制造 2025”对应的第一个十年，是“三步走”的第一步，计划用十年时间进入全球制造业第二方阵。具体目标包括：制造业增加值位居世界第一；主要行业产品质量水平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知名品牌；一批优势产业率先实现突破，做大做强；部分战略产业掌握核心技术，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中国要想为之后两步奠定好的基础，可采取以下八项战略对策：（1）推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并分两个阶段推进。2020 年前，广泛推行数字化制造，在优势行

业以重点企业为主体开展智能制造应用示范；2020年后，全面推广智能制造。高度重视发展数控系统、伺服电机、传感器、测量仪表等关键部件和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3D制造装备等关键装备。(2) 提高产品设计能力。(3) 完善制造业技术创新体系，促进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加强产业共性技术研究开发；加强创新人才培养。(4) 强化制造基础。(5) 提升产品质量，严格质量监管，建立质量诚信体系；提高重大装备的质量一致性、稳定性；推进品牌创建。(6) 推行绿色制造。(7) 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群体和优势产业。(8) 发展现代制造服务业。

GE同时预测，如果工业互联网可以把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提振到1995年IT革命时期的水平，那么在2030年，与不采用“工业4.0”技术相比，全球GDP将增加15万亿美元，亚太地区增加约4.2万亿美元。另据工信部和相关权威机构估计，在未来20年中，中国工业互联网的发展至少可带来3万亿美元左右的GDP增量。

五、以“中国制造2025”为核心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中国制造业面临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冲击，以及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前堵后追”的双重挤压，必须从实施“制造强国”的举国战略，加快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和全球价值链升级，重塑国家创新系统的创新能力，重构国家竞争优势。

(一) 加快构建制造业国家创新体系

创新仍然是一国制造业强大的第一驱动力，为加快构建中国制造业的国家创新体系，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科技资源，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下游的核心、关键以及共性技术进行技术攻关，通过创新链驱动，突破一批关键技术，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其次，围绕传统优势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条。以创新链为引导，增强传统优势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拥有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传统企业集聚优势资源加速发展，从而带动整个传统优势产业的转型升级。

第三，建立创新生态系统，快速、高效地整合产学研资源。中国制造业发展普遍存在主管部门各自为政、产学研之间分散断层等问题，亟需建立制造业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整合资源，推动全产业链协同发展。一是建立多元参与的协同创新联盟，产学研合作集成研发能力，建立健全联合创新解决难题的体制机制。二是建立“研发服务于应用”的

制造业创新生态体系，产学研共同投资面向市场的关键制造技术，清除先进制造工艺快速、高效商业化的体制障碍。三是建立基础设施共享机制，加快技术转移的激励机制建设，防止出现人为的技术壁垒和行业垄断，快速推动制造业的产业规模化发展。

（二）将“中国制造 2025”提升为强国战略

“中国制造 2025”作为中国制造业未来十年的顶层规划和路线图，基本思路是借助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结合，改变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令中国到 2025 年跻身于现代工业强国之列，成为中国的强国战略。

根据中国工程院在规划《中国制造 2025》时对世界主要国家制造业发展的调研，按照规模发展、质量效益、结构优化和持续发展四项一级指标，以及 18 项二级指标构成的制造强国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出制造强国综合指数，把这些国家划分成三个方队。第一方队是制造业居于全球绝对领先地位的美国，第二方队是德国和日本，第三方队有英国、法国、韩国、中国等。中国制造业目前的状况是发展不平衡，处在还没有总体完成“工业 2.0”（大规模制造机械化）和“工业 3.0”（工业自动化）、就需要面对“工业 4.0”（工业自动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的形势。因此，中国工业制造的发展，不像西方发达国家走的是“工业 2.0”“工业 3.0”，进而“工业 4.0”的串行发展，而应该是“工业 2.0”“工业 3.0”和“工业 4.0”并行发展的道路，这就需要注意“高低结合”，不去犯“去低端工业化”的错误，即全民追求高端而全盘放弃低端制造业。具体实施路线包括：

1. 加强顶层设计，对关键共性技术领域进行技术攻关。先进制造业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更是新工业革命时期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先导力量。中国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战略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对关键共性技术领域进行技术攻关。一是制定中国先进制造业总体规划并设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加强组织协调，积聚优势力量和科技资源，推动形成支持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合力。二是制定关键共性技术发展路线图，大力推动 3D 打印、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应用等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应用。三是加快实施“工业强基专项行动”，提升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发展水平，通过重点领域突破来提升中国工业基础能力。

2. 加快推进制造业“两化（工业化、信息化）”的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智能化。在未来 20 年里，中国要努力将信息产业的重心由互联网内容及服务转到物联网及其智能联动上来。因此，建议将“智能联动”作为中国未来 20 年两化融合的战略支点。为此要高度重视大数据产业开发，前瞻布局核心智能制造技术。推动两化深度融合，提振信息消费需求。加快实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2013—2018 年）》，推动智

能制造生产模式的集成应用，发展网络制造新型生产方式。鼓励智能终端产品的创新发展，增强电子基础产业的创新能力，提升软件业的支撑水平，丰富信息消费内容。

3. 制造强国战略的核心是布局高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必须高度重视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加快推进重点行业的结构调整。当前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基础坚实，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蛟龙”载人深潜器取得重大突破，智能制造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因此，积极推动装备制造业“走出去战略”。以中国高铁为例，可通过异地投资、兼并重组、合资合作等资本运营手段，实现由产品输出到产品、技术、资本、服务输出的转变。建议政府主导成立包括设计、施工、整车、关键部件、运营等相关单位在内的联合体，发挥中国高铁行业的整体优势，形成国际级产业力量，以及从设备出口到系统标准输出的转换。

4. 坚持标准先行，把制订智能制造标准化作为智能制造的优先领域。把握智能制造的发展特点和规律，整合中国国内标准化资源，借鉴“德国工业 4.0”标准化路线图，以及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和工业互联网标准建设的工作思路和组织方式，加快智能制造标准化体系建设。比如，加快制定智能制造标准化路线图，尽早启动优先急需领域标准化的制订工作，建设和推广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三）通过“制造+服务”提升价值链控制力

当前，“制造业服务化”是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全球价值链当中的主要增值点，也是提升价值链控制力的焦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实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双轮驱动”，通过“服务”和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提升制造业的附加价值。以知识密集型为特点的生产性服务业，不仅是指研发新技术、新产品，还包括为推进生产经营管理方式的转变而提供的增值服务。这就需要有完善的市场环境为“制造业服务化”转型保驾护航，因为“制造业服务化”的顺利推进需要完善的市场环境为其保驾护航。面向制造业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新技术研发、物流、技术支持、信息咨询、金融租赁和保险等服务，需要完备的知识产权法规、健全的社会诚信体系、严格的监管体系作为保障。

（四）启动国家智能制造重大专项工程

智能制造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新趋势，智能设备和生产手段在未来必将广泛替代传统的生产方式。当前，中国在智能测控、数控机床、机器人、新型传感器、3D 打印等领域已经初步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但总体看来，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仍然是以简单

的扩大再生产为主要途径，因此，通过智能产品、技术、装备和理念来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的任务是艰巨而迫切的。建议从国家层面启动实施智能制造专项工程，加强技术攻关，开展应用示范，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一是重点突破智能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系统集成、设计、制造等核心技术研究。二是开展数字工厂应用示范。在全国范围内分行业分区域地选取示范企业，给予支持，建设数字制造的示范工厂，发挥“种子作用”。三是推动制造业的大数据应用。以行业龙头企业为先导，鼓励企业应用大数据技术来提升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产品营销及服务环节的智能决策水平和经营效率。

责任编辑：黄启云

消除西方对中国法律误读的路径探讨^{*}

——以西方比较法学研究为视角

顾华详

摘要：国家法治文明程度和法治体系的完备程度，直接反映了执政党依法执政的能力、国家政权的生命力和国际形象。西方传统观点对中国法律地位认识的严重偏差，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存在，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西方社会研究中国法律所用案件是非常有限的，且缺乏深入分析，对此要做到心中有数。消除西方社会长期以来误读中国法律所形成的积习与痼疾，对此要有足够的耐心与持久的行动力。正确处理好消除西方误读与坚持向西方学习并保持交流的关系，对此要有兼收并蓄、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积极凝聚更加广泛的社会共识，合力优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内外大环境。

关键词：西方法律 中国法律 依法治国 消除误读

作者简介：顾华详，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社会发展处处长。

中国法治文明是中国文明的重要构成和显著标志。从人类社会法治文明的进程来看，中国是世界法治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历史历程中，虽然朝代盛衰更替，但五

^{*}本文系中国法学会 2012 年部级重大课题《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法治保障若干问题研究》（CLS 2012）A03）的成果之一。

千年之久的文明延续不断，特别是古代成文法传统从来没有中断过，源远流长的中华法制文明博大精深、成果丰硕，最终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世界公认为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①中华法治文明随着陆海两条丝绸之路广泛地传播并影响着东西方国家的法治，在很长时间里位于世界法治文明的前列，为世界法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法律在世界法治文明中的历史与现实地位不容忽视。但长期以来，在西方主流比较法学文献和比较法学研究中，都只将西方法律作为正统，而认为中国法律在国家治理体系和传统社会中不占主导地位。然而，中国法律在世界法治文明发展史上重要而独特的地位不容置疑。西方传统观点对中国法律地位认识的偏差，特别是西方社会历来对中国礼法结合的法治文化认识不清，对中国法治模式理解不透彻。这当然与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西方研究中国法律的学者能力等诸多因素有着密切关系。同时，这也充分暴露了西方对中国的偏见、狭隘与无知。^②一国的法治文明程度、法治体系的完备程度，直接反映了执政党依法执政的能力、国家政权的生命力和国际形象。因此，消除西方社会对中国法律的误读^③，对引领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中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也更加有助于国内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是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外国法治的有益经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实施、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④确保党执政兴国、人民幸福安康、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现实需要；是法治全力服务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的生动实践的的现实需要；是对内积极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外积极“加强互信协作、促进安全稳定”的能力，不断提升中国法律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现实需要；是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国梦”、通过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实现与欧亚及其更加广泛区域共同发展的现实需要。^⑤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积极消除误读，澄清事实，赢得理解、尊重与支持，形成有利于中外共同繁荣发展的国际共识。

①张文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经验》，《人民日报》2011年3月13日第12版。

②顾华详：《论西方比较法学视野中的中国法律》，《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③不可否认，中国对外国法律也存在着诸多误读，但彼此存在的误读和误解，恰恰说明比较研究还非常不够，彼此间的交流交往交融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这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都显得特别重要。

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第3版。

⑤顾华详：《论西方传统社会对中国法律的误读——以西方比较法学研究为视角》，《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一、西方传统观点对中国法律地位认识的严重偏差，过去、现在和今后都会存在，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西方学者特别是一些法律界人士不了解中国法治，他们用自己的观点和经验来解读中国法律体系的发展^①，对中国法律所做的比较研究，往往是只看到了中国古代社会法治的一个断面或局部的一部分，其“盲人摸象”般的研究和轻率武断的结论，往往使其在中国法律的比较研究上难以作出正确结论。他们对中国法律的不解、疑惑、误读自然就会很多，特别是中国法律中的闪光之处、智慧之策、创新之举乃至与西方法律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妙的内容，西方学者都难以理解和正确认识。这其中，最典型、最具有代表性的应该是浙江枫桥成功实践了50多年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强调第一现场的平安建设，再小的案件也不简单处置，把群众对公平正义与和谐平安与否的切身感受放在第一位的“枫桥经验”。坚持“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是“枫桥经验”长盛不衰的法宝，也是实现“科学发展、和谐稳定、依法管理”三大核心任务的基础。1963年11月毛泽东主席批示要求全国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2013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就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枫桥经验’^②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③历经50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枫桥经验”在掌握预防化解社会矛盾主动权，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加强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及时调解矛盾纠纷，让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社会公平充满信心等方面，树立了实践的典范。

^①美国国际商务理事会中国委员会联合主席、富理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费达对人民日报记者说出了此番话，并且说：“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法律体系。中国是个大国，像美国一样，我们都有一些问题。但是中国有许多新的变化，中国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取得许多积极的成果。”苑基荣、徐伟等：《适应时代要求，推进依法治国——国际社会瞩目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2日第3版。

^②长期以来，浙江诸暨市枫桥镇紧紧围绕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主题，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枫桥经验”。习近平总书记任浙江工作期间，重视部署平安浙江、法治浙江的工作，强调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浙江省坚持把“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贯穿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牢固树立依法治理的理念，把群众路线与法治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支持群众依法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紧紧扭住群众工作这条主线，牢固树立大平安的理念，大力实施和谐促进工程，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牢固树立改革创新的理念，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战略，形成干部创事业、能人创企业、百姓创家业的生动局面；牢固树立共同富裕的理念，形成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的长效机制，走出一条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新路子。

^③王比学：《习近平就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12日第1版。

“枫桥经验”不仅把党的群众路线与法治建设生动而密切地结合起来了，而且把经济社会发展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治理等都紧密结合起来了，把程序法与实体法紧密结合起来了，充分体现了法治的公平与正义，完美地实现了依靠群众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法治文明建设的目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彰显了独特优势。“枫桥经验”是在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提升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和水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法治文明建设有序推进、国家长治久安方面，充分发挥了独特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创造了人类法治文明史上的奇迹。“作为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是人与人之间实现交往、确定关系及秩序的重要途径。”^①在这一点上，中国法律的过去与现在都丝毫没有例外，中国法律与西方法律相比，没有丝毫的逊色。但对中国法律的创造和奇迹，西方学者们则非常费解，并由此而对中国法律不断产生更多的误解。

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著名华裔学者李浩（Victor H. Li）在其出版的《没有律师的法》一书中，就专门研究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法律制度。李浩认为，中国法律存在着与西方法律不同的解决纠纷的内部模式，即中国社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是自生性的，它不需要法律专业人员来解决纠纷，只要通过社会自发形成的一种机制，如村长、家长、乡绅，以及当今农村的村民委员会或者领导，都可以按照传统的乡俗习惯、人情世故，再结合国家法律法规，就可以通过调解把纠纷化解掉。这种做法既不花钱、又省时，更重要的是当事人之间不至于撕破脸皮，对构建和谐社会、加强社会管理、融洽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都非常有益。与内部模式相对应的是通过法院解决纠纷的外部模式，它不是自发性的，而是依靠从外部输入的力量来解决矛盾纠纷。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建立起了这种模式，当时民国政府曾经通过立法推行这一模式，虽然编纂了“六法全书”，但在实际解决纠纷方面，外部模式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通过司法改革改造了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司法人员，但运行这一外部模式，仍然缺乏大量的专业法律工作人员。因此，虽然中国法院系统自上而下都建立了，但实际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大量纠纷还是通过内部模式解决。所以，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一样，法律即使建立起来，仍然是一个法律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②因此，一些西方学者预言，中国实现社会现代化，必须使具有公共性、实证性的法律占主导地位，必须实现从传统法向现代法

①米健：《当代德国法学名著总序》，[德]齐佩利乌斯著：《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②Victor H. Li, *Law without Lawyers, A Comparative View of Law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78.

的转变。应该说，这个认识在东西方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在中国实际情况却并不完全如此。与前述的“枫桥经验”对比来看，西方学者对中国法律和司法的认识，都是只看到了其外在的形式，而没有认识清楚其本质。他们思维的僵化和知识的缺乏以及认识的片面，都让中国的法学同仁们感到惊讶。当然，西方学者中也不乏高明之人和高明之处，在西方学术界也有学者对这种中西方比较研究提出了质疑，这是难能可贵的。同时，这也警示中国学者，在研究外国法律和进行中外比较时，肯定也存在上述的问题，这是比较法学研究应当着力避免的问题。

二、西方社会研究中国法律所用案件非常有限， 且缺乏深入分析，对此要做到心中有数

仅从一个具体问题来看，就可以对西方传统社会有关中国法律的误读窥其一斑。长期以来，中国人厌诉也是西方人不能客观看待中国法律和法治建设的一个因素，并且直接导致对中国法律和法治建设的负面评价。在中国社会的平民阶层中，从古至今都有诸如“远诉讼、胆如鼠”的家训。厌诉与好诉本无所谓好与不好，只是一个随时间、地点、条件而变化的平常问题。如果对中国人的厌诉一律不加分析地进行负面评价，就难免要成为笑柄，因为从古至今，中国社会“健讼”的案例就是司空见惯、数不胜数、不胜枚举的。仅《清史稿》中就有吴、赣、闽、粤、湘、浙等地社会“健讼”的诸多记述。^①清代学者崔述也有“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也。讼也者，事势所必趋也，人情之所断不能免也，传日饮食必有讼”^②的记述。西方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解决诉讼爆炸的问题，也

①《清史稿》卷二四七《方国栋传》记载：“吴俗健讼，喜投牒告密，国栋辄不问，即有所案，亦从宽。”卷二七六《刘荫枢传》记载：“赣俗健讼，荫枢昼夜平决，惩妄诉者，讼渐稀。”卷三三六《张维寅传》记载：“闽俗犷悍，痛惩以法，擒巨猾，散夥党，健讼斗狠之风为息。”卷三五七《董教增传》记载：“福清武生林弥高者，健讼包粮，阻众不纳，邑令躬緝，为其党邀夺，官役并伤，令文武往捕获，弥高嗾其党劫持，通县抗征。”卷三九三《李星沅传》记载：“粤士多健讼，檄通省籍诸生之干讼者，牒报治之，士风以肃。”卷四四八《涂宗瀛传》记载：“湘民故健讼，都察院岁所下狱辄逾百数。”卷四七六《循吏传一·廖冀亨传》记载：“初，冀亨莅任时，有吴人语之日：‘吴俗健讼，然其人两粥一饭，肢体薄弱，凡讼宜少准、速决，更加二字日‘从宽’。’”卷二八九《朱轼传》记载：上以浙江风俗浇漓，特设观风整俗使，轼疏言：“风俗浇漓，莫甚于争讼。臣巡抚浙江，知杭、嘉、湖、绍四府民最好讼。请增设杭嘉湖巡道，而以绍兴属宁台道。民间词讼冤抑，准巡道申理。”卷四七九《循吏传四·冷鼎亨传》记载：“地瘠而健讼，乡愚辄因之破家。”参见邓建鹏：《健讼与贱讼：两宋以降民事诉讼中的矛盾》，《中外法学》2003年第6期。

②[清]崔述：《无闻集·论讼》（卷之二），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①以至于孔子曾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其实，孔子在这里说的并不是西方学者所认为的“厌诉”，而是说孔子和别人在审理案件上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他的目的在于通过诉讼达到“无诉”的境界。这实际上是一种司法的工作方法，是敬业者精益求精的一种追求。中国人追求“无诉”是一种司法的境界，与“厌诉”毫不相干，但长期以来，这一美好的追求则被西方学者误读了。关于中国人是否厌诉的问题，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美国华裔学者黄宗智教授提出，过去西方学者、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对清代法律制度的研究，一方面主要是着眼于清代法律的表达，这主要体现在成文律例和判牍汇编等文献资料中；另一方面，虽然也不乏对某些具体案件的分析，但被选用案件的数量往往是非常有限的，缺乏立足于更广泛的案件资料之上对具体司法实践所作的深入分析。黄宗智以地方诉讼档案作为主要研究材料，基于对四川巴县、顺天府宝坻县、台湾淡水府—新竹县的清代三地诉讼档案资料的深入考察，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清代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和清代官方表述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他将这种突出的特征表述为“实践”与“表达”之间的“背离”，即中国人并不厌诉，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诉讼，而绝大多数诉讼者都是普通老百姓，官府审理案件很少运用调解，^②多数是判决结案。

中国法律在发展的初期就非常注重科学立法和公正司法。早在夏、商、周时代中国法律就对诉讼的司法公平公正有着深刻认识，而且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只是由于年代久远，相关的文字记载史料难以查找到。这就给中外法学研究造成一定困

①当代的西方社会，有高度发达的法律制度支撑，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得到了法律的规范，好诉与诉讼爆炸也已成为一种社会病。但从法院审理案件的实际情况看，以美国为例，尽管书本上的法律设计相当完备、合理，用韦伯的话是“理性的”，但在民事和行政案件中，真正通过审判的比例极小，大量的案件都是通过审前程序、简易程序、缺席判决、选择性纠纷解决机制或撤诉、和解等方式解决。有资料显示，审判所占比例在联邦法院系统不足 2%，在州法院系统的比例可能高一些，但也不到 10%。就刑事案件而言，美国确实设计了体现法治精神的刑事诉讼程序，包括辩护制度、证据制度、回避制度、上诉制度等等，保护刑事被告人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但实际情况却是，这种法律制度所起的作用极其有限，90%以上的刑事案件包括重罪案件，根本不是通过开庭审判，而是通过控辩交易。参见 Marc Galanter, *The Vanishing Trial: An Explanation of Trials and Related Matters in Federal and State Courts*, 1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459-570 (2004)。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西方法律制度、诉讼制度是形式理性的，是促进社会向合理化的方向发展，为什么人们不愿意选择这种制度设计，而宁愿选择实质的、非理性的、传统的制度？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和法院收费、诉累直接相连，但是熟人关系中的“厌诉”心理，也是导致人们通过其他手段解决争端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方面，西方人与中国人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②[美]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日本的夫马进教授在 1990 年初对此问题有专门的反思，近年主编出版了《中国诉讼社会史》一书，京都大学出版会 2010 年版。参见尤陈俊：《“厌讼”幻象之下的“健讼”实相？重思明清中国的诉讼与社会》，《中外法学》2012 年第 4 期。

难，由此也导致许多西方法学研究者们的研究得出许多错误结论。据《左传》中引《夏书》的记载：“与其杀无辜，宁失不经和宥过无大。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①皋陶（公元前约 2280 年—2170 年）是中国史学界公认的“司法鼻祖”，以公平公正执法而闻名天下。舜要求皋陶处刑要让人信服，以公正明允取得民众信任。皋陶主张“五刑五用”，刑分五等，罪有轻重的刑治观念。据史书记载：“皋陶为大理，天下无虐刑、无冤狱”。皋陶执法谨慎，不伤无辜，尽量宽恕过失犯罪者，但坚持从严惩处故意犯罪或累犯，从轻或从缓定罪处罚疑罪者。皋陶奉行“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安邦之道，其司法思想被孔子发扬光大，奠定了儒家理论基础，并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王朝治国理政和法制建设的基础理论。在皋陶司法理念和法治理论的指导下，为保证司法公平公正和严肃谨慎执法，防止无辜者被冤枉或错杀，中国古代刑法中早就已经确立了“疑罪从无或从轻从缓”的司法理念。在处理疑难案件时，一般都是坚持“疑罪从轻”或“予以赦免”的原则处置。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就有一些“疑罪从无”或“从轻发落”的判例，而且得到了当时社会乃至在更加广泛区域的认可。从中国古代的司法理念和实践中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早在古代就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诉讼法律制度，而且有着科学的诉讼法治理念、丰富的诉讼法治实践，这必然会对中国法治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也会在中国历代法治建设中得到体现。

中国古代法治文明中有许多具有普遍价值的因素^②超越了时空限制而流传至今。古代中国的法治注重法律的人文精神，即：主张民本思想，强调以人为本，注重维护社会与家族的和谐稳定；善于通过人文精神来整合与引领社会成员的心理和观念世界，达到维系和规范整个社会的法治目的；主张德与法并存，注重礼与法互补，强调明德而慎刑；注重以和谐、和睦、和平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融洽和巩固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中国法治中这些观念和思想乃至文化魅力至今仍令西方法治望尘莫及。始于皋陶的法治意义上的中国刑法，是当时亚洲大陆最早系统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刑法。皋陶对当时的刑法制度进行了大胆改革，使以往刑事审判由“神断”转变为“人断”，构建了更加规范的审判制度，为后世确立“以证据定罪”的刑事审判制度奠定了基础。皋陶确立了罪与罚的原则，主张执法公正、从轻量刑、同罪不同罚、处罚罪犯不连累其后人。皋陶重视思想

①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②在中国的现代立法中，特别是在刑法、民法、诉讼法等领域，也仍然注重传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元素，在对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丰富资源进行梳理和甄别的基础上，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和扬弃，把那些能与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科学理性、社会和谐为内容的时代要求协调兼容的文化传统融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中，使中国法治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浑然一体。引自张文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经验》，《人民日报》2011 年 3 月 13 日第 12 版。

教化，主张五刑处于辅助地位，“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以构建没有犯罪的和谐社会和实现长治久安的法治目的等。这些做法都推进了中华法治文明的发展。中国夏代“禹刑”、商代“汤刑”和西周的“九刑”或“吕刑”都源于皋陶刑法。皋陶制定的“五刑”早于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300 年~400 年之久，其法治思想的典范作用对中西方文化和法制建设的影响都非常深远。霍尔巴哈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瞭，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他在《社会体系》中提出：“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① 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波维尔（也译为波瓦伏尔）更是提出要以中国法律为榜样，其在《哲学家游记》中记述道：“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去向的美妙世界。”^② 但遗憾的是，中国法治建设中这些熠熠生辉、闪耀着朴素辩证法光辉的法治思想和文化思想，以及对后世中西方社会影响深远的法治实践，却都没有得到西方法学家们的高度重视，而少有的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也有失偏颇。

三、消除西方社会长期以来误读中国法律所形成的积习与痼疾，要有足够的耐心与持久的行动力

中国是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泱泱大国，但自 1840 年鸦片战争战败开始，中国王朝制度文明退化到了脆弱不堪的地步，导致国家和民族遭受了巨大灾难。在半封建王朝统治下，中国原有的法律制度被弱化，引进的外国法律制度水土不服，这导致人治在中国国家治理方式上占据主导地位，法治被严重边缘化，法律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的核心地位严重丧失。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关键因素是，以法律制度为基础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走向成熟和健全。而这期间的中国，则正是国家治理体系紊乱，国家治理能力孱弱的时期，社会和民众思想僵化，整个社会活力被严重消解，国家与社会都处于创新缺乏动力、发展缺乏能力的积贫积弱、孤立无援、被动受冲击的境地，这是近代百余年来中国落后挨打的关键性因素。近代的一百多年来，中国由强盛沦为落后进而沦落到挨打受辱，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总体来看，其根源还是由于法治权威旁落、人治盛行所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变革，适合其国情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法律制度得到了优化，这促进了大工业体系的快速发展，使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快速提高，并进而导致世界格局的快速转变。相比之下，原本发达的中国封建政治文明、

^① 霍尔巴哈：《社会体系》（第 2 卷），转引自朱谦之：《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上海书店 2010 年版。

^② 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

农业文明已经落后于西方现代政治文明、工业文明，导致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严重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基于中国农耕社会构建的法律制度文明体系，在西方大工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法律制度文明体系的冲击下，中国社会法律制度受到严重冲击，导致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治理体系严重失灵，国家治理能力严重削弱。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忠告过，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的惨败，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战后日本从“半农业国”的国情和经济状况出发，坚持依法治国，仅在二战之后，日本先后颁布的经济法律就多达 130 多部，这为旧秩序的解体、新经济的振兴以及社会体制的再建提供了法制上的保证，从而保证了经济建设的成功。^①这两者相对比所形成的强烈反差，给中国的教训应该是刻骨铭心的。回顾与检讨中国近代百余年的屈辱历史，加强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比较，更加凸显了全面加强中国法治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历史与现实价值。

今日之中国，凭借自己深厚的法治文明底蕴和实力又一次改变了世界格局，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再一次推上了一个全新阶段，对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而重要的贡献。从法治文明建设的层面来看，这其中也包括着中国对西方传统观点及法律和社会发展模式提出的新挑战。中国学者提出，在法律地位和集权与分权的问题上，将中国法律与西方法律简单对立是不妥当的观点。特别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西方和中国面对的许多问题是共同的，处理问题的许多措施或许应该是相近相通的。有西方学者指出：“两个世纪以来，影响力总是指向一个方向——西方对中国施加影响。但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国也开始影响西方”。^②笔者认为，这种影响在比较法学研究领域中，应当是坚持引导中西方法律比较研究从进化模式转到以问题为中心和导向的轨道上来，特别是在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促进沿途各国的共同繁荣与复兴、促进世界经济尽快复苏的战略行动中，比较法学研究的价值将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一国之法律已经难以拒绝外来因素的干预和影响。因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进程中，中国应更加重视通过加强比较法学研究的途径，在不断提升法制建设的自主性、独创性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与国际社会的相容性，坚持对内要重视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外重视提升“加强互信协作、促进安全稳定”的能力，以保障和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①顾华详：《论法制化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与核心》，《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 年第 4 期。

^②孔根红：《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共产党》，《求是》2013 年第 19 期。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求为依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更加重视凝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面向中国改革、发展与稳定和谐的现实需要，合力解决改革、发展与稳定和谐中的实践性问题。要大力弘扬“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更加重视以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个国际战略为引领，团结各方面力量来共同面向未来，进一步增进西方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法律的认识，尊重并积极认可不同制度文明的差异，自觉宽容差异，增强开放性、包容性、融合性与凝聚力，共同为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四、正确处理好消除西方误读与坚持向西方学习和保持交流互鉴的关系，对此要有兼收并蓄、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

包括中国法律在内的中华文明，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过去和现在都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但西方社会对此完全视而不见或视而不能见。中国虽然推翻了帝国主义的欺凌压迫，迎来了快速崛起的好时光，但中国仍在西方的误读之中，获得西方全面、客观的解读尚需时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快速提升，特别是适应中国不断拓展纵深发展和战略空间的需要，消除西方传统社会对中国法律长期以来的误读，有利于树立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推进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和对内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共建，构建全球新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新格局，保障中国战略安全。当然，揭示西方传统社会对中国法律的误读，并不是要否认和排斥对西方法律的学习。相反，今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学习人类社会古往今来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更加需要以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积极吸取西方法律文明的精华为我所用，并不断为人类创造出优良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凝炼出有益于国际社会发展和治理的法治思想与理论体系。这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所应当肩负的一项重要使命。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科学处理礼与法、情与法、权与法的关系，实现法治改革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推进，真正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等等方面，还都是中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需要改革攻坚的“硬骨头”。因此，中国还特别需要通过进一步加强比

较法学研究,积极吸收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文明成果^①。在此过程中,比较法学研究和法律借鉴应当坚持以下三条原则:一是要立足本国国情。法律是经济社会的反映,应该符合本国的政治架构、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背景,只有这样才能扎根于本国土壤。在研究和借鉴他国法律时,应该从本国的实际出发,不能盲目照抄,也不能直接移植;否则,这种“借鉴”的法律很容易与本国现实脱节,在实际中往往行不通。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不顾及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情及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去照搬他国的法律体系。这方面没有成功的例子,只有失败的教训。二是要深入研究国外的法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迫切需要中国在法治建设中高度重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统筹与协调,必须树立世界眼光,强化战略思维,^②坚持中国法治建设的开放性。西方法律体系中一些有益的、适应中国国情的内容,应予以吸纳,一些先进的立法技术应积极借鉴。在借鉴国外法律时,如果“对一个国家的法制史一无所知,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的法律;在考察一个国家的法制史时,我们必须将之与该国总的历史背景,即法律在其中得以发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结合起来”。^③要认真考察和探求背后的法制史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等因素,做到既知其现状也知其历史,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做到科学借鉴。三是要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不能只拘泥于法律的借鉴,应该坚持开放思维,对不同国家的法律进行比较,做到择善而从,这

①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中,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东西是必然的,但借鉴也好、接轨也罢,都不能妄自尊大、不能失去自信心。担任过联合国海牙国际法院院长的中国法官史久镛先生在回顾新中国对国际法发展的贡献时,曾感慨道:“这些年里,中国法学界在强调借鉴、接轨的同时,对中国法律人自己独创的一些理论和实践淡漠了,乃至不大提及了。”史久镛法官的感慨应当被中国人牢记、被比较法学研究和依法治国方略实践所记取。参见苏长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国国际法理论体系的思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6期。2014年9月19日,在印度新德里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确定:“双方重申将遵守共同确定的原则与共识,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关切和愿望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印度、缅甸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的智慧结晶,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关系准则,为推动国际社会建立公正合理的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对国际法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中国设立并颁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谊奖”,除了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要继承和弘扬五项原则,推动建立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之外,也有向国际社会重申要与世界各国共同传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希望国际社会有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积极投入中外友好事业中来,让和平共处成为维护国际秩序,共同实现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伟大复兴的梦想之意,另外,此举也诏告国人,中国提出的国际法基本准则,自己要树立自信,要在依法治国方略实施中坚持下去。参见杜尚泽、吕鹏飞:《习近平会见印度友好人士、友好团体代表,并颁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谊奖》,《人民日报》2014年9月20日第1版。

②顾华详:《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法治建设》,《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③〔德〕罗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G·莱塞:《德国国民商法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样才能妥善处理经验理性与重构理性, 积极进取与开拓创新的关系。^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是静止的、封闭的、一成不变的, 而是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的内容非常庞杂、范围广泛, 尤其是在中国仍然处于改革、转型时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 全社会对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对比较法学研究都会不断提出新课题和新要求, 因此, 比较法学研究应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要有战略思维和创新精神, 要着力研究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重大战略的实施, 是在认真系统总结中国近代 170 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90 多年历史、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历史、改革开放 30 多年历史^②基础上得出的厚重、悲壮和无可置疑的历史结论。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加快建设法治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不懈的奋斗目标, 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上自我完善、自我提高必须做好的功课。因此, 必须坚持和完善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实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统筹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③ 协调优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逻辑联系; 协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使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信念与追求, 确保全面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水平;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法治是治国理政和有效处理国际事务的重要方略与举措。中国法治建设更好地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服务, 保证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准确把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总布局 and 重点任务, 着力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 坚定不移地推进法治领域改革, 扎实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坚持紧随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④ 更加积极参与重大国际事务处理、国际规则制定和国际型法律人才的培养, 不断提升中国法律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坚持从国情和实际出发, 努力使法律能准确反映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合作与发展的要求, 更好地协调国内外更加广泛区域内更加复杂多样的

①冯玉军:《中外法律体系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35602>。

②沈传亮:《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探索和启示》, 《学习时报》2014 年 7 月 28 日第 A3 版。

③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14 年 9 月 6 日第 2 版。

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人民日报》2014 年 10 月 29 日第 3 版。

利益关系，充分发挥法律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推动法治化成为国内国际社会共同的行为准则，不断提高国内外各方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努力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最广泛的国际国内共识。

参考文献：

1. 张文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经验》，《人民日报》2011年3月13日。
2. 顾华详：《论西方比较法学视野中的中国法律》，《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3.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
4. 顾华详：《论西方传统社会对中国法律的误读——以西方比较法学研究为视角》，《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5. 王比学：《习近平就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12日。
6. 米健：《当代德国法学名著总序》，[德]齐佩利乌斯著：《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7. [清]崔述：《无闻集·讼论》（卷之二），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8.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
9. 霍尔巴哈：《社会体系》（第2卷），转引自朱谦之：《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上海书店2010年版。
10. 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11. 顾华详：《论法制化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与核心》，《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12. 孔根红：《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共产党》，《求是》2013年第19期。
13. 顾华详：《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法治建设》，《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14. [德]罗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G·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15. 冯玉军：《中外法律体系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35602>。
16. 沈传亮：《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探索和启示》，《学习时报》2014年7月28日。
17.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18.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
19. Victor H. Li, Law without Lawyers, A Comparative View of Law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78.

责任编辑：黄启云

· 调 研 报 告 ·

以色列“绿色国会”项目考察及其它*

李晓西 朱兆一 荣婷婷

摘要：本文从以色列的“绿色国会”项目出发，以一位绿色工作者沙姆博士为主线，重点介绍了以色列“绿色国会”项目的启动与实施、沙姆博士绿色住房的设计理念与内容、普及绿色理念与培养绿色人才的重要性。本次以色列绿色经济考察的启示有多个方面。在推行绿色经济与绿色消费中，国家机构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做到实处；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是践行绿色经济的首要因素；绿色建筑构成绿色产业与绿色消费中的关键部分；建设绿色国家一定要以绿色产业为基础。

关键词：绿色国会 沙姆博士 以色列

作者简介：李晓西，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

朱兆一，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荣婷婷，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2014 年 11 月 6 日—12 日，我们前往以色列参观考察绿色经济，考察的重点是绿色建筑。此行得到以色列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以色列国会秘书长 Ronen Plot 安排我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评价体系、实现路径与政策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71333001。

们参观了正在进行的“绿色国会”项目，该项目规划的协调员 Dr. Samuel Chayen（沙姆博士）详细为笔者介绍了“绿色国会”的规划与进展，本文的第一部分介绍了这些情况。沙姆博士对绿色建筑的热情与专业，引起了笔者对沙姆博士家住房如何体现绿色建筑理念的兴趣，因此，秘书长 Ronen Plot 特别批准沙姆博士第二天上午在家中接待笔者，本文的第二部分介绍了沙姆博士的绿色住房。上述两处参观使笔者对沙姆博士本人的教育背景与经历也深感兴趣，因此，本文的第三部分是对沙姆博士进行个人经历的介绍。第四部分是笔者的体会，概括了考察后的四点启示。

一、“绿色国会”项目的启动与实施

众所周知，以色列在推动环保与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全球声誉。政府以身作则并积极发动以色列民众进行“绿色变革”，2014 年以色列国会启动了“绿色国会”项目。以色列国会秘书长 Ronen Plot 指出：“在 2014 年 1 月初，以色列国会启动了‘绿色国会’项目，该项目是国会议长 Yuli Edelstein 发起的旗舰项目。作为国会秘书长，我将努力确保该项目的各项措施能够落实到位。该项目需要经过多年的努力才能完成，其目标是将以色列国会转变为一个以可持续发展作为行动准则的国会。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多样的、跨学科的方法，可以从环保、社会与经济的角度检验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Dov Khenin、Zvulun Kalfa、Nitzan Horowitz 议员已同意主持该项目”。于是，笔者在和这位国会秘书长见面后，参观了以色列国会并听取了沙姆博士对以色列“绿色国会”项目的介绍。

“绿色国会”项目的第一阶段共包含 13 个分项目，具体有节水、节电、节气、太阳能发电等。为便于比较与记忆，笔者特别整理了一张“绿色国会”项目 13 项资源节约举措的情况表，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 “绿色国会”第一阶段项目情况

排序	具体改造或新建的子项目	收益	年节省经费预估
1	安装每个工作日结束时自动关闭电脑的软件。	可对 1200 台以色列国会的电脑起到节电功能	120000 新谢克尔
2	安装自动关闭无人房间的暖气、空调和照明的探测传感器。	可自动控制国会每栋建筑内无人房间内的空调和灯光	220000 新谢克尔
3	更换停车场的照明设施——用 LED 灯替换 T8 荧光灯。	节省用电	65000 新谢克尔
4	用 LED 灯更换整栋大楼的双色卤素灯泡，用 T5 灯管替换 T8 荧光灯。	节省用电	35000 新谢克尔

续表 1

排序	具体改造或新建的子项目	收益	年节省经费预估
5	在国会屋顶上安装 4650 平方米的光伏电池阵列	将满足 300 千瓦能源消费需求并输出 51 万千瓦能量。	200000 新谢克尔
6	采用双冲水节水水箱替代旧式马桶水箱。	每年节省约 450 立方米的水	70000 新谢克尔
7	利用空调冷凝水补充国会的灌溉系统	每年为国会节约用于 20% 即 4000 立方米的灌溉用水	60000 新谢克尔
8	在能源中心安装为空调提供冷水的装置；利用水制冷装置释放的热量来加热水，以供日常使用。	降低国会天然气使用量的 50%	560000 新谢克尔
9	安装可根据室外热量调节制冷剂流量的空调。		10000 新谢克尔
10	使用节能的新空调替换 50 台旧式空调。		40000 新谢克尔
11	改善空调系统动态目标温度控制软件，以便将室外温度与希望达到的室内温度联系起来。		35000 新谢克尔
12	检测热泵的利用效率，并检验新的高效热泵的可靠性。		
13	节约用纸项目。试行在国会中使用的纸中 85% 是再生纸和测试使用更轻薄的 75 克纸。	每年将会为国会节约 4 万至 5 万张纸。	

资料来源：课题组根据以色列国会提供资料整理。

注：新谢克尔（new shekel）为以色列货币，2014 年 5 月 9 日时，一美元相当于 3.45 新谢克尔。

根据以色列“绿色国会”项目的初步预算，第一阶段投资 700 万新谢克尔，此后将以年均节约 150 万新谢克尔的方式收回，预计五年内全部收回。

以色列国会宣布 13 项资源节约举措的一个月以来，已成功实施了多项环保措施，包括员工环保意识培训，在停车场为员工与游客的电动车设置充电站，在委员会会议上使用水壶供水取代发矿泉水等。在此期间，该项目组还边干边增加环保的活动，如推动进一步地减少废物，推出绿色国会的游览路径，并将其与以色列自然保护协会鸟类研究站连通等。

沙姆博士应邀参加了以色列“绿色国会”项目的规划与实施。他的职务是以色列

“绿色国会”项目的协调员。据国会秘书长 Ronen Plot 介绍，沙姆博士不仅是以色列环境研究方面的专家，同时在绿色建筑与环保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建议笔者去沙姆博士家看一看。

二、沙姆博士的绿色住房

参观沙姆博士的住房是一种享受。从门前的绿地到屋后的草坪，从房子的采光到室内的温度，都感到非常的舒适。住房陈设并不豪华，家具并不高档，但可贵的是，采光、通风、用水充分都利用了大自然的恩赐，深深地体现着绿色与节能。

沙姆博士的住房仅有一层，但设计合理。一方面，利用坐北朝南的方位，面向南面的房间是卧房，而朝北的房间均是功能性住房，比如厨房和卫生间，而客厅则是南北通透。即便如此，还设计了南面的大落地窗，充分考虑了太阳照射的角度和方位，最大化地利用太阳光的照射发热作用，减少空调等电器的使用，从而实现了节能减排的目标。另一方面，沙姆博士有效利用窗户对开实现空气对流，运用室顶上的盒式天窗加大室内外空气的循环，必要时再通过风扇的作用，实现自然风的冷热循环，从而使得屋内温度在不用空调的情况下达到适度。

沙姆博士的住房非常重视复合外墙这种保温结构的使用，他向笔者展示了一种建筑材料，这种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墙体，一方面实现了保温、隔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提高了防火的能力，不仅减少了空调等制冷制热设备的使用，同时也实现了环境保护的目标。

屋外，笔者看到住房屋顶上铺满了太阳能光板，它满足了住房的用电需要。据介绍，它还可以将多余的电能进行储存并上传到电网，通过将这些电能卖给电力公司来获得相应的收益。这种做法，不正是现在欧洲大力倡导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分布式能源发电吗？当然，这不仅是住户一方的努力，还需要有网络式供电体系的配合，而这就涉及到电网体系的制度设计了。

在沙姆博士的带领下，笔者看到在屋旁有四个比人还高的大桶，通过管道连成一个体系。原来这是他自家的循环用水系统。这个系统联结着地下室的水管与另外的四大储水罐。此体系包括了水的收集、处理、分流和循环使用的几个部分。首先，该系统有效收集水，这里包括雨水和废水。随后，通过不同的带有净化设备的水罐，该系统有效处理雨水和废水，分离出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通过两根管道输出，其中的生活用水用于饮用和洗漱等，生产用水则用于灌溉农田、花园等。这一系统真正实现了雨水的加工储用和废水的循环利用，达到了节水的目标。为了节水，沙姆博士住房前后的花园和菜圃均采用滴灌技术。沙姆博士告诉我们，他自己储存并使用处理过的水，可基本保证他自

家的用水。在以色列这个严重缺水的沙漠中国家，节水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住房受惠于大自然，房子周边的环境更需要融合在大自然中，二者合一，才可称为绿色住宅。沙姆博士的住房前后均为花园与菜圃，面向南面的花园多种植树木，前面的花园中则种植了许多不同的有机植物。房前房后的植物种类均是精挑细选的，植物或混种，或自成小畦。前院多蔬菜，后院多树苗，这不仅为观赏，还按季提供食物。种植蔬菜时施用天然肥料，可谓无农药无化肥的绿色有机产品。笔者在家中所喝的第一杯水，就在把从花圃中现场采摘的薄荷叶略加处理，泡在开水中，清香爽口。沙姆博士还送上三、四种小果脯，均为他自家种植、自家制作的。

据沙姆博士介绍，他用了四年时间来设计、建造和完善这套住房，一步步提高住房的绿色化水平，合理布局、科学设计住房结构，最大范围地使用自然光、自然风，实现了绿色生活、生态小农业和节能高效的有机结合。在笔者眼前，这样一户普通的民居，真正成了天人合一的节能、节水的绿色建筑。听着沙姆博士介绍住房的设计理念、设计规划、设计内容，以及如何在整个以色列居民中推广绿色理念等，进而引起笔者对博士的经历与个人追求的很大兴趣，触发笔者对我国居民住宅绿色化的很多想法。

三、普及绿色理念与培养绿色人才

以色列因政治、经济与地理条件等多种因素，非常重视绿色人才的培养与绿色理念的普及。以色列“绿色国会”项目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按我们惯常的思维，以色列“绿色国会”项目作为绿色建筑的项目，重在“建筑”如何做，而不是设计与施工以外的人员如何想。但是，笔者被告知，以色列“绿色国会”项目的第一大举措是在国会员工中开展一系列绿色培训班，开办“绿色国会”宣传与培训。在项目启动后的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国会完成了第一轮的培训与宣传工作。国会全体员工参加了 6 次强制性培训课程。第一轮培训由 Ronen Plot 国会秘书长及四位议员主持开展工作。以色列国会议长 Yuli Edelstein 在以色列“绿色国会”项目启动仪式上对全体员工讲到《旧约》－《传道书》7:13:1 上说：当上帝创造第一个人的时候，上帝向他展示伊甸园里的每一棵树，并告诉他：“看这些树木是多么的完美和美妙。这些都是我为你创造的，因此要格外谨慎，不要伤害它们，不要摧毁我的世界。因为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没有人能够挽回你所摧毁的一切”。借宗教的力量提升全体员工的环保生态意识，对笔者来讲还是一种比较新鲜的感受。在第一轮的培训中，要求国会员工对环境、社会与经济进行多维思考，增强其可持续发展意识；组织大家讨论了多种环保核心概念，以形成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认识；介绍“绿色国会”项目第一期的 13 个措施，请员工

们全面地配合；还具体推出若干可操作的环保措施，比如怎样管理绿色办公室，怎样确保将可回收饮料罐放在合适的地方，如何确保将废纸投向国会各处的废纸回收箱里。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项目培训组发给所有参训者一个专用水杯，旨在减少员工对一次性水杯的使用。同时决定，将在国会委员会听证会及各项活动中使用水壶饮水，以改变当前在委员会听证会上摆放矿泉水的行动，这是因为每年国会要耗费 6 万瓶矿泉水，花费 50 万以色列新谢克尔。使用水壶饮水将大幅度地节省开支，更重要的是可减少 30 立方米的塑料废物。

看得出来，“绿色国会”项目不仅是在国会内部倡导绿色理念，更重要的是为社会带头推行绿色理念。国会举办了由议员、国会员工和志愿者参与的宣传论坛，其目的是向社会各界展示该项目。国会通讯与公共关系部通过各式媒体向公众大力宣传“绿色国会”项目，国会官网的分网站使用英语和希伯来语强化“绿色国会”项目的宣传，还开通专用博客与公众交换意见来推动“绿色国会”项目的落实。

显然，上述的所有举措，旨在普及绿色理念，培养绿色人才。而站在笔者面前的这位朴实的博士，正是这样的专家，是推行绿色建筑必须依靠的专业人才。换言之，正是基于沙姆博士的专业背景和建造绿色住宅的成功之举，他才被选调为“绿色国会”项目的专职协调员。

沙姆博士毕业于特拉维夫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专业是植物学学科中的微生物学方向，这显然是理工科领域，他的理学硕士论文题目是《以色列内盖夫沙漠白草蒿附近的植物性毒素微生物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上世纪 90 年代，沙姆博士为生命科学院大三学生讲授“生态学概论”课程；并在特拉维夫大学植物园做顾问，为社会上的人士包括高中生、大学生以及讲英语的群体，讲授和指导生态保护和植物学问题，如“椰枣树叶对啮齿类动物繁殖的影响”“玫瑰移植疾病”“植物性毒素细菌和根围的相互影响及其对内盖夫沙漠异株克生现象可能产生的作用”“以色列和海外的杀虫剂使用政策”等。这一时期，沙姆博士已积极参与社会工作和环保活动，比如，曾担任特拉维夫大学学生会主席，以及以色列各大学青年学术联盟组织的发言人，担任以色列环保协会杀虫剂使用政策研究的项目经理，兼任环保杂志《绿色、蓝色和白色》的编辑。

在 21 世纪初的 10 年里，沙姆博士更积极从事环保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参加多种社会活动。他在拉马干市巴伊兰大学（Bar - Ilan University）攻读哲学博士，担任巴依兰大学的学生会主席。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环境、社会 and 经济学问题》。他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通过学科交叉来研究环境问题，正是笔者现在特别强调的。他还担任以色列网络环境论坛和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联盟的领导者，担任与以色列国会环境社会部门

交流和协调的负责人。正因为长期致力于以色列绿色建筑项目的设计、实施和推广工作，2014 年沙姆博士被以色列国会聘为以色列“绿色国会”项目的协调员。

沙姆博士还参与很多国际性会议与活动，如代表以色列非政府组织参加过在北京、越南、奥地利各国举办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谈判，参加国际微生物生态学西班牙座谈会，参与以色列以及海外的非政府组织工作和以色列相关国际会议的组织，参加在乌克兰举办的国际科技会议等等。

四、以色列之行的启示

以色列之行虽然时间很短，考察绿色经济与科技的时间更有限，但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提供了很多的启示。

（一）在推行绿色经济与绿色消费过程中，国家机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正契合了中国一句民谚：“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

作为最高的立法机构，以色列国会把完善自身的绿色建筑与绿色消费列入行动计划，从议长到议员，从秘书长到员工，周密规划，认真实施。不论是聘请专家，还是设计工作步骤与阶段，均非常负责与高效。在一个月时间里，他们在国会地下停车场为电动汽车安装了双充电站；对太阳能光伏阵列进行公开招标并进入最后签署，进入一年期工程的准备阶段；实施了安装双冲水马桶和更换空调的工作；在业务部门开展了电脑自动断电和使用再生打印纸的试点项目；在国会的政府楼层安装了两条 LED 照明灯，并更换了 11 间房间的灯泡……以色列的国家机构以实际行动率先带头进行环境保护，若从理论上解释，那正契合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国家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即不是把民众当成管理对象，而是与民共治来建设美丽国家。

（二）把宣传与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放在首位

国家机构干得好，还需要带动全民共同干得好，这才是真正的好。干出样子，还要吹响进军的号子。如何能带动全体民众呢？这就需要做好宣传与教育工作，动员与支持民众广泛自觉地参与绿色活动。为此，国会有三方面的举措：一是在理论上打动人心，不仅请专家学者做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还借助宗教道义教导人们不仅要善待同胞，也要善待自然；二是在项目设计上突出了艺术之美，如请著名的建筑风景画家设计国会花园来吸引民众；三是在组织上实行开放式管理，借助媒体、网站和博客欢迎公众参与项目，还为各类游客推出“绿色国会之旅”和“国会足迹”活动，“绿色国会”项目与国会观光结合起来，以增强以色列人民的环保意识；与以色列自然保护协会合作，举办绿

色培训班，把国会变成一座教学楼……总之，以色列国会将自身定位为环保领域的创新领导者，带领全民共建绿色国家。

（三）建设绿色国家要以绿色产业为基础

以色列的绿色产业闻名世界。笔者在绿色国会的 13 个项目中，在沙姆博士住房的建材上，都看到了相关产业提供的绿色产品。其中，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以色列科技在农业中的运用。以色列不断发挥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有机结合，发明了滴灌技术，广泛被世界各国借鉴运用。考察中，笔者看到这种技术在以色列广泛地使用，不管你是在国会的花园还是在街边的花丛中，都似乎感受到水滴入土壤的情形。滴灌技术的发明对于以色列这样一个干旱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对于传统的漫灌技术而言，滴灌技术实现了既节约用水又精准灌溉的双重目标。笔者在前往参观世界著名的“死海”途中，看到被沙漠包围的一片片的椰枣林和草地，那是闻名全球的以色列滴灌技术的结晶。与农业紧密相关的是，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绿色水利业，是发展绿色经济的核心，是支撑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基。我国是一个缺水严重的国家。人均淡水资源只有 2300 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4、美国的 1/5，在世界上名列第 121 位，是全球 13 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因此，保护和高效利用水资源对中国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以色列的节水科技与制度对我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笔者进一步要强调的是，绿色产业发展又是以绿色人才为根本的。笔者从沙姆博士身上看到，以色列是如何从文理结合的角度、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来培养绿色产业方面的专家的。产业发达归根到底是教育的高水平。当人们听到占世界人口比例仅千分之三的犹太人，在诺贝尔奖获奖群星中，占有 22% 的超高比例，那就会明白，为什么一个沙漠国家有信心提出在全球率先建成绿色国家。

（四）绿色建筑构成绿色产业与绿色消费中的关键部分

本次考察的重点是绿色建筑。建筑行业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对气候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均将建筑行业的绿色化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绿色建筑要以绿色、循环、低碳、节能、环保理念为指导，探索新能源、材料、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充分发挥科技优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才能建立健全绿色建筑质量保障体系，而这与人们的绿色消费理念又紧密相关。绿色建筑行业已经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并成为了连接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纽带。从此视角可以理解绿色建筑的重要地位，感受到发展绿色建筑业的重要性。居民要求自住房的绿色化，本身就反映了消费方式的绿色化。正如沙姆博士设计自住房体现出来的节能节水意识，代表着一个民族绿色消费理念的形成。我国也越来越重视绿色建筑的发展。2013 年 1 月，我国国务院办公厅

转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订的《绿色建筑行动方案》（简称《行动方案》）。该《行动方案》指明了开展绿色建筑行动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基本原则、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等内容，要求切实抓好新建建筑的节能工作，大力推进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开展城镇供热系统改造，推进可再生能源建筑的规模化应用，加强公共建筑的节能管理，加快绿色建筑相关技术的研发推广。2014 年 3 月，我国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也明确要求实施绿色建筑行动计划。通过以上我国及以色列绿色建筑比较及以色列经验的借鉴，将为我国开展绿色建筑行动提供有益的经验与技术。

五、结束语

此次以色列绿色建筑考察有太多的感受。不论是耶路撒冷老城大卫古堡和圣殿山，还是在特拉维夫风景如画的雅法古城；不论是城乡建筑的实用简朴，还是在垃圾处理场基础上改造而成的生态园；不论是回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伯来大学奥曼教授，还是在以色列外交部做关于“中国与人类绿色发展指数”的演讲与交流……笔者处处感受到以色列人民伟大的创造力，感受到以色列人民对中国人民特殊的友好感情，感受到沙漠绿舟的迷人魅力。

责任编辑：黄启云

“三创”改变中国

高尚全

摘要：所谓“三创”，就是“创业、创新、创牌”。其中，创业是基础，创新是关键，创牌是目标。创业、创新、创牌可以改变企业，可以改变中国。创业、创新、创牌是市场的行为，但是政府要为创业、创新、创牌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司法环境。

关键词：创业 创新 创牌

作者简介：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一、创业是基础，创新是关键，创牌是目标

多年来，我一直提倡要发扬“三创”精神。什么是“三创”呢？就是“创业、创新、创牌”。三者是什么关系？创业是基础，创新是关键，创牌是目标。创业、创新、创牌可以改变企业，可以改变中国。

创业是创新和创牌的基础，没有创业，创新和创牌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创业者敢想敢闯敢干的精神都是民族宝贵的财富。创业者成功的收益是创业者和社会共享的，但创业失败的代价却是由创业者自己独自承担。正是有了创业者前赴后继的投入和拼搏，市场才有了源源不断的创造财富的机会，英雄才能有用武之

地。无数的创业者用自己的努力构筑了整个国家发展的基础。

创新是一场革命，也是发展和成功的关键。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残酷激烈，九死一生的创业者能不能生存下来、发展壮大，关键要看能不能通过创新获得市场的认可、取得市场竞争的优势。创新有着多重的方向，可以有技术创新、服务创新、管理创新等等。创新要经过市场的检验，任何一种行之有效创新都是创业者聪明才智的体现，是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推动力，更是创业者取得成功的关键。

品牌是企业成功的标志，创牌是企业努力的目标。众所周知，品牌可以极大地提升产品、服务的附加值，有品牌的产品和服务与无品牌的产品和服务之间的价格存在天壤之别。品牌能够带来巨大的财富，但塑造品牌需要长时间的投入，维护品牌需要永恒的操守。与此同时，具体产品和服务品牌还只是品牌的低级阶段，我们要建设的品牌中国，不仅仅是有形的物质产品的品牌，也不能止步于无形的服务品牌。我们要建设的品牌是要蕴含着创业、创新者的思想和精神的品牌，是创业者群体的人的品牌，是从创业、创新者的努力中诞生出来的文化品牌。这样的品牌追求蕴含在中国梦之中，我们不仅要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思想中国，在经济上还要建设品牌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刻地论述了“新常态”。如何适应新常态？主要是推动三个转变：一是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二是推动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三是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简言之就是提质增效创牌。品牌是提质增效的集中体现。创业、创新、创牌具有重大的意义。李克强总理在 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既可以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又有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公平正义。中国有 13 亿人口、9 亿劳动力资源，人民勤劳而智慧，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千千万万个市场细胞活跃起来，必将汇聚成发展的巨大动能，一定能够顶住经济下行压力，让中国经济始终充满勃勃生机。政府要勇于自我革命，给市场和社会留足空间，为公平竞争搭好舞台。个人和企业要勇于创新创业，全社会要厚植创新创业文化，让人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更好地实现精神追求和自身价值。”

二、增强创新能力，是“三创”的关键

如何搞好“三创”？关键是增强创新能力。这里我想讲一下华为科技公司的创业、创新、创牌的故事。为了改革的需要，我从 1997 年开始关注、研究华为的案例。我在 1997 年参加中央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时，有人向中央写信说，华为科技公司姓“资”不姓“社”。主要理由是，华为公司是非公有制企业，而且搞了职工持股，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这是改革中必须弄清的重大问题，为此，我主动要求到深圳实地调研。时任中共深

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他说，“我陪你一起去作调研”。经我们调研获悉，华为公司 1987 年成立于深圳时，创始人任正非只有 2.1 万人民币，20 多年来经过不断创新、创牌，华为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民营高科技企业、立足于世界的领先企业。虽然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但她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税收和财富，解决了十几万人的就业，职工分享了改革发展成果。这样好的企业，应该作为改革的典型。它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后来，在十五大报告写上了：“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

现在，华为公司已成为世界 500 强企业中排名第 285 的知名企业，世界最大的品牌咨询公司 Interbrand 最近发布的“最佳全球品牌”排行榜，华为成为首次上榜的中国品牌，排名第 94 位。2014 年华为销售收入达 460 亿美元，已成为全球第一大通讯设备供应商。华为公司为什么能成为世界通讯设备产业的领先企业？为什么华为能成为“最佳全球品牌企业”？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有什么启示？

一是华为是在改革中发展成长起来的，改革开放为华为创造了宽松的体制环境，改革开放使华为有了比较充分的自主决策权，所以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去拼搏，在竞争中知道了什么是世界先进，在竞争中学会了竞争的规则，在竞争中学会了如何赢得胜利。创始人任正非从开始一个人创业发展到 15 万人共同创业，坚持了“以奋斗者为本”的理念，这就为华为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华为领军人任正非认为，华为有今天是因为“15 万员工，以及客户的宽容和牵引”，而他不过是“用利益分享的方式，将他们的才智粘合起来”。

二是华为实行了员工和客户利益分享制度，激发员工和客户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华为 98.9% 的股份为员工所有，而创始人任正非只占 1.01% 的股份。华为树立了以客户为中心的观念，把与客户的关系从过去的甲乙双方关系上升到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把客户的满意度作为衡量华为一切工作的准绳。实行员工和客户利益分享机制，形成了“生命共同体”，就是把企业的发展和员工和客户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创造了无穷的潜力，使华为成为世界领先的企业。华为这样的企业到底算什么所有制的企业？按过去传统的理论，国家和集体投入的企业是公有制企业。国家和集体虽然没有投入一分钱，但华为靠 15 万人这样一个群体创业、创新、创牌而发展起来的、共同奋斗、共享成果的企业是名副其实的新型集体企业。按照十五大报告所说，是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的新型集体经济，这样的企业尤其要提倡和鼓励。

三是华为的创新驱动和巨额的高科技投入，是成为世界领先企业的重要因素。华为的激励机制，引发了企业创新的内在动力。华为每年将销售收入的 10% 以上投入研究，在

15 万员工中超过 48% 的员工从事创新研究与开发。华为在 170 多个标准组织和开源组织中担任核心职位，截至 2013 年末，已累计获得专利授权 36511 件。华为对电信基础网络、云数据中心和智能终端等领域持续进行研发投入，以客户需求和前沿技术驱动的创新使公司处于行业前沿，引领行业的发展。2014 年，华为在汤普森路透集团评选的“全球百大创新机构”中位列第 41 位，是中国大陆唯一的上榜企业。

四是华为以奋斗、专业的精神创造了以服务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品牌。华为领导人认为，一个高新技术企业，不能没有文化，只有文化才能支撑她持续发展。在任正非的领导下，华为十几万奋斗着的专注于各个技术领域的专家式员工共同造就了华为谦虚、诚信、专业的企业品牌，“华为”早已不仅仅是华为公司所推出的优秀产品的品牌，更是一种企业精神、企业文化的品牌、一个优秀的创业者集体的品牌。

五是华为着眼于国际视野和国际战略。华为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占到总销售的 70% 以上，华为的电信网络设备、IT 设备和解决方案以及智能终端已应用于全球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全球 30 亿以上的人口。华为已成为中国“走出去”的典范。

2014 年度，华为完成销售收入 2890 亿元人民币，实现利润总额 320 亿元人民币，向国家缴纳的税收 330 亿元人民币，就业员工达 15 万人，间接带动就业 300 万人以上。如果全国有一百个华为这样的企业，不仅可以大大改变中国企业的面貌，而且可以为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作出重要贡献！

三、政府和创新过程中要发挥更好的作用

创业、创新、创牌虽然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是市场的行为，但是政府要为创业、创新、创牌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司法环境。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答记者问时指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是一个改革”。他还具体提到了“简政放权、商事制度改革”对市场的激发促进作用。政府通过清障放权换来市场的活力，用减法换取乘法。他十分明确地指出，“市场活力的激发需要政府去清障搭台”。

“三创”是跟调结构等一系列重要的改革议题密切相关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提到，2014 年度“着力培育新的增长点，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支持发展移动互联网、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电子商务、物流快递等新业态快速成长，众多“创客”脱颖而出，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同时，继续化解过剩产能，钢铁、水泥等 15 个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年度任务如期完成”。由此可见，创业、创新、创牌对国家、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政府必须予以鼓励和支持。

在“三创”过程中，从更广泛的“政府”的角度来讲，还需要提供良好的司法环境。因为创新、创牌的基础是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创业的基础是能够剔除不正当的垄断和市场竞争，这都需要一个公正的司法体系的保障。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基于网络的各种创新层出不穷，但是也带来了对专利保护的挑战。如果没有有效的专利保障，一些已经成长起来的大型网络企业利用其海量用户和资金优势很可能把市场上所有刚刚崭露头角的创新、创意都迅速抄袭抢占，这就扼杀了创新的动力。在此情况下，《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互联网创新领域的适用就显得极为重要，对专利保护争议的专业处断也成为重要议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和《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为创业、创新、创牌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李克强总理指出，国家的繁荣在于人民创造力的发挥，经济的活力也来自就业、创业和消费的多样性。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在创业、创新、创牌的浪潮中，政府可以而且应当为创造财富的主体提供最理想的环境。但是，政府要创造适宜“三创”的环境，还需要政府本身运作模式和管理方式的创新，简单地说，就是要创新政府。以中央重要报告的起草为例，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我曾经向中央建议，应当改变过去关门写文件的作法，利用网络手段向全国人民征求关于党政重要文件的起草意见。今年两会前的政府工作报告起草过程与我的建议内容非常一致，会议通过中国政府网、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国网、新浪网、腾讯网等网站，发起“2015政府工作报告我来写——我为政府工作献一策”活动，公开征集社会各界对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建议，征得四万多条意见，其中有914条建议和意见被采纳，使民意充分地表达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三创”可以改变中国，它不仅能够帮助中国经济顺利实现转型升级，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还能够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的现代化，为中国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责任编辑：刘英奎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5 年 4 月以来，国际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和判断。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全球经济保持温和增长，但主要经济体增长前景不均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 月 14 日发布了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预测，2015 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为 3.5%，与其今年 1 月的预测持平，2016 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进一步升至 3.8%，较今年 1 月的预测上调了 0.1 个百分点。尽管全球经济增长保持温和，但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增长前景不均衡。相比去年，发达经济体的前景在改善，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预计将放缓。实际上，IMF 已连续 5 年下调了对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的预期。新兴市场面临的增长前景，主要源自一些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前景减弱，以及油价急剧下跌导致一些主要石油出口国的经济活动减弱。

报告认为，尽管发达经济体预期增长加快，新兴市场增长放缓，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 2015 年全球增长中所占比重仍将超过 70%。印度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率则均将达到 7.5%，较 1 月份的预测分别上调了 1.2 个和 1.0 个百分点，而这则主要得益于印度实施的系列改革、投资的增长以及油价的下跌。

除了上述国家外，IMF 还指出，在巴西，干旱、宏观经济政策收紧以及私人部门情绪低落影响了经济前景。俄罗斯的增长预测则反映了油价急剧下跌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造成的经济影响。对于其他新兴市场商品出口国，石油和其他商品价格下跌也对贸易条件和实际收入的影响预计将损害中期增长。

在新兴市场增速放缓的背景下，2015 年全球经济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发达经济体的增

长，而发达经济体则普遍从油价下跌中受益。与此同时，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继续引领了全球经济的增长。报告指出，美国在 2014 年后 3 季度经济平均增长了 4%，预计 2015 年，美国经济将继续强劲复苏，包括能源价格持续下降、通胀温和、财政政策宽松以及房地产市场趋好在内的经济刺激条件将继续存在，但强美元对美国本土出口的冲击依旧存在。IMF 据此将美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率均设为 3.1%，但较今年 1 月的预测分别下调了 0.5 个和 0.2 个百分点。

报告称，欧元区在过去一年中保持了复苏趋势，低油价、低利率、欧元贬值以及适中的财政政策将继续带动该区域 2015 年的经济活动，IMF 据此预测，欧元区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为 1.5% 和 1.6%，较今年 1 月的预测分别上调了 0.3 个和 0.2 个百分点。其中，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表现均好于此前的预期。

报告也对日本经济进行了评估，称去年 4 月消费税上调之后的经济表现并不尽如人意，甚至造成了比预期更严重的消费紧缩。但随着日元走势疲弱、日本国民实际工资提高、股价上升、日本央行额外的量化宽松，以及原油和商品价格下降等因素的影响，日本经济也在逐渐好转。IMF 预计，日本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1.0% 和 1.2%，均较 1 月的预测上调了 0.4 个百分点。

（二）全球金融风险正在发生三大转向

IMF 4 月 15 日发布最新半年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且不均衡，各国货币政策分化，导致金融风险加剧。IMF 研究团队认为，当前金融风险正呈轮转式蔓延，从银行转移到影子银行，从偿付风险转为市场流动性风险，从影响发达经济体转向影响新兴市场。《报告》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新兴市场金融风险进行了分析。首先，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和通胀压力减轻给许多新兴经济体带来好处，但石油和大宗商品出口国以及重度举债的市场部门面临着严重的风险。同时，美元大幅升值给背负高额外债的公司和国家带来额外风险。其次，投资过度部门的收缩、房地产部门的调整以及房地产价格的下滑可能在更广范围内对其他新兴市场产生溢出效应。据悉，企业健康状况突然恶化对银行体系稳定的更广泛影响取决于信贷风险程度。再次，美元进一步迅速升值和美国突然加息以及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可能对新兴市场货币和资产市场施加更多的压力。在经历长时期的资本流入之后，外国投资者可能突然减持对这些新兴市场的本币债务，从而加剧市场动荡并构成债务展期挑战。在地缘政治风险方面，IMF 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中东以及非洲部分地区正在发生的事件可能导致紧张局势加剧，并进一步破坏全球贸易和金融交易。

随着危机加剧且转到金融系统的其他部门，IMF 金融顾问兼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维纳尔斯表示，除货币政策外，还需要采取其他政策措施。《报告》认为，新兴市场应致力于缓解全球不利走势的影响，并通过加强对脆弱部门的监督来维护其金融体系的抗冲击能力。更广泛而言，在新兴市场，采取微观和宏观审慎措施能够加强金融抗冲击能力。监管部门有必要对银行开展关于外币和大宗商品价格风险的压力测试，更密切地监督公司的杠杆情况和未对冲外币敞口，包括衍生工具头寸。此外，为确保市场正常运作，新兴市场当局需要做好准备，应对本币债券市场流动性下降。在必要时可以使用现金余额，或者减少市场长期债券供应，以帮助遏制债券利差的扩大。

（三）全球经济温和复苏，但增长出现分化

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4 月 16 日—17 日举行，主要讨论了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投资与基础设施、IMF 改革、金融监管以及国际税收合作等议题，并发表了联合公报。会议认为，当前全球经济温和复苏，但增长出现分化。虽然低油价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但汇率波动、长期低通胀、持续内外部失衡、公共债务居高不下和地缘政治紧张等风险仍将给全球经济带来重大挑战。在此背景下，G20 应在提振信心、降低经济脆弱性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实施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扩大需求并促进潜在增长。会议承诺继续落实 G20 全面增长战略，并加强对关键政策承诺落实情况的监督，以确保实现 G20 共同增长目标。会议强调了促进投资对拉动增长的重要性，同意制定具体的国别投资战略。该战略将包括改善投资环境、促进有效基础设施投资，以及为中小企业提供长期融资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四）全球经济持续复苏

IMF 与世界银行 2015 年春季会议于 4 月 17 日—19 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机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 18 日表示，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但依然“温和”和“不均”，敦促各国采取措施促进全球经济更加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

第 31 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部长级会议 18 日在华盛顿召开。会后发表的公报表示，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但经济增长潜力可能出现下降趋势，这在中期看来将成为更加关乎利益的挑战。另外，发达经济体整体形势走强，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有所放缓。尽管全球经济不平衡的状况相较于前几年已有所改善，但仍然需要采取进一步的经济再平衡措施。

IMF 警告称，目前全球经济面临汇率波动和地缘政治紧张等风险。另外，尽管油价低迷将利好全球经济，但对不同的国家影响不同，尤其是一些新兴经济体已受到大宗商

品价格走低和出口下滑的冲击。另一方面，许多发达国家则面临着低通胀风险，必要时还需继续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IMF 还警告称，随着美国加息趋势渐明，在“政策正常化”过程中也应加强有效沟通，以减少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世界银行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估

世界银行 4 月 13 日下调对东亚和太平洋发展中地区及中国 2015 年经济增长预测。世界银行预计，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和太平洋发展中地区经济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分别增长 6.7%，低于 2014 年的增长 6.9%，也分别比去年 10 月预测值低 0.2 个和 0.1 个百分点。世界银行在东亚与太平洋经济最新报告中称，中国正推行旨在令经济增长更加可持续、且能提高金融抗冲击能力的政策，因此经济增长有可能放缓。世界银行表示，中国经济 2015 年增长率或将从上年度的 7.4% 放慢至 7.1%，2016 年继续减速至 7.0%。该行此前对今明两年的增长预估分别为 7.2% 和 7.1%。

（二）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 6.8% 和 6.3%

IMF 4 月 14 日发布了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 6.8% 和 6.3%，与今年 1 月的预测相同。IMF 认为，中国经济下滑主要是由于房地产、信贷和投资在过去一年中并无太大起色，因此中国政府未来将更加重视减轻信贷，并降低对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依赖。IMF 研究部副主管吉安玛丽亚·米莱西－费雷蒂表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将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经济放缓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件好事。中国经济目前正在经历一场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模式将更加平衡，不再单纯依赖投资，而逐渐向扩大内需转变。

米莱西－费雷蒂表示，IMF 的基本判断是，依靠政府投资所产生的经济增长要少于投入本身，并不划算。中国进行的结构性改革从短期来看确实会对增长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种改革在长期来看是积极的，中国的经济结构将会更加平衡。

（三）2015 年中国 GDP 将增长 6.8%

评级机构惠誉亚太区主权评级主管 Andrew Colquhoun 4 月 15 日表示，中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 7%，符合惠誉预期，因自 2014 年中开始的融资总量增长乏力。预计中国今明两年实际 GDP 将分别增长 6.8% 和 6.5%。较慢的增长不应被视为坏消息，这意味着经济正在调整到一个更可持续的路径上。但这种调整仍需要来自消费的支持，因经济需适应投资减速。他同时指出，经济已变得更加依赖通过建筑业和房地

产业来创造就业，而正在进行的房地产业调整被惠誉视作未来的最大单一风险。报告最后称，中国 3 月份外汇储备进一步下跌，预计货币政策还将进一步松动。

（四）日本政府下调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判断

日本政府 4 月 20 日在发布的 4 月份的月度经济报告中，时隔 11 个月下调了对中国的景气的现状判断。其理由是中国经济减速越来越明显。关于中国景气，截至 3 月份的报告使用“增长速度正在放缓”一词，本次则加了“进一步”的修饰语。其理由是中国的消费、生产、出口及投资等主要项目的增速均有所放慢。关于前景则维持“持续缓慢增长趋势”的表述，但对中国的经济下行提高了警惕。日本的出口额当中，对中国出口占近 20%，对亚洲地区则占 50%。如果中国的消费和生产削弱，亚洲周边国家的经济也会下滑。如果亚洲经济进一步减速，借助日元贬值得以恢复的日本出口可能会再次陷入停滞。

责任编辑：刘英奎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2013 年—2016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 年 4 月)				
世 界	3.4	3.4	3.5	3.8
发达国家	1.4	1.8	2.4	2.4
美 国	2.2	2.4	3.1	3.1
欧元区	-0.5	0.9	1.5	1.6
日 本	1.6	0.0	1.0	1.2
发展中国家	5.0	4.6	4.3	4.7
印 度	6.9	7.4	7.5	7.5
俄罗斯	1.3	0.6	-3.8	-1.1
巴 西	2.7	0.1	-1.0	1.0

世界银行(2015 年 1 月)

世 界	2.5	2.6	3.0	3.3
发达国家	1.4	1.8	2.2	2.4
发展中国家	4.9	4.4	4.8	5.3

英国共识公司(2015 年 5 月)

世 界	2.4	2.7	2.7	3.1
美 国	2.2	2.4	2.5	2.8
欧元区	-0.5	0.9	1.5	1.8
日 本	1.6	0.0	0.9	1.7
印 度	6.9	7.4	7.8	8.1

注: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
2. 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2013 年、2014 年数据为印度官方大幅上修后数据,而 2015 年及 2016 年数据系参照官方修订后数据的预测结果。
3. 各国 2013 年、2014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作了调整。

表 2 2013 年—2016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世 界	3.5	3.4	3.7	4.7
进口				
发达国家	2.1	3.3	3.3	4.3
发展中国家	5.5	3.7	3.5	5.5
出口				
发达国家	3.1	3.3	3.2	4.1
发展中国家	4.6	3.4	5.3	5.7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5 年 4 月预测。

表 3 2013 年—2016 年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 年 4 月)				
发达国家	1.4	1.4	0.4	1.4
发展中国家	5.9	5.1	5.4	4.8
英国共识公司(2015 年 5 月)				
世 界	2.8	3.0	2.6	3.1
美 国	1.5	1.6	0.2	2.2
欧元区	1.4	0.4	0.1	1.2
日 本	0.4	2.7	0.6	1.0

注:1. 印度来源于英国共识公司的数据指财政年度。2. 各国 2013 年、2014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作了调整。

表 4 2014 年 4 月—2015 年 4 月消费者价格同比
上涨率(上年 = 100) 单位: %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4 年		3.6	1.7	7.8
	4 月	3.7	2.0	7.5
	5 月	3.9	2.0	7.9
	6 月	3.8	2.0	7.7
	7 月	3.8	1.8	7.9
	8 月	3.8	1.7	8.0
	9 月	3.7	1.7	7.8
	10 月	3.7	1.7	7.7
	11 月	3.5	1.5	7.7
	12 月	3.5	1.2	8.2
2015 年	1 月	3.1	0.9	7.7
	2 月	3.2	1.0	7.9
	3 月	3.3	1.1	7.8
	4 月	3.0	0.8	7.6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2014 年 4 月—2015 年 4 月工业生产相关指数 单位: %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4 年		3.2	2.7	5.2			
	4 月	3.8	2.9	4.7	51.9	52.9	52.6
	5 月	3.8	2.2	5.5	52.1	53.5	53.1
	6 月	3.2	2.3	5.3	52.6	54.0	54.1
	7 月	3.8	2.4	5.0	52.4	53.8	53.9
	8 月	2.5	1.3	4.8	52.5	53.7	53.8
	9 月	3.1	1.8	5.9	52.2	53.2	52.9
	10 月	3.1	1.8	5.1	52.2	53.0	52.8
	11 月	3.1	1.4	5.1	51.8	52.3	52.3
	12 月	3.7	2.0	5.3	51.5	52.0	52.0
2015 年	1 月	2.5	1.8	4.3	51.7	52.9	52.3
	2 月	2.5	1.4	4.1	51.9	53.2	52.2
	3 月	2.5	1.2	3.9	51.7	53.3	52.1
	4 月				51.0	51.7	51.1

注:1. 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 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Markit 公司。

二、美国经济

表 6 2012 年—2015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2 年		2.3	1.8	-1.4
2013 年		2.2	2.4	-2.0
	1 季度	2.7	3.6	-3.9
	2 季度	1.8	1.8	0.2
	3 季度	4.5	2.0	0.2
	4 季度	3.5	3.7	-3.8
2014 年		2.4	2.5	-0.2
	1 季度	-2.1	1.2	-0.8
	2 季度	4.6	2.5	1.7
	3 季度	5.0	3.2	4.4
	4 季度	2.2	4.4	-1.9
2015 年				
	1 季度	0.2	1.9	-0.8

表 7 2012 年—2015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8.3	3.3	2.3
2013 年		4.7	3.0	1.1
	1 季度	2.7	-0.8	-0.3
	2 季度	4.9	6.3	8.5
	3 季度	6.6	5.1	0.6
	4 季度	6.3	10.0	1.3
2014 年		5.3	3.2	4.0
	1 季度	0.2	-9.2	2.2
	2 季度	9.5	11.1	11.3
	3 季度	7.7	4.5	-0.9
	4 季度	4.5	4.5	10.4
2015 年				
	1 季度	-2.5	-7.2	1.8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2012 年—2015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2 年		2.3	1.8	-1.4
2013 年		2.2	2.4	-2.0
	1 季度	1.7	2.2	-2.0
	2 季度	1.8	2.3	-1.8
	3 季度	2.3	2.3	-2.4
	4 季度	3.1	2.8	-1.9
2014 年		2.4	2.5	-0.2
	1 季度	1.9	2.2	-1.1
	2 季度	2.6	2.4	-0.7
	3 季度	2.7	2.7	0.3
	4 季度	2.4	2.9	0.8
2015 年				
	1 季度	3.0	3.0	0.8

表 9 2012 年—2015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8.3	3.3	2.3
2013 年		4.7	3.0	1.1
	1 季度	4.2	1.9	-0.1
	2 季度	4.3	2.2	1.0
	3 季度	5.2	3.0	1.2
	4 季度	5.1	5.1	2.5
2014 年		5.3	3.2	4.0
	1 季度	4.5	2.8	3.1
	2 季度	5.6	3.9	3.8
	3 季度	5.9	3.8	3.4
	4 季度	5.4	2.4	5.6
2015 年				
	1 季度	4.7	3.0	5.5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表 10 2014 年 4 月—2015 年 4 月劳动力市场
相关指数 单位: %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增长率		失业 率	非农雇员 人数环比 增加 (万人)
		环比 折年率	同比		
2014 年			0.8	6.2	264.9
	4 月			6.2	33.0
	5 月			6.3	23.6
	6 月	2.9	1.1	6.1	28.6
	7 月			6.2	24.9
	8 月			6.1	21.3
	9 月	3.9	1.2	5.9	25.0
	10 月			5.7	22.1
	11 月			5.8	42.3
	12 月	-2.2	-0.1	5.6	32.9
2015 年					
	1 月			5.7	20.1
	2 月			5.5	26.4
	3 月			5.5	12.6
	4 月			5.4	22.3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 11 2014 年 3 月—2015 年 3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月份							
2014 年	23445.3		2.8	28492.4		3.4	-5047.1
3 月	1942.1	3.3	3.9	2370.0	3.1	5.9	-427.8
4 月	1945.9	0.2	3.6	2401.7	1.3	5.3	-455.8
5 月	1968.3	1.2	5.1	2400.6	0.0	3.5	-432.3
6 月	1959.7	-0.4	2.9	2373.8	-1.1	4.6	-414.1
7 月	1978.6	1.0	4.2	2385.1	0.5	4.0	-406.5
8 月	1985.9	0.4	4.2	2385.0	0.0	3.6	-399.2
9 月	1951.8	-1.7	2.6	2385.5	0.0	2.6	-433.7
10 月	1987.1	1.8	2.4	2406.1	0.9	3.2	-419.0
11 月	1967.9	-1.0	1.0	2363.2	-1.8	2.4	-395.3
12 月	1950.0	-0.9	1.1	2406.0	1.8	4.5	-456.0
2015 年							
1 月	1892.4	-3.0	-1.8	2319.2	-3.6	0.1	-426.8
2 月	1862.5	-1.6	-1.0	2216.9	-4.4	-3.6	-354.4
3 月	1878.4	0.9	-3.3	2392.0	7.7	0.9	-513.7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 12 2012 年—2014 年外国直接投资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2 年		1696.8	3113.5	-1416.7
	1 季度	292.5	1045.6	-753.0
	2 季度	523.1	704.1	-181.1
	3 季度	449.3	915.9	-466.7
	4 季度	432.0	447.8	-15.9
2013 年		2307.7	3283.4	-975.8
	1 季度	433.1	812.1	-379.1
	2 季度	604.6	1011.3	-406.8
	3 季度	559.9	914.2	-354.4
	4 季度	710.2	545.7	164.4
2014 年		924.0	3369.4	-2445.5
	1 季度	-1075.5	490.4	-1565.9
	2 季度	684.6	847.2	-162.6
	3 季度	853.3	976.5	-123.2
	4 季度	461.6	1055.3	-593.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2012 年—2015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2 年		-0.7	-1.4	-0.5
2013 年		-0.5	-0.7	0.2
	1 季度	-0.2	-0.2	0.2
	2 季度	0.3	0.2	0.0
	3 季度	0.1	0.2	0.3
	4 季度	0.3	0.1	-0.3
2014 年		0.9	1.0	0.7
	1 季度	0.3	0.2	0.2
	2 季度	0.1	0.2	0.2
	3 季度	0.2	0.5	0.2
	4 季度	0.3	0.4	0.2
2015 年				
	1 季度	0.4		

表 14 2012 年—2014 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4.1	2.5	-0.9
	1 季度	-1.1	0.8	0.0
	2 季度	-1.8	0.9	-0.2
	3 季度	-0.6	0.7	0.3
	4 季度	-1.3	-0.6	-0.9
2013 年		-3.0	1.3	0.1
	1 季度	-1.6	-0.8	-0.8
	2 季度	0.1	2.3	1.6
	3 季度	0.5	0.1	1.1
	4 季度	1.0	1.4	0.7
2014 年		0.9	3.7	3.8
	1 季度	0.4	0.4	0.6
	2 季度	-0.5	1.3	1.3
	3 季度	0.0	1.5	1.7
	4 季度	0.4	0.8	0.4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2014 年 3 月—2015 年 3 月劳动力市场相关指数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4 年			0.02		11.6
	3 月	0.10	0.90	26.6	11.7
	4 月				11.6
	5 月				11.6
	6 月	-0.3	0.23	49.0	11.6
	7 月				11.6
	8 月				11.5
	9 月	-0.06	0.08	35.0	11.5
	10 月				11.5
	11 月				11.5
	12 月	0.2	-0.01	19.7	11.4
2015 年					
	1 月				11.4
	2 月				11.3
	3 月				11.3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2012 年—2015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私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2 年		-0.7	-1.4	-0.5
2013 年		-0.5	-0.7	0.2
	1 季度	-1.2	-1.4	-0.2
	2 季度	-0.6	-0.7	0.0
	3 季度	-0.3	-0.4	0.6
	4 季度	0.5	0.2	0.2
2014 年		0.9	1.0	0.7
	1 季度	1.1	0.6	0.6
	2 季度	0.8	0.8	0.6
	3 季度	0.8	1.1	0.7
	4 季度	0.9	1.4	0.8
2015 年				
	1 季度	1.0		

表 17 2012 年—2014 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4.1	2.5	-0.9
	1 季度	-2.7	2.8	-0.7
	2 季度	-3.9	3.3	-0.8
	3 季度	-4.1	2.8	-1.0
	4 季度	-4.8	1.9	-0.8
2013 年		-3.0	1.3	0.1
	1 季度	-5.2	0.2	-1.7
	2 季度	-3.4	1.6	0.0
	3 季度	-2.4	1.0	0.9
	4 季度	0.0	3.0	2.6
2014 年		0.9	3.7	3.8
	1 季度	2.3	3.6	3.7
	2 季度	0.9	3.1	3.7
	3 季度	0.1	4.0	3.9
	4 季度	0.1	4.1	4.0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2014 年 3 月—2015 年 3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欧元

年份		环比	同比		环比	同比	出口额
	出口额	增长	增长	进口额	增长	增长	减进
月份		%	%		%	%	口额
2014 年	19391		2.3	17415		0.1	1976
3 月	1595	-1.0	-1.0	1447	-1.2	2.8	148
4 月	1600	0.3	-1.6	1448	0.1	-2.5	152
5 月	1612	0.8	0.3	1459	0.8	0.2	153
6 月	1603	-0.6	3.2	1470	0.7	3.2	133
7 月	1612	0.5	2.9	1476	0.4	0.9	136
8 月	1592	-1.2	-3.2	1442	-2.3	-4.1	150
9 月	1657	4.1	8.6	1476	2.3	4.2	181
10 月	1658	0.1	4.3	1461	-1.0	-0.1	197
11 月	1666	0.5	1.0	1458	-0.2	-1.8	208
12 月	1653	-0.8	8.3	1427	-2.1	1.4	226
2015 年							
1 月	1636	-1.0	-0.6	1425	-0.1	-5.8	211
2 月	1683	2.9	4.3	1457	2.3	-0.2	226
3 月	1711	1.7	10.9	1514	3.9	7.2	197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2014 年 3 月—2015 年 3 月外国直接投资相关指数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4 年		60	642.7	- 581.4
	3 月	- 386	- 240.3	- 146.2
	4 月	- 33	153.8	- 187.1
	5 月	258	151.5	106.5
	6 月	94	15.2	78.8
	7 月	15	34.1	- 18.7
	8 月	150	60.0	90.0
	9 月	111	410.0	- 299.0
	10 月	116	107.0	10.0
	11 月	- 115	170.0	- 285.0
	12 月	- 205	- 372.0	167.0
2015 年				
	1 月	77	136.0	- 59.0
	2 月	300	343.0	- 43.0
	3 月	233	- 216.0	449.0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8 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2012 年—2015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
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2 年		1.7	2.3	1.7
2013 年		1.6	2.1	1.9
	1 季度	1.4	1.2	0.8
	2 季度	0.7	0.9	0.6
	3 季度	0.5	0.3	- 0.1
2014 年	4 季度	- 0.3	- 0.2	0.1
		- 0.1	- 1.3	0.3
	1 季度	1.2	2.1	- 0.3
	2 季度	- 1.8	- 5.1	0.4
2015 年	3 季度	- 0.5	0.3	0.2
	4 季度	0.3	0.4	0.3
	1 季度	0.6	0.4	0.1

表 21 2012 年—2015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
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3.4	- 0.2	5.3
2013 年		3.2	1.5	3.1
	1 季度	0.6	4.0	1.1
	2 季度	2.3	3.0	2.4
	3 季度	2.3	- 0.4	1.8
2014 年	4 季度	1.2	0.1	3.1
		2.6	8.4	7.4
	1 季度	3.8	6.1	6.6
	2 季度	- 4.8	0.0	- 5.2
2015 年	3 季度	- 0.6	1.6	1.1
	4 季度	- 0.1	3.2	1.4
	1 季度	0.1	2.4	2.9

表 22 2012 年—2015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
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2 年		1.7	2.3	1.7
2013 年		1.6	2.1	1.9
	1 季度	0.5	1.9	1.5
	2 季度	1.4	1.9	2.6
	3 季度	2.2	2.3	2.0
2014 年	4 季度	2.3	2.3	1.5
		- 0.1	- 1.3	0.3
	1 季度	2.4	3.4	0.2
	2 季度	- 0.4	- 2.9	0.1
2015 年	3 季度	- 1.4	- 3.1	0.3
	4 季度	- 0.9	- 2.4	0.6
	1 季度	- 1.4	- 4.1	0.9

表 23 2012 年—2015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
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2 年		3.4	- 0.2	5.3
2013 年		3.2	1.5	3.1
	1 季度	- 0.3	- 3.4	0.0
	2 季度	1.4	- 0.1	0.5
	3 季度	4.6	3.1	2.9
2014 年	4 季度	7.2	6.8	8.9
		2.6	8.2	7.2
	1 季度	9.9	9.2	14.7
	2 季度	2.2	5.4	5.8
2015 年	3 季度	- 0.5	7.5	5.1
	4 季度	- 1.7	10.9	3.8
	1 季度	- 5.1	7.4	0.0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20~表 23)。

表 24 2014 年 3 月—2015 年 3 月劳动力市场相关指数
单位:%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4 年		1.8	1.66	3.6
	3 月	6.2	1.64	3.6
	4 月	4.9	1.64	3.6
	5 月	1.0	1.64	3.6
	6 月	3.0	1.65	3.7
	7 月	- 1.6	1.66	3.7
	8 月	- 1.3	1.65	3.5
	9 月	1.4	1.68	3.6
	10 月	- 1.6	1.69	3.5
	11 月	- 1.6	1.69	3.5
	12 月	1.2	1.77	3.4
2015 年				
	1 月	- 2.7	1.77	3.6
	2 月	- 2.2	1.63	3.5
	3 月		1.72	3.4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2014 年 4 月—2015 年 4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月份							
2014 年	731052		4.8	858865		5.7	-127813
4 月	59212	1.2	5.1	68456	-11.7	3.4	-9244
5 月	57892	-2.2	-2.7	66683	-2.6	-3.5	-8791
6 月	59323	2.5	-1.9	70177	5.2	8.5	-10853
7 月	60289	1.6	3.9	70510	0.5	2.4	-10221
8 月	60520	0.4	-1.3	69707	-1.1	-1.4	-9188
9 月	62524	3.3	6.9	73091	4.9	6.2	-10566
10 月	63694	1.9	9.6	72041	-1.4	3.1	-8347
11 月	64228	0.8	4.9	72265	0.3	-1.7	-8037
12 月	65468	1.9	12.9	71524	-1.0	1.9	-6056
2015 年							
1 月	67137	2.5	17.0	70113	-2.0	-9.0	-2977
2 月	62434	-7.0	2.4	68121	-2.8	-3.6	-5688
3 月	64789	3.8	8.5	64739	-5.0	14.5	50
4 月	63809	-1.5	8.0	65896	1.8	-4.2	-2087

注: 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表 26 2014 年 3 月—2015 年 3 月外国直接投资相关指数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4 年		9548	127682	-118134
	3 月	4243	7210	-2967
	4 月	-1351	20566	-21917
	5 月	480	7493	-7013
	6 月	2528	7027	-4499
	7 月	-818	8165	-8983
	8 月	122	6334	-6212
	9 月	2939	6944	-4005
	10 月	-1351	16368	-17719
	11 月	397	15074	-14677
	12 月	2932	13443	-10511
2015 年				
	1 月	-329	11901	-12230
	2 月	940	13833	-12893
	3 月	2928	9244	-6316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2012 年—2014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2 年		1.9	0.7	2.2	1.0	5.1	3.4
	1 季度	0.8	0.6	2.7	0.8	6.0	4.8
	2 季度	1.6	0.0	2.9	0.6	4.5	4.3
	3 季度	0.8	0.2	2.2	1.0	4.6	3.0
	4 季度	0.9	0.2	2.1	1.8	4.4	2.0
2013 年		2.0	1.7	2.2	2.7	6.9	1.3
	1 季度	3.2	0.8	1.8	2.8		0.8
	2 季度	2.0	1.7	2.2	3.9	7.0	1.2
	3 季度	2.7	1.6	1.8	2.4	7.5	1.3
	4 季度	2.9	2.4	2.9	2.1	6.4	2.1
2014 年		2.5	2.6	1.5	0.1	7.4	0.6
	1 季度	1.0	2.5	1.9	2.7		0.6
	2 季度	3.8	2.6	1.3	-1.2	6.5	0.7
	3 季度	3.2	2.5	1.6	-0.6	8.2	0.9
	4 季度	2.4	2.7	1.3	-0.3	7.5	0.4

注: 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2012 年—2015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12 年		2.3	4.0	1.7	2.1	5.6	6.0
2013 年		2.9	1.4	2.9	2.2	4.7	5.6
	1 季度	2.1	1.0	2.9	1.4	4.2	5.6
	2 季度	2.7	1.8	3.0	2.6	4.5	5.6
	3 季度	3.2	1.6	3.0	1.5	5.0	5.5
	4 季度	3.4	1.1	2.9	3.4	5.1	5.6
2014 年		3.3	2.1	2.3	3.7	6.0	5.0
	1 季度	3.9	2.0	2.6	3.4	6.2	5.2
	2 季度	3.4	1.6	1.8	3.9	6.5	5.1
	3 季度	3.3	2.2	2.7	4.3	5.6	4.9
	4 季度	2.7	2.6	2.2	3.3	5.8	5.0
2015 年							
	1 季度	2.4	2.5	2.1	3.4	5.6	4.7

资料来源: 各经济体官方网站。

表 29 2014 年 4 月—2015 年 4 月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相关指数
单位: %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巴西	俄罗斯	南非
2014 年		6.9	6.2	4.8	5.2	25.1
	4 月	6.9	6.6	4.9	5.3	
	5 月	7.0	6.5	4.9	4.9	
	6 月	7.0	6.4	4.8	4.9	25.5
	7 月	7.0	6.2	4.9	4.9	
	8 月	7.0	6.0	5.0	4.8	
	9 月	6.9	6.0	4.9	4.9	25.4
	10 月	6.6	6.0	4.7	5.1	
	11 月	6.7	5.8	4.8	5.2	
	12 月	6.7	5.7	4.3	5.3	24.3
2015 年						
	1 月	6.6	5.7	5.3	5.5	
	2 月	6.8	5.6	5.9	5.8	
	3 月	6.8	5.5	6.2	5.9	26.4
	4 月	6.8		6.4	5.8	

表 30 2014 年 4 月—2015 年 4 月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相关指数
单位: %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2014 年		3.5	4.5	3.3	4.0	2.9
	4 月	3.7	4.9	3.1	3.9	2.9
	5 月	3.7	4.9	3.1	3.9	2.9
	6 月	3.6	4.8	3.2	3.9	2.8
	7 月	3.4	5.5	3.3	4.0	2.8
	8 月	3.5	5.2	3.3	4.1	2.7
	9 月	3.5	5.1	3.3	4.0	2.7
	10 月	3.5	4.8	3.3	4.0	2.7
	11 月	3.4	4.5	3.3	3.9	2.7
	12 月	3.5	3.8	3.3	3.8	3.0
2015 年						
	1 月	3.4	4.5	3.3	3.8	3.0
	2 月	3.9	4.3	3.3	3.7	3.2
	3 月	3.7	3.9	3.3	3.8	
	4 月	3.7		3.2	3.8	

注: 1. 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 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 各经济体官方网站。

表 31 2014 年 3 月—2015 年 3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 拿 大			英 国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4 年	4746.3	4625.4	120.9	5050.0	6832.1	-1782.1
3 月	409.4	388.9	20.5	449.1	576.5	-127.5
4 月	389.0	396.1	-7.1	403.1	566.7	-163.6
5 月	413.0	408.6	4.4	429.4	573.7	-144.3
6 月	415.2	402.8	12.4	416.2	578.1	-161.9
7 月	397.8	384.7	13.1	425.5	647.9	-222.4
8 月	394.4	398.6	-4.2	354.2	534.3	-180.1
9 月	416.9	398.6	18.3	426.5	590.7	-164.2
10 月	417.5	416.1	1.4	437.2	593.8	-156.6
11 月	373.8	371.3	2.6	448.4	535.9	-87.5
12 月	394.6	365.9	28.7	390.6	537.3	-146.7
2015 年						
1 月	343.1	332.4	10.7	347.6	503.5	-155.9
2 月	318.6	322.6	-4.0	345.9	517.0	-171.2
3 月	358.8	372.4	-13.6	416.3	532.6	-116.3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2 2014 年 4 月—2015 年 4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4 年	910.5	998.9	-88.4	2090.7	2124.1	-33.4
4 月	73.4	85.6	-12.2	197.2	201.1	-3.9
5 月	74.6	81.4	-6.9	207.5	209.4	-1.9
6 月	75.4	75.4	0.0	204.7	181.0	23.7
7 月	79.9	86.2	-6.3	230.2	214.5	15.7
8 月	71.9	87.8	-15.8	204.6	193.0	11.6
9 月	82.0	85.3	-3.3	196.2	205.6	-9.4
10 月	79.8	99.7	-19.9	183.3	195.1	-11.8
11 月	75.8	80.5	-4.7	156.5	180.0	-23.5
12 月	76.1	70.3	5.8	174.9	172.0	2.9
2015 年						
1 月	57.8	78.9	-21.1	137.0	168.8	-31.7
2 月	66.1	73.7	-7.5	120.9	149.3	-28.4
3 月	75.7	75.3	0.4	169.8	165.2	4.6
4 月				118.8	119.3	-0.5
表 33 2014 年 4 月—2015 年 4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4 年	3172.4	4604.8	-1432.4	4977.6	3080.3	1897.4
4 月	237.3	358.5	-121.2	475.8	277.7	198.2
5 月	274.2	394.5	-120.3	440.5	261.2	179.3
6 月	261.4	384.9	-123.5	407.0	267.5	139.5
7 月	267.9	401.4	-133.5	462.1	292.0	170.1
8 月	264.9	375.1	-110.2	414.5	252.8	161.7
9 月	282.1	430.1	-148.0	380.8	260.0	120.9
10 月	255.3	393.5	-138.2	415.4	268.3	147.1
11 月	256.1	424.3	-168.2	367.6	230.9	136.6
12 月	260.2	347.3	-87.1	383.8	244.9	139.0
2015 年						
1 月	238.8	322.1	-83.2	275.1	124.6	150.5
2 月	215.5	383.9	-168.5	291.6	155.6	136.0
3 月	239.5	337.4	-97.9	324.0	174.2	149.8
4 月	220.5	330.5	-109.9			
表 34 2014 年 4 月—2015 年 4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4 年	5736.9	5369.6	367.3	3975.3	4056.1	-80.8
4 月	502.7	458.7	44.0	340.7	345.7	-5.0
5 月	475.8	426.1	49.8	343.8	352.6	-8.8
6 月	478.3	424.8	53.6	334.7	340.0	-5.3
7 月	482.1	458.6	23.4	337.1	346.9	-9.8
8 月	461.1	427.9	33.2	333.6	344.8	-11.2
9 月	474.5	441.9	32.6	342.6	336.7	5.9
10 月	516.3	441.0	75.3	368.8	369.4	-0.6
11 月	466.1	413.4	52.6	323.6	334.1	-10.5
12 月	494.6	439.1	55.5	341.4	338.6	2.8
2015 年						
1 月	451.2	395.2	56.0	265.5	298.2	-32.6
2 月	414.9	338.3	76.5	297.2	291.2	5.9
3 月	468.8	384.6	84.2	341.3	336.6	4.7
4 月	462.3	377.3	85.0	329.5	330.4	-0.9
表 35 2014 年 4 月—2015 年 4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4 年	5241.3	6007.7	-766.3	3138.4	2742.3	396.1
4 月	408.1	483.5	-75.4	266.0	240.6	25.4
5 月	428.1	486.4	-58.3	266.6	213.8	52.8
6 月	426.6	486.5	-59.9	267.9	249.2	18.8
7 月	442.9	494.9	-52.0	267.5	241.6	25.9
8 月	442.1	478.3	-36.2	280.9	240.0	40.9
9 月	471.3	527.2	-56.0	264.3	229.3	35.0
10 月	477.4	534.0	-56.6	269.0	222.8	46.2
11 月	484.8	545.2	-60.3	266.8	224.6	42.2
12 月	455.0	537.0	-82.0	256.5	212.0	44.5
2015 年						
1 月	438.0	484.2	-46.2	251.2	203.2	48.0
2 月	327.8	380.1	-52.2	198.6	153.0	45.6
3 月	416.2	470.8	-54.6	252.7	212.0	40.7
4 月				234.9	187.3	47.6
表 36 2014 年 4 月—2015 年 4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4 年	2341.4	2088.7	252.7	1762.9	1781.8	-18.9
4 月	203.3	176.5	26.8	142.9	162.6	-19.6
5 月	200.8	183.3	17.5	148.2	147.7	0.5
6 月	190.2	177.5	12.8	154.1	157.0	-2.9
7 月	191.9	180.5	11.4	141.2	140.8	0.4
8 月	201.0	188.8	12.2	144.8	147.9	-3.1
9 月	200.5	171.5	29.0	152.8	155.5	-2.7
10 月	199.0	195.5	3.5	153.5	153.3	0.2
11 月	190.6	157.3	33.3	136.2	140.4	-4.3
12 月	194.5	168.0	26.5	146.2	144.4	1.9
2015 年						
1 月	177.5	152.5	25.0	133.6	126.1	7.4
2 月	148.0	135.3	12.7	121.7	115.1	6.6
3 月	180.6	159.3	21.3	136.3	126.1	10.3
4 月				130.8	126.3	4.6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组织网站(表 31~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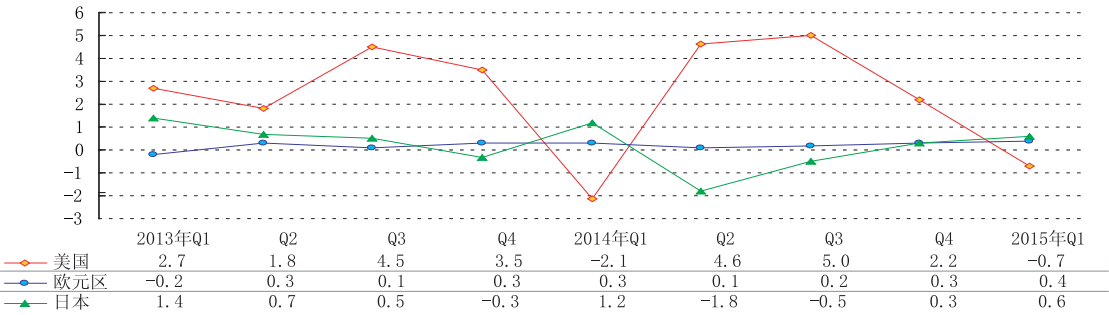


图 1 2013 年—2015 年 1 季度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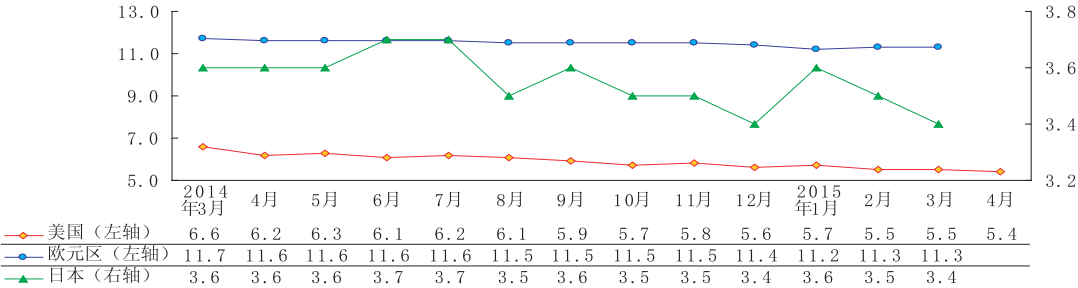


图 2 2014 年 3 月—2015 年 4 月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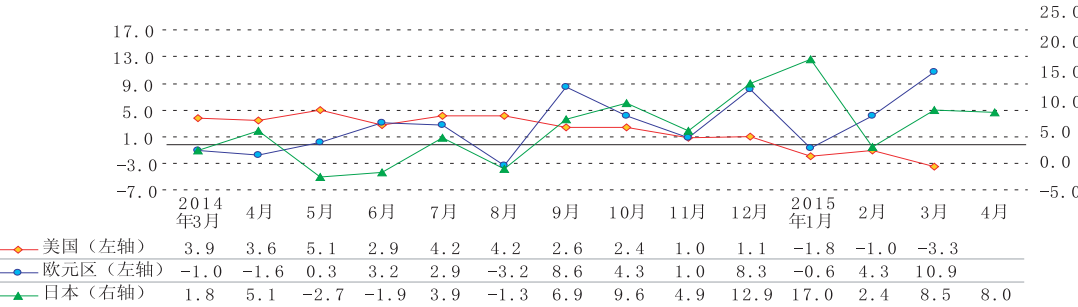


图 3 2014 年 3 月—2015 年 4 月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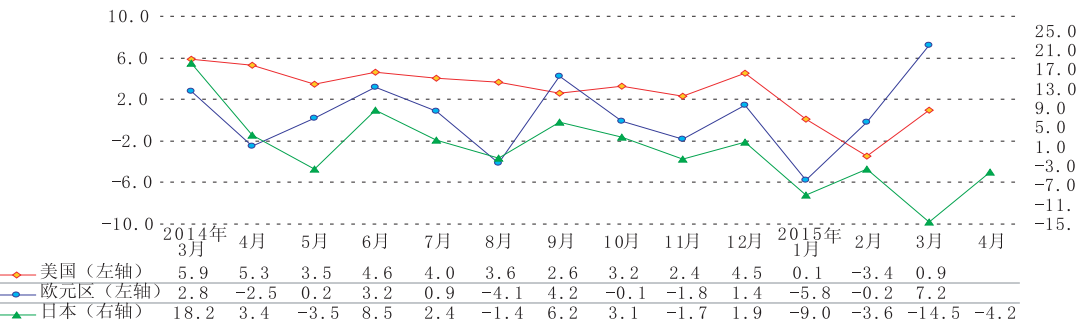


图 4 2014 年 3 月—2015 年 4 月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 1~图 4)。

责任编辑:沈家文

ABSTRACTS

(1)Promoting hand in hand the construction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 for a more beautiful future

Chen Wenling

We must realize the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long – term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buildi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with new historic heigh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view, pushing forward activel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s not an “individual solo” of China, but the “collective chorus” of all the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ong the area. From the domestic view, the new layout of regional economy which is characterised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raction, connectivity and mutual support under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strategy is going to be formed; following the construction principle of “putting concept first, seeking approval, opening up inclusively , mutual benefit and win – win, considering on both the politics and the economics, one policy for one nation, step by step , government guidance and market operation, optimizing inventory and increasing the increment”, long term mechanism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nstruction and systematiz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arrangement should be established.

(2)Deepen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building comprehensively the new system of the open economy

Huo Jianguo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 up has entered the fast lane during the “12th Five – year” period, a new pattern of China’s opening –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the framework of new open economic system has basically formed. At present, the world’s economy will enter a new phase of steady development, the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worldwide will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and the form of cooperation will be continuously innovated. During the “13th Five – year” period, the environ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open economy will also present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face more pressures and challenges with strategic focuses in the aspect of foreign trade, utilization of foreign capital and overseas investment. China has realized effective breakthroughs and startings in constructing the new system of open economy, but there is still much work to do, key aspects include: accelerating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open markets, holding the good sequence and rhythm of opening –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participating in actively the multilateral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trengthening the prevention of international risks and improving the strain capacit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3)The range, conditions and policy choices of china’s mid—to—high speed growth

Wang Hongju

Long – term trends of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S, Europe and Japan show that the slow – down of growth speed after the high – speed growth of economy is a natural phenomenon, the adjustment of economic structure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the slowdown of economic grow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has come into the new normal situation, and the

switch from rapid growth to mid – to – highspeed growth is also a natural phenomenon that complies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aw. China's current main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are superior to the corresponding indexes of the mid – to – high speed growing economies. China has the condition and potential to maintain a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is now going to enter the new normal situation matched by mid – to – high speed growth and upper – middle income, so there is no need to worry about the risk falling into the middle – income trap. In the shifting phase of economic growth speed, some problems appear along with the slowdown of economic growth. China needs to balance the relations between “adjusting the structure” and “stabilizing the growth”. China should adher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as the mainline and focus on the policy of “adjusting the structure”, release dividend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 up policy and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the policy of “stabilizing the growth”, “adjusting the structure” and “advancing the reform”, give full scope to market mechanism,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vitality and the endogenous power, and prevent rapid decline of economic growth.

(4) Grasping the opportunity of medium – to – long – term slump of commodity prices and reconstructing China's global energy resource strategy

Wang Jun, Liu Xiangdong

Global commodity prices will enter a medium – to – long – term downturn period of consolidation in the future and is likely to continue drifting lower through the following 3 – 5 years, which does more good than harm to China's economy in general. In the next period to come, we should seize the favorable opportunity and adjust the strategy of China's global energy resources, strive to expand overseas resources reserve capacity and speed up the M&A and investment of mines; form a demand – oriented pricing center gradually; straighten out the domestic prices of resource products and compress the various energy subsidies that beyond the new energy; deepen the structural reform in the area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 and build diversified supply channels.

(5) The motivations and challenges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

Tian Huimin, Cao Honghui

“One Belt and One Road” is China's new initiative and strategy of coordinating the domestic and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 the new period, interconnecting with the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of countries alo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route so as to promote mutual political trust,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inclusiveness, thus providing China a major strategic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promote regional cooper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otivations and challenges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 and proposes some corresponding implementation suggestions.

(6) China Manufacturing 2025 : Realizing Overtaking through Lane Change

Zhang Monan

At present, China is in more urgent need for the strong strategy of rejuvenating the nation through powerful manufacturing than ever before. Without a strong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state cannot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big country to the power. Especially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global economic structure is undergoing profound adjustments,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implemented re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and manufacturing return strategy one after another to form a more intense competition with China, the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ill face double squeez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new trends of global manufacturing strategy and through comparison amo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German Industry 4.0”, “American Industrial Internet”, and “China Manufacturing 2025 strateg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China should focus on “China Manufacturing 2025 strategy” and implement the whole nation strategy of rejuvenating the nation through powerful manufacturing.

(7) On the Path to Eliminate the Western misreading on Chinese law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stern comparative law research

Gu Huaxiang

The civilization degree of rule of law and the completion extent of the legal system for every country are the direct reflection of the governance ability of the ruling parties, the vitality of stat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image. Serious deviation of traditional Western viewpoints toward the Chinese legal status will exist throughout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which must be fully realized. It must be aware that the cases adopted by western society when studying Chinese laws are very limited, and in – depth analysis always lacked. We should have enough patience and sustained action force to eliminate the confirmed habits of misreading Chinese laws by western society. We should be open – minded and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iminating misreading from western society, and learning from and maintaining exchanges with western society. We should spare no efforts to gather broad social consensus and work together to optimiz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cro – environment for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the rule of law and buildi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8) Investigation on “green congress” project in Israel

Li Xiaoxi, Zhu Zhaoyi, Rong Tingting

Starting from the “green congress” project of Israel, this paper chooses a green worker named Dr Sham as the mainline, emphatically introduces the launch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green congress” project in Israel, Dr Sham’s design concept and content of green homes and the importance of popularizing the green concept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on the green. The revelation of investigation on Israel’s green economy are as follows: national institutions should set an example with their own behaviors , take the lead and guarantee their actions to land on feet; setting up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is the primary factor in the practice of green economy; green building is the key part in green industry and green consump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green country must be based on the green industry.

(9) Change China with “3 Creation”

Gao Shangquan

The so – called “3 Creation”, is creating business, creating innovation and creating brand, and among them, the business creating is the foundation, innovation creating is the key, and brand creating is the goal. “3 Creation” can change enterprises and China as well. “3 Creation” are the behavior of market, but the government must create a good institutional and legal environment for “3 Creation”.

Editor: Guo Zhouming

《全球化》杂志征稿启事

《全球化》杂志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管/主办，是集研究性、学术性、政策性、应用性于一体，以国际国内重大战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经济类理论期刊。刊物依托“中国智库”平台优势，秉承“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核心理念，本着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原则，着力打造“全球经济思想库”，构建一个智库交流的平台，成为广大读者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窗口和共享思想盛宴的便捷之门。刊物重点关注国际经济、宏观经济、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高经济形势分析预测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权威性；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进程，尤其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发展中的趋势与问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和咨讯服务，同时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引领和支持。刊物力争具有全球视野，服务宏观决策，推动企业发展，集聚各类人才，成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从事国际经济研究、把握中国经济动向的重要理论刊物。

稿件要求如下：

1. 内容不限，篇幅一般为 8000～12000 字，附有 300～400 字的摘要，3～5 个关键词，标题、摘要、关键词的英文翻译附在文后。
2. 来稿请注明作者的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研究方向和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电子邮箱。来稿如属基金项目成果，请按有关规定标注项目正式名称和编号。请将来稿（电子版论文）以 word 格式发送到编辑部投稿邮箱。

本刊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内大街 5 号 235 室（邮编：100050）

投稿邮箱：qqh@cciee.org.cn；qqhtgx@126.com

联系电话：010-83362182 联系人：沈家文

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

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是由中国海外控股集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共同发起设立的研究机构。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就与中国海外投资环境有关的问题，包括经济、政治、安全、政策等相关问题进行调研，分析研究，提供调研和分析报告，开展合作交流，召开成果发布会、举办专题论坛，开办讲座、培训等，面向政府、企业和社会。中心发挥智库功能，就有关中国海外投资和海外资产管理等问题，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战略性和政策性研究成果和对策性建议，为企业提供投资战略和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咨询，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对海外资产进行有效管理。



联系地址：北京市王府井东街8号澳门中心四层（邮编 100006）
合作/咨询电话：010-58138101-302 邮箱：perc@zhwkg.com

广东工业大学简介

广东工业大学由原广东工学院、广东机械学院和华南建设学院（东院）于 1995 年 6 月合并组建而成，已有 50 余年办学历史，是一所以工为主、工理经管文法艺结合、多科性协调发展的省属重点大学。学校 2014 年整体升为一本高校，始终坚持“与广东崛起共成长，为广东发展作贡献”的办学理念，加强与产业界深度融合，开展应用性创新研究，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

打造强势学科专业

学校的学科设置与产业市场紧密对接，已逐步形成优势突出、布局合理、富有特色的高水平学科体系。学校工程学科优势明显，2008 年进入广东省“211 工程”重点学科项目建设行列，2012 年工程学科进入国际 ESI 数据库列全球前 1%。拥有 15 个省重点学科，其中 3 个省攀峰重点学科一级学科，7 个省优势重点学科一级学科，5 个省特色重点学科二级学科。文科类专业独具特色，“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是省属高校唯一的一级学科博士点，也是广东省一级学科优势重点学科，“艺术设计类”专业是“世界艺术、设计与媒体院校联盟”成员，“社会工作专业”建有“国家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基地”。拥有一批特色专业精品课程，现有 7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16 个省级特色专业，13 个广东省名牌专业，3 个国家级精品课程（含双语），52 门省级精品课程（含双语），1 门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1 门省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

学校把打造一流师资作为头等大事。现有专任教师 2000 多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300 多人，副高级职称 700 多人。近几年来，启动实施“百人计划”，已从海内外引进了一批国家“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划”“杰青”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及芬兰国家文化成就奖获得者，同时还聘有美法等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珠江学者、长江学者、省领军人才等高层次人才，共达 70 多名。高水平教师以授课、讲座、沙龙、讨论及项目研究等多种形式，把国际前沿的知识、技术传授给学生，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

学校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地方政府和工业界联合建立了“广州国家现代服务业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东莞华南设计创新院”“佛山广工大数控装备协同创新研究院”等多个跨学科协同创新平台，成效显著。与省内全部 16 个高新区、70 多个专业镇、20 多个省重点行业、龙头企业已开展战略合作。在精密装备、IC 设计、工业设计、制药、软物质等领域构建高水平研发平台，促进“产学研”和协同创新取得实质性成果。每年批量派送师生进入这些平台开展项目研究和科技训练，边学习边实践。2012 年作为广东唯一一所高校获得“中国产学研促进奖”。

培养多样性创新人才

学校 2007 年被评为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优秀学校，已形成了“立德树人、学以致用、创新为魂”的人才培养特色，构建了“重基础、强能力、多样性、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大力实施“大学生创新行动计划”和“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计划”，将学生创新行动纳入人才培养体系，每年筹集支持学生创新实践项目立项经费 1000 万元以上。经过多年建设，多样性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和实践，2014 年被评为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2013 年，学校在第十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摘得 3 项一等奖，3 项二等奖，1 项交叉创新奖，以总分 330 分排名第五位，捧得全国挑战杯“优胜杯”，并获得 2015 年全国第十四届“挑战杯”竞赛承办权。2015 年，在第十三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获 11 项特等奖，以总分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捧得“优胜杯”。2014 年，在“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省赛中，获金奖 11 项，名列全省第一；在“创青春”国赛中，总分全国第六名，排名全国非 985 高校第一名，捧得“优胜杯”，创造了学校参加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的历史最好成绩，刷新了学校参加原“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的获奖层次和整体成绩的记录。在北美数学建模、德国红点、IF、国际机器人大赛、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数学建模、方程式赛车等一批国内外大学生创新竞赛中均取得佳绩。一名学生荣获第七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等。近三年来，学生获得授权专利 105 项。

学校积极适应教育国际化的新趋势，多层次、多渠道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与一批世界知名大学、知名跨国企业通过共享高水平教授、共建实验室、联合培养研究生和共同承担重大项目等方式，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与国（境）外 117 所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共同成立联合实验室/中心 18 个。近几年派出 200 多名教师和管理干部到国外合作高校进修培训，1000 多人次出国学术交流访问。与国（境）外 56 所知名高校签订了学生交流协议。